



闻道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主办
2012年第1期
(总第5期)

学人访谈 林国华老师采访录

品茗闻道 奥古斯丁与死亡哲学

百花齐放 今天我们如何办研究生教育

靡石有初，錚錚有終。

馮紹雷

思接千載，視通萬里

與“聞道”學子共勉

林禮云
2011年3月10日

封面題詞：馮紹雷

《聞道》編輯部

主編：李沛

副主編：孫超 李荟 程艷陽 劉佳琪

編輯：陳安龍 陳潔琮 崔攀 紀媛楠 李秋悅
李婷 柳文 馬新偉 秦珊珊 王志航
吳途勇 武亞寧 許子蘭 楊茗 葉小嬌
尹亮 曾喬圓 張元 章航翔 周生升
朱承璋 朱永福

封面設計：何晴倩 秦珊珊 章航翔 崔攀 朱承璋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
理科大樓A座四樓

郵編：200062

電子郵箱：ggwendao@gmail.com

聞道

華東師範大學
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研究生 主辦
2012年04月
(季刊)



注：未獲本刊事先許可，任何
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本刊內容

编者的话

前两年有部很火的电视剧，叫《我们无法安放青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几乎都是被这个剧名“击中”的。在这个因市场经济而变得越发理性而匆忙的时代，因成就指向导致竞争加剧而带来孤独感与日俱增的状态下，我们愈加发现——焦虑不安的内心已经疲惫地无人抚慰，我们的青春似乎已经无法安放。

每一代人都有无法安放的青春，因为太敏感也太美好。因为理想仍在，所以我们躁动不安，因为理想仍在，所以不安于平庸。在这个春日的校园里，大家行色匆匆忙碌不停，追逐着最属己的梦想。然而，在这个通往最初或最后的梦想的征程之中，却总有那么一点点悲怆的味道：无论有多少欢笑，一路上却只有自己。换句话说，大家都只是默默的独自赶路。

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在越来越关注个人的感受，寻求个人成功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忽略作为整体的外在世界，忽略了与“我”一样的“我们”。个人生活的高扬，却伴随着公共生活的谢幕；个人目的之崇高，则伴随着宏大叙事的完结。我们的青春，竟然与其他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吗？我们追求的目的到最后还能是幸福吗？对，我们问的是幸福。没有公共生活的参与，没有公共事务的讨论，幸福可能只是虚无缥缈。因为幸福永远与孤独平行。

因此，我们希望，以《闻道》来关注公共事务，寻求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国关院来了个年轻人”，我们与他坐而论道、畅谈生活学术；“求索真文明”的老先生魂归道山，我们载文深深纪念；

我们探求古今中西哲人的死生之秘，触碰人生真谛；我们回溯古典、沟通现代，试图重新讨论柏拉图的“洞穴之寓”，以及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领袖与民众之关系；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发表40年，请与我们一起回顾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波斯湾风云正紧，请看看我们对美伊战争的一种假设性分析；海洋问题、海权问题正在凸显，给您奉献“印度洋困境”中关于印度因素的讨论；

我们请您小憩片刻，一起去艺海拾贝，欣赏当代水墨画展、俄罗斯当代艺术群展，再邀您欣赏小小的诗歌与美文；再请您耸起精神，听听外国名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

还有必须认真面对的中国：看看那因校车事件而愈发惹人注意的中小学“撤点并校”，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改革的徘徊与决心。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声，这莘莘学子真诚而善良的声音与念想：我们今天如何办研究生教育？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唯有先成为一个好公民，才能完善自身德行。在这个喧闹而不平静的世界，《闻道》相信，只有放眼全球、勤于观察，只有研读经典、审视内心，只有博学于文，知行合一，方能奠定我们一生美好生活的基础。

让我们结伴而行。

编者：尹亮
2012年4月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目录

编者的话.....	1
学人访谈.....	1
林国华老师采访录.....	1
国关论道.....	5
美国为什么会对伊朗动武?——一种假设性分析.....	5
中国“印度洋困境”之印度因素探析.....	18
从柏拉图的“洞穴”到希区柯克的“后窗”.....	27
激情、自然与神罚——读柏拉图《理想国》札记.....	33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与民众.....	35
品茗闻道.....	39
“奥古斯丁与死亡哲学”专题.....	39
为什么是宗教?——《论语》与《上帝之城》对“死”的看法初探.....	39
关于死亡.....	42
从奥古斯丁的自杀禁忌说起.....	45
他山之石.....	48
主题法与问题法.....	48
百花齐放.....	53
社会透视:今天我们如何办研究生教育?.....	53
寻求一种被击中的感觉——研究生教育断想.....	53
对研究生教育的期许.....	56
盛行高学历,加剧“考研热”.....	57
观念的学与抒情的诗.....	60
微视点.....	62
艺海拾贝.....	62

“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	62
“俄罗斯制造”——俄罗斯当代艺术群展.....	63
新闻话题	64
谁的乡村，谁的学校，谁的孩子——10周年的“撤点并校”.....	64
用政治伦理破解政治难题.....	64
先生之风	66
“予岂好辩哉？”——纪念朱维铮先生.....	66
心灵驿站	68
聆听苦难.....	68
诗人.....	70
时事焦点	71
中美关系四十年.....	71
院系来音	80
国关院 2012 年 2—3 月大事记.....	80
征稿启事	84

林国华老师采访录



林国华

《闻道》：您的教育经历在不少人看来很复杂，从青海师范大学读英文专业本科，再到北京大学读比较文学硕士，再去到美国哈佛大学念神学硕士，并最终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修读博士学位。我们很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复杂的经历？在这过程之中，在您自身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和“心灵炼狱”——这是您的硕士导师乐黛云先生在您书中序言中所说的。

林：其实整个过程都很自然。因为整个过程我从来没有说是执着于任何一个学科之中。我的导师乐黛云曾经把当时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学生分了三类：一类是混学位的；一类很踏实，会在所属领域把自己打造得非常专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第三类是灵

魂世界的漫游者，这类人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只有一个，就是我。这种人很危险，要么能思考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要么一事无成。刚读硕士的时候，我给乐先生写的第一门作业，就被她退回来了。她说我写的是散文，不是专业论文。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会成为专家，直到现在我拒斥专业化。

《闻道》：如此说来，您并不是一直在一个专业从事精专研究。在学科严格分化的今天，您“不务正业”地从这个专业跳到那个专业，或许会被看做是不够专业。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转变，比如您从文学到神学再到政治哲学和国际法？您觉得这种转变、或者这种学术路径，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更进一步说，对一个“人”的生活又会有什么影响？

林：我觉得，总有一些问题是不能被学科化、专业化，换句话说，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知识分工而得到解决的，分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悬置这些问题、取消这些问题甚至把这些问题视为伪问题。比方说，我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研究了英国19世纪画家透纳(William Turner)的一副画，发给你们看了，表面上看这是一篇画评，按照“学科分工理论”，应该算入“艺术史”领域，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篇画评，正如我的副标题所显示的，这是一篇讨论“神学政治论”问题的文章，你们知道，这是斯宾诺莎的问题，是霍布斯的问题，是迈蒙尼德的问题，更是圣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问题。如果这篇文章一定要被算作画评，那也至少是在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的三层研究目标的后两层的意义上理解的，尤其是最后一层。不管我研究柏拉图，还是莎士比亚，又或者是格劳秀斯，我追究的问题只有一个，是那个问题迫使我跨越不同的领域。

《闻道》：事实上，我们发现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古典学的研究之上。我们不得不质疑，您的这种研究，不过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对于当下的世事是无补的，是缺乏现实关怀的。

林：的确，你们看我文章也好，平常跟大家聊天也好，我是不太谈现实的。第一，我不懂。因为现实问题一切都还没有定型，一切都是存在被遮蔽的状态，很多偶然性，它不像过去。因为过去了，基本都定型了，可以谈了。谈现代问题的话，当代现实问题，实际上有很多偶然性，你没有很高的资质就没法谈得很透彻。比方说写政论，写时评也好，非常非常难写。因为存在偶然性，而偶然这种东西太难把握了。把握这种东西靠的不是知识，靠的是一种洞见，一种预见。对一个人的修养、个性，要求很高很高。所以我自觉不去写这类文章。

但是，除了你要去处理这些偶然性的、偶发的事件之外，毕竟还是有相对固定、相对永恒的东西，我做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人类的思想可以把握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就是政治哲学的任务。我更愿意在这个领域里待着。这也是我自己的秉性所在：不太愿意卷入具体现实事件当中。我认为这是比较纯粹的哲人式的秉性，惧怕偶然性，喜欢呆在可以用言辞和理性清晰表述和领会的世界里。《理想国》是这个世界的范本。也有一些政治哲学家喜欢和偶然性嬉戏，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审慎”（prudence）这种德性抬得很高，甚至高于理智德性，我认为这是这一种政治哲学的失败，强调“审慎”这种防御性的德性，其实恰恰透露了自己的某种无能和缺陷，这是致命的。必然性的领域和偶然性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统治前者，只需一副哲人的清晰的头脑；统治后者，则需要一位万能的神。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副足够清晰的头脑去表述必然性领域，但我至少足够清晰地知道我不是神。

《闻道》：您讲过，正义的底色是愤怒。能不能引申一下，为什么这么说？这究竟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品格，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林：正义的愤怒品质是非常古老的情感体认和界定，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我们知道，正义女神有两个侍女，其中之一就是Nemesis，复仇、惩罚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罗列出数不清的古代文献。正义的愤怒底色赋予正义本身一种黑暗、狂暴的品质，正义因此变得很危险。如何节制正义中的黑暗和狂暴，这是柏拉图的问题，也是政治哲学的问题。经由理性调教过的正义才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追求和品格，任由愤怒支配的正义是某种政治神学的品格，我们知道，对正义的一个古老定义是：正义就是对邪恶的怀恨和对善良的热爱。这个义从文字上讲是出自一位古代异教作家，但是就其精神来讲，我觉得更适合《旧约》，过度的律法至上主义的热望会毁掉正义的理性根基。因为讲到爱与恨，我们知道，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说，凡人是没有爱与恨的资质和能力的，爱与恨都在上帝的手中，《旧约》里的《约拿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了。由“恨”而起的灾难，我们并不陌生；同样，由“爱”也能引起可怕的灾难，我记得人们讲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最形象的一句话就是“爱得血流成河”。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恶“灵魂论”难题：你们知道，古希腊人把灵魂分成三部分，即最高地位的理性、最低地位的欲望、中间地位的血气（thumos）；血气就是爱、恨、愤怒以及正义等等这类激情的根源所在，问题的所有复杂性都来自“血气”所在的游移不定的中间位置。显然，读读《理想国》有助于了解这个问题。

《闻道》：您与其他一些学人一起办了《海国图志》学刊，并以其为基础，策划出版了一批书籍。你们当初为何会想到要办杂志，其宗旨和特色又是什么？

林：当初我们办学刊是因为有一个自己的小团体，大家有一些共识，看到了国内的很多问题，仅仅在国内的视野下，基本上是无解的，觉得把国内问题放在国际大背景来看，很多

问题才能看得清楚。这个刊物主要就是两个特色：一个是讲习经典著作，一个是注重西学传统。我们不希望直接介入中国当前问题，我们更喜欢读一些经典，思考一些基础理论。

《闻道》：现在随着东海、南海问题的发酵，海权问题也成为热点话题，甚至很多主流媒体都在宣传一些有关海洋、海权的东西，比如央视纪录片《走向海洋》。如果我们再回顾二十年前，这样的纪录片还有《河殇》。但是，中国人自身系统的海洋观念似乎还没有形成，而且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似乎也是一种追求大一统的陆地属性的历史，而且即使完成大一统的王朝也把国家的安全防御中心放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鲜有封建王朝把目光投向海洋。平日上您的课，也能感到您对海洋问题、海权的青睐，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些现象的看法，以及您自身的海权观念？

林：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是学理意义上的复杂，也是民族情感和政治道德意义上的复杂。因此，这个问题既可以在学理层面谈得很深入，也有可能是在民族道德层面上土崩瓦解。我们主办的《海国图志》学刊在今年初已经推出了一辑海权特刊，题目是《海权、革命与现代的诞生》；今年5月份也要推出另外一辑海权特刊，题目是《自由海洋及其敌人》，都是学理文章，大家可以参考。在这里，关于“海权”，我只讲一句：一般人心目中的海权就是分割与占有海洋，这其实是把海洋当成陆地的企图，把海洋予以陆地化的企图，是对海洋的奴役，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陆地上的强盗作风，这并不是真正的海权；海权的根本要义在于“海洋自由”。谁有权力能够保证海洋的自由，谁就拥有了海权，换言之，海权是一种使海洋处于自由状态的权力，而不是使海洋处于奴役状态的权力。我觉得，当前没几个中国人能够达到这种理解。从这个理解出发，可以衍生出大量的思考和讨论，我们的《海国图志》学刊在未来若干年将经常回到这个问题。

《闻道》：您在美国学习了这么久，自身的学术成就也开始得到了学界认可。在此，能否讲讲您在美国的学习经历，特别是您在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学习的经历？

林：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它是由经济学所说的“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奈特和芝大校长哈钦斯一起建立起来的在政治上比较保守、非常精英的一个研究机构。这里侧重研读经典，没有学科划分。哈钦斯，他是20世纪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29岁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年大约招生3~5人，常任教授有20多个，全是顶级教授，包括诺奖得主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么多超一流大牌教授汇聚一堂，却只有一个老太太做行政。学生都很独立，比如博士论文资格之前的大考，可以说就是学生自己考自己，因为考试的试题来自12-15本书，这些书都是学生自己挑选，然后花个至少四年时间通过上课或者自修来研读的。从思想目标上看，政治哲学应该是这个机构的长久以来的重点所在，毕竟，施特劳斯的影响非常大而且非常持久；但在知识风格上偏重古典文史，尤其是文学，先后曾经有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里执教（T.S.艾略特、索尔·贝娄、库切）。

《闻道》：确实是大师云集。您既然提到了施特劳斯，我们想问这种经典的读法是不是跟他有很大关系？

林：施特劳斯创建的学派的确讲究阅读大经典。不过，在西方，研读经典并非一家一派的事情，而是西方大学师生的共识，这一点，他们做得比中国大学好很多。

施特劳斯对我影响很大。他所有出版过的书我都看过，而且是精读，他未出版的数十

卷讲稿我也看过一些。他是个很博学的人，他的一个很短的注释就会给读者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很激动人心。做他的学生或者做他的学生的学生，你会觉得你这一辈子真不够用。后来慢慢的我自己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包容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观点的学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观点。他只是带动学生读书。我觉得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带着学生去发现经典作家本人的一些思想。

《闻道》：不过好像现在国内外对施派学人的批评也很大啊。

林：对，现在很多人把他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他当然可以以这种方式被解读，也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把他解释得非常狭隘，这本身没什么不妥，但这远远不够。国内学者对于施派的批评很正常，施派在美国和欧洲也被批评，尤其是海湾战争以来，大家发现施派跟美国政府的联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学派，承纳这种批评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思想领域就是意见领域，大家都在发表不同的意见，意见不同，就会有争论，这很正常，这其实正是学者的存在理由，甚至是他们的生存本身的样式，没有人会蠢到连自己的生存都要感到奇怪的地步。任何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终究都是一种意见。

《闻道》：林老师，您也讲了您求学的经历，那能否给我们这些在读研究生一些建议呢？

林：我并不推荐你们走研究学问的道路，不要对学术道路抱太多幻想，你们应该安全毕业，然后工作，养家糊口。我认为，贫穷和理想是不相容的，否则，生活和学术两方面都会被扭曲。学术这个东西，从它的历史起源上来讲就是贵族型事业，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也是物质意义上的。目前在国內，做学术研究，生活压力太大，你们没有必要非得去承受。不过，你们还是应该保持读书的爱好，有节制地读些好书，特别是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小说可以把你们引入另外一个跟现实世界并存的想象的“平行空间”，现实世界是很枯燥很乏味的，而且是容易受伤的一个世界，但是那个想象的世界可以给你很多安慰，你们虽然长大了，但大人尤其需要安慰。

《闻道》：我们再紧着再问一个问题，谈谈爱情吧。因为你读小说比较多，你谈谈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

林：你们应该去谈一场恋爱。研究生和本科又不一样了，怎么说呢，这完全是一个缘分，可遇不可求，有了，就彼此珍惜，尽可能的以婚姻为指向，不要拿出俄罗斯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头的主人公）那种劲头去进入恋爱，那样会害自己，也害对方。

《闻道》：林老师，最后能否结合您的办刊经验，对我们《闻道》杂志提些建议？

林：学生办刊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关于《闻道》，以最近一期为例。首先，我认为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抛弃，比如那些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可以放在院网站上，毕竟你们不是在办日报，而是一份三个月才出版一册的季刊。其次，尽量学术气浓一点。第三，不必去特意约名教授们的稿子，他们是不会给你们撰写好东西的，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既然是学生刊物，就多刊发学生自己的文章，比如你们的课堂报告、期终论文等。第四，目前刊物出版频率太慢，篇幅太大，建议瘦身，加快出版频率，比如改成 32 开本，每期 30-50 页，半月刊或者月刊，主要刊发你们自己的稿子，让你们自己思考和写作高频率出现在小范围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话，这份刊物就真正成为你们自己的园地了，你们自然就会对它爱护有加了。

美国为什么会为伊朗动武？

—— 一种假设性分析

刘畅*

【内容提要】本文不是预测美国会不会打伊朗，而是假设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会是什么原因，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全文主要内容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对设想中的美国对伊动武的原因进行探析，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即从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次的角度来分析美国为何会对伊朗动武；其次，对可能出现的美国对伊动武的方式进行简要预测，即分析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美国将采取怎样的战争方式，战争规模将怎样，并分析为何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文章得出的相应结论为：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国内的经济形势和问题将占主导地位，即美国会因为其需要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寻求对伊朗动武；此外，其他一些因素（如地缘政治、对伊朗核野心的预防等）也将对可能的美国对伊动武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美国 伊朗 战争 原因

一、导言

自去年年底伊朗击落美无人侦察机以来，美伊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严重下滑。随着朝鲜局势的平静，美伊之间在海湾的矛盾又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去年12月1日，美参议院全票通过对伊新制裁措施，要求切断伊朗中央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惩罚与伊朗央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银行。这几乎是要把伊朗的石油出口彻底切断。今年1月4日，欧盟又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达成原则性共识¹。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宣布进行为期10天的军事演习，特别是伊朗海军在此次演习中将演练一种有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战术。对此美国反应强烈，严厉警告伊朗不要将海峡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其“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强力驶向海湾，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媒体惊呼“美伊紧张局势达二十年最高峰”。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到底会不会对伊朗动武？以及如果会动武的话，美国为什么要动武？本文旨在主要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伊动武的原因。

二、美对伊动武原因初探

政界和学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美国到底会不会对伊朗动武这个问题。各派观点纷繁，众说纷纭。而白宫和国务院长期以来对伊朗的政策存在模糊性和不连贯性，往往左摇右

¹ “欧盟拟禁运伊朗石油，国际油价、金价闻声上涨”，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12/01-05/3581230.shtml>, 2012年1月5日。

摆,使得很多预测最终被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如今美伊关系又紧张起来,局势变化极快,关于美国是否会对伊动武的预测又将火热起来。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此次并不是要来预测美国会不会对伊动武,而是想要分析和说明,假如美国真的对伊朗动武的话,那美国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对伊动武的。也就是说,笔者接下来的分析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基于假设的理论分析。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对伊动武,会是哪些因素促使这种事态的发生呢?肯尼思·华尔兹告诉我们,三个层次上的因素将诱发战争:①人的因素:人的本性和行为,冲突和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战争源于人的自私、愚蠢和误读的冲动;②国家因素:国家内部结构问题,要防止战争就必须从改造国家着手;③体系结构因素: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可以防止它的东西。¹

那么笔者就从这三个层次来试着分析一下,假如美国对伊动武,会是什么原因。

(一) 领导人的因素

这里主要探讨领导人因素。笔者个人认为,奥巴马总统肯定是不太想对伊动武的,因为从政治上而言,2012年是大选年,奥巴马正在全力寻求连任,选民当前最关心的不是在外打了多少胜仗,而是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因此经济问题将成为选战的核心议题,对于像奥巴马这样的领导人而言,在一届任期内发动两场战争无异于政治自杀。

但是不幸的是,奥巴马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群人,他的政策和行动实际上被各种部门、集团和群体绑架了。国内政治的多方面因素正在诱导奥巴马逐步朝着采取对伊动武的措施的方向发展。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奥巴马是自私的、愚蠢的,而是想强调,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要考虑的往往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和简单的“就事论事”,他要考虑到背后庞大的利益关系网络的纠葛和各种复杂事务的相互关联性,特别是要从国内政治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考虑其决策。

然而,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在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时候,“个人层次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由国家而非个人所决定的。过于关注个人的动机会使我们忽视人们意想不到的个人行为的后果,这样的行为后果是由一个更大的体系所导致的。”²因此笔者坚持从多方面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来尝试探讨美国对伊动武原因。至于笔者所说的多方面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是什么,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二) 国内因素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内政治各要素、各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让我们抛开单纯的军事性因素和总能煽动人心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思考美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因素促使其对伊动武。

笔者坚持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对伊动武,那一定是美国国内出现了迫使政府作出军事打击决策的因素,国内经济形势的考量才是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¹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²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1、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为其庞大的国债埋单

那么美国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很明显：经济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持续呈现反复态势，不可谓强劲，大量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制约其经济迅速恢复。美元霸权正在受到多方位挑战，QE（量化宽松政策）等过去美国人惯用的转嫁危机的手段现在使用起来正受到多方面掣肘。就美国经济长远的振兴和发展而言，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美国是否能由过去的“过渡金融化”转变为（或曰回归到）以实体经济为主要依撑的发展模式；二是美国在危机中能否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实现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就应对当前的经济窘境而言，美国国债负担相当沉重，削减赤字和减轻国债是当务之急。

美国当前的国债量相当之大，去年5月中旬已经突破了两党设置的上限，目前仍为14万亿多美元。美国为什么会有数额如此庞大的国债？这要从美国的国家生存和运行方式说起。¹美国人在过去40年里，找到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也最便捷的国家生存方式，那就是用金融手段从全球向美国转移财富。美国人发现自己可以不用生产其他的产品，只生产一样东西就可以致富，就可以过得比世上所有人都好，这个方式就是印刷美元。美国人可以用生产美元来过好日子，就此意义上说，美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存。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它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

综上，美国人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生存，美国在过去40年里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完成了从技术创新性蜕化为过渡金融型/金融（虚拟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是这种“借钱过日子”的发展模式有其致命弱点，那就是举债过多，特别是所谓的次级贷款²过多，当这些贷款无法偿还的时候，就会造成整个经济面的崩溃。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用最常见、最直接、最便捷和最取巧的转嫁危机的办法来应对，这个办法就是所谓“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俗话说就是海量印钞票。从现在来看，美国可以采用以下四种方法来偿还国债：第一、变卖国有资产来偿债；第二、逐步发展经济，发展产业来偿债；第三、借新债还旧债；第四、印钞票还

¹ 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解释到为什么美国国债如此之多：For the last decade, we've spent more money than we take in. In the year 2000, the government had a budget surplus. But instead of using it to pay off our debt, the money was spent on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ew tax cuts, while two wars and an expensive prescription drug program were simply added to our nation's credit card. As a result, the deficit was on track to top \$1 trillion the year I took office.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recession mean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coming in, and it required us to spend even more -- on tax cuts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to spur the economy;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n aid to states so we could prevent more teachers and firefighters and police officers from being laid off. These emergency steps also added to the deficit. Because neither party is blameless for the decisions that led to this problem, both parti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olve it. 详见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1/07/26/infographic-where-does-our-national-debt-come>。

²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即向低收入、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在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但随着美国住房市场大幅降温，加上利率上升，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导致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投资者对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健康状况和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导致近来股市出现剧烈震荡。来源：“次级贷款”，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87317.htm>。

债。据分析，美国首先不会采取第一种方式（即变买资产）来还债，原因是当前美国最大债主是中国，美国不大可能采用此种方法解决债务问题。而采用第二和第三种方法来偿还债务又显得过慢过累。权衡利弊后美国最有可能采用的方法是印钞票，因为这种方法成本低、效应高¹。因此我们说，第四种方法，即海量印钞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最常见、最直接、最便捷和最取巧的转嫁危机的办法。但同时，它也是危害最深的办法。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已经实施了两轮的QE，但是从效果上来讲，并不是非常好，对经济刺激和国债偿还的作用有限。而且最关键的是，之前的两轮QE，是在没有与他国通气，只是为了自己渡过难关而实施的，大量印钞的后果就是美元大幅贬值，其他国家的美元资产大幅缩水，大量美元回流美国，恶化其他国家的金融形势和投资环境，招致国际市场的一片骂声，对美国的金融霸主形象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可谓印钞“师出无名”。所以美国现在不得不对接下来的QE实施采取谨慎措施，必须要找到“不得不印钞”的名头来名正言顺地印钞。

那么到底这些东西跟美国为何会对伊朗动武有什么联系呢？很简单，那就是美国需要通过战争来推动其印钞机再次开足马力（再次强调笔者的前提是“如果”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话）。因为在目前看来，除了量化宽松，奥巴马所希望的其他减少国债的路子基本上都被堵死或者看不见出路了。其他道路：一是希望国会能够达成协议，削减联邦预算赤字；二是希望国会通过他提交的就业法案（American Jobs Act）。但是前者已被国会扼杀²，后者则至今仍不见动静，看不到国会通过的希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就要开动战争机器，利用战争这个转嫁危机的好办法来拨动其印钞的如意算盘。

但若真是如此，岂不是逻辑有问题？如果要打仗，那军费就狂飙，财政支出就疯涨，又要开始发行国债，国债数量又要庞大，那怎么能达到削减国债和财政赤字的目的呢？其实这是没有看到美国在这背后的考虑。如果对伊动武，首先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全球油价飙升。油价飙升，交易又以美元结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油价的飙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就是美国政府。因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美元给你，你必须拿你的产品去换，从而再一次加入“实物换绿纸”的游戏。此时美国政府的印钞行为可以说名正言顺，而用不着像金融危机的今天，明目张胆也失信于人地在全世界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增发美元。

如此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了其他国家的手里，流到了产油国的手里，也流到了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手里。这么多美元攥在这些国家手里能干什么呢？除了作为财富的符号让人开心外，就是变为废纸的前景让人担心，因为美元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贬值，天天在贬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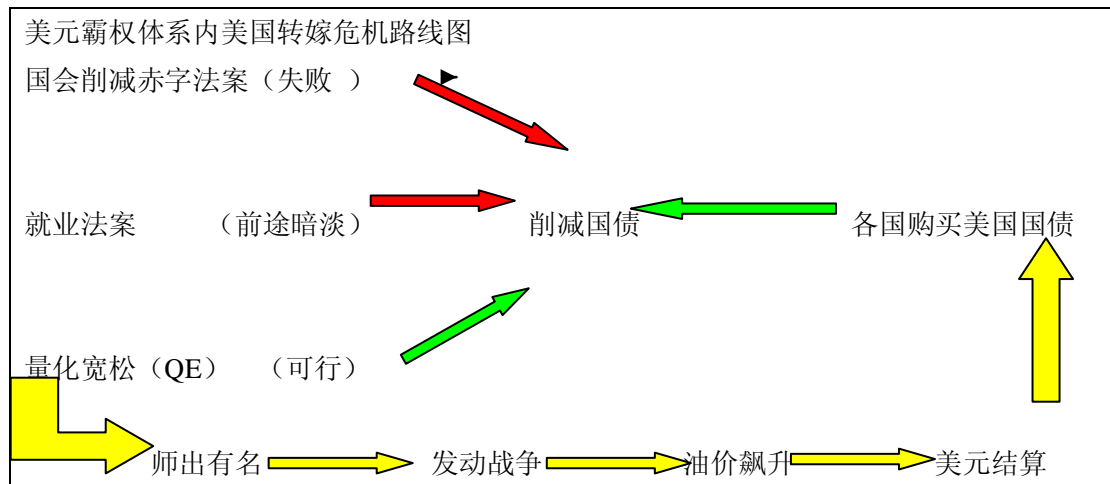
¹ 就美国自身而言，大量印美元的直接好处主要有：一是直接形成购买力，作为世界货币可以直接消费；二是直接消减债务负担，美元多了开始贬值，自然债权人就受伤；三是使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上升；四是直接削减财政赤字；五是有利于华尔街金融市场活跃，因为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都以美元为手段，发行更多的货币就促使华尔街市场更加繁荣。美国现在对美元贬值有恃无恐最大底气在于其所拥有的大量黄金储备，其最坏的处境就是最后放弃美元，重新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货币，而其却可以轻松凭此摆脱自身巨额债务。

² 去年11月22日，美国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联席主席，共和党众议员亨萨林 Jeb Hensarling 和民主党参议员帕蒂·穆里 Patty Murray 宣布，委员会未能就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计划达成协议，这表明该委员会自今年8月份成立以来的减赤努力以失败告终。

天天都在变成废纸，这个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美国人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选择：购买美国的国债。

购买美国国债使巨量的美元回流美国，也使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那么，美国为什么需要让流向全世界美元，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呢？因为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十分担心短期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换句话说，一个几乎没有储蓄率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资本项目的顺差，而这个顺差的额度在 2001 年前后的时候，大约是每年 7000 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 20 亿美元。因此，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其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因此，美国不怕经常项目逆差，惟恐资本项目逆差。为了保持资本项下的顺差，美国会不惜动用战争手段，去打坏别国、别的地区的投资环境，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因此，只要在产油区打仗，油价就会上升，美元的需求也就会随之上升。如此一来，美国人就可以开动印钞机，印更多的美元，从全球换回更多的实物财富，道理就这么简单。再换句话说，美国真实的意图，也许并不是要真正去削减美国国债，而是要为这庞大的国债找愿意接手的下家，借此控制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让全世界的投资者为数额巨大的美国国债埋单。

综上，我们可用下图表示上述理论分析：



2、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此外，如果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还有一个对美国而言利好的因素会成为战争的促发因素，那就是美国可以通过一场战争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阿富汗战争时的情况。我认为现在美国面临的处境同“9·11”事件发生后、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形有些类似，那就是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的比较厉害。“9·11”事件后，大量的资金开始撤离美国。因为全球的投资人突然对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环境——美国产生了疑虑。美国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而华尔街是纽约的中心，世贸大厦则是中心的中心。现在，这个中心的中心居然让恐怖分子给撞毁了，谁还敢对你的投资环境保持信心呢？于是，从这时起，据说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了美国，前面提到美国每年需要吸纳

大约 7000 多亿美元的净流入，这个时候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美国，而这一年还有几个月的日子要过，没有钱怎么行？所以美国迫切需要用一场战争，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

果然如此，当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巡航导弹一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撤离的资金又陆续回到了美国，这场战争重新打回了全世界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战争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我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出美国相对的好。¹如果你认为我的投资环境不安全，那我就打一场战争给你看，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你要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不安全，还有别的地方比我更不安全，那个地方还在发生战争。这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为它的金融大战略服务。

现在的情形正如上面一般。去年 8 月，标普降低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造成股市动荡，投资环境恶化，资本外流日益严重，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降低。况且，这次缘起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可谓近 30 年危机的总爆发²，投资者的信心回复周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方向的不确定性也很强，投资回报周期更长。但是美国人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美国必须在这种信心降低到不能承受的程度之前，就采取行动。而又由于之前所说的，其他道路已被封堵，可利用的政策工具中只有发动战争比较来的快而奏效。因此，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这将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以上关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美国对伊动武最根本的政策考量。国内政治才是外交政策的根源。这也能解释笔者在“人的因素”这一节中所说的为什么奥巴马是被国内政治因素绑架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国内因素、不同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比如军工复合体、石油大亨、……）可以解释国内政治诱导美国对伊动武的原因，笔者只是认为以上的两点最为重要。

（三）国际因素

在华尔兹看来，体系内各行为体的实力大小总是处于变更状态之中，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体系内实力分布不同引起的。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可以制约国家行为的最高权威，体系内实力的变动很容易造成战争的发生³。因此，国际因素是设想中的美国对伊动武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笔者认为，存在四个方面的国际性/体系性因素造成美国对伊动武。

1、对国际格局转变的逆动

笔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当今国际格局与体系的演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即权力转移是格局转换和世界发展新趋势中的基本特征，但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不同，本轮格局转换可能出现东西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握不同种基础性权力的局面，而非所有权力一边倒地集中于

¹ 乔良：“美国人为何而战”，《中国青年报》，2011 年 2 月 25 日。

² 有专家认为，本来世界经济是十年一危机，70 年代、80 年代均爆发经济危机，但从 90 年代以来，两次危机没有爆发成功，90 年代的危机显现，但“9·11”事件延迟了危机的爆发；2000 年本该危机，但纳斯达克的破灭转危为机，于是近 30 年的危机在 2008 年借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世界金融危机，这是 30 年危机的总爆发。

³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110—111 页。

某一集团的现象。发达国家可能仍将掌握制度性、价值观等方面的权力，而发展中（尤其是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将掌握制造型、资源型权力。两方权力斗则两害，合则两利，没有绝对的输家，但却可以双赢。¹

就整个国际体系而言，美国的霸权是体系变动的主导模式，它不允许自己只占有所谓的制度性、价值观上的权力，它还必须掌握资源型权力。就美国霸权的独特性而言，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东西方权力差距正在缩小，美国霸权就更需要对资源型权力占据支配权。我在这里所强调的资源型权力，不仅是一国要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如市场、人力等），而且还必须要能够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为标准来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后者才是这种“资源型权力”的根本特点，因为哪怕一国占有再多资源，如果它自己本身不能按其标准来分配和占有这些资源，那么它也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就像很多中东产油国和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哪怕一国本身自然资源稀缺（或相对稀缺），但是由于它处于体系内的主导地位，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按照自身意愿分配全球资源，那么它仍然占有最大优势的资源型权力，就像现在的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美国。

因此，对于作为霸主的美国而言，它必须对处于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区的咽喉国家伊朗占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它不甘心只是在制度和价值观上领导世界，还必须实实在在地掌握世界资源的命脉。因此笔者将美国的这一做法称为对于国际格局转变的“反动”，也就是说它要逆国际格局转变的潮流而上，不愿本本分分地只当一个“精神领袖”，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霸主。

2、地缘政治的考量

上述逻辑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对伊朗动武。其逻辑缺陷在于，要是伊朗像沙特那样安安分分地做美国的地区盟友，那不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美国又何苦大费周章要攻打伊朗呢？这就涉及到现在要讨论的第二小点原因，即美国同伊朗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再被尖锐化，直到今天，在各种国内国际背景的衬托下，终于质变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美伊之间历史性矛盾的纠葛

实际上，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当时的西方盛赞伊朗是中东“民主与繁荣的典范”。所以在那个时候，美伊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并不严重，美国虽然也存在在第二小点中说到的要对伊朗占有绝对的资源配置权的动机，但由于伊朗同美国的关系亲密，因此美国没有对当时的伊朗动武的意图。

但是所有的情况都随着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完全转变。革命之后的伊朗采取反美的路线，高举伊朗特色的伊斯兰旗帜，并对拥有核能力产生出浓厚兴趣且付诸实践。最重要的是，伊朗声称对本国所产石油拥有“无可争辩”的配置权，这从根本上触动了美国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之后，美国彻底意识到，石油对其经济命脉和美元霸权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如果说美国要对伊动武的话，那么这种想法的产生，应该就可以上溯到这个时候了。这是美伊之间的历史性矛盾的延续。

（2）美伊之间现实性矛盾的纠葛

¹ 该论断为笔者自我总结。

然而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美国一直想打伊朗，却迟迟未动手呢？这就需要回顾 1979 年美伊交恶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过程和美伊关系的进展历程。显而易见的是，1979 年以来每一个 10 年中都有一些制约和掣肘美国的因素使美国投鼠忌器，不能对伊朗下手。20 世纪整个 80 年代中，这个因素是伊朗背后的苏联，有苏联这个靠山在，美国无法对伊朗下手。冷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先是对付了伊拉克，后是解决了南联盟，而这期间的中东问题的症结一直是巴以矛盾，美国再次对伊朗无暇东顾。进入 21 世纪，世贸双塔的轰然坍塌让美国聚焦于全球反恐，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打的美国筋疲力尽，好不容易稍微缓和了一点儿，没想到在 21 世纪头十年快结束的时候，又来了场至今仍摆脱不掉甚至望不尽前路的金融危机，美国可以说元气大伤。也正是从伊拉克战争之后，由于这场战争的十足恐怖性，让美国不得不对其全球战略重心做出重大调整，喊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偌大的中东，美国是再也不想管得太多了。如此种种，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何美国迟迟未动手伊朗。

但是，伊朗留着始终是个祸害。而且这种祸害在今天有了新的变化，使得美国觉得对其危害更甚，更坚定了美国除之而后快的决心。这样一种新的危害就是伊朗所特有的“资源（石油+天然气）+地缘（海湾、海峡）+反美政权+核武器”的恐怖结合。这几样条件伊朗一件不落地全部占有，比伊拉克或者朝鲜这些 3T 结合的国家更可怕。¹所以，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最为关键的现实原因之一就是要破除这些在美国看来是极其恐怖的因素的结合。有鉴于美国现在正将其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因此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很有可能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

（3）伊朗背后的中俄

大国因素是地缘政治中的关键要素。大国之间的掣肘和斗争贯穿地缘政治的始终。正如冷战时美国不敢对伊直接动武的原因一样，现在的美国也忌惮伊朗背后的中国和俄罗斯，因此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正如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指出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那些因为文明特性问题不能加入西方世界的国家，会通过发展自身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及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来同西方文明竞争，最突出的形式就是儒家与伊斯兰教的联合，它的出现是要向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挑战。²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伊朗同中国和俄罗斯的联系愈发紧密，他们的联系不仅停留在单纯的能源贸易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地缘、军事、科技等多个高级层面的广泛合作。在美国看来，伊朗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嵌在海湾的一颗钉子，钉死了美国的中东战略。同样在美国看来，三国间这种联系的加强的前景，就是在亚欧大陆上出现一个“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的反美大联盟，整个亚欧大陆将被控制在这个大联盟之下，而且由于这三大文明都处在亚欧大陆的最关键的地缘位置上，美国的影响力势必跌入谷底，而美国在亚欧大陆上的盟友——欧洲、日本、中东的亲美政权——将不得不臣服于这个大联盟，美国这些盟友的“边缘性”将不仅体现在地

¹ 所谓 3T 结合，是指“恐怖主义—专制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Terrorism—Tyranny—Technology）的结合。美国认为，在“9·11”之前，3T 中的任何两个 T 的结合都是可控的，但是“9·11”之后，这三个 T 愈发呈现出合流之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这 3T 的结合。与伊朗相比，伊拉克缺乏地缘条件，朝鲜缺少资源性威胁，这两个国家尚且被美国认为是重大威胁，那么“四毒俱全”的伊朗之于美国的威胁就更不必多言了。

²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22 页。

理位置上（欧洲、日本、中东都处于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且将体现在权力结构上（即它们将处于亚欧大陆权力体系的低端，臣服于中俄伊的大联盟之下）。这种恐怖的前景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必须掌控欧亚大陆权力的核心，哪怕它现在从中东收缩其力量，它也不能任由局势朝着上述“恐怖的前景”的方向发展。时不我待，美国必须在这种前景到来之前，就采取必须的行动，否则悔之晚矣。

3、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的必然要求

这一部分的原因，笔者在国内因素中的那两点已经有所阐述，在此不再赘述。要注意的是，美元霸权同石油资源的重要联系。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美国的打算就是通过让全世界为美国国债埋单和打回世界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来继续将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维持下去，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维持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就是个以战养战的霸权国家，可以说，美国“生而为战”（America is born to fight），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美元的流通本性、美利坚霸权的发展规律决定了美国必须一直打下去，必须一直沐浴在战争的血与火之中。从这点来看，美国霸权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级最发达的霸权形式，同时却又是原始最野蛮的霸权形式，它的高级和发达同它的野蛮和原始是并存的，正是因为它高级和发达，所以要求它不停地用原始和野蛮的“战争”的形式去维护这种高级和发达。这是美利坚霸权的阿喀琉斯之踵。

4、预防性战争的逻辑

最后一个原因：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这将是一场美国的预防性战争。也就是说，美国要在它还能进行一场维护其霸权的战争的时候进行战争，在它还能对前面说到的四种要素的结合进行控制的时候进行战争，以及在它还能对同样是前面说到的三大文明的大联盟的出现进行有效遏制的时候进行战争。

“预防性战争”理念最为核心的逻辑就是“当下比晚好”（Better-now-than-later logic）。斯蒂芬·范·埃弗拉在其《战争的原因》中强调，普遍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的以下五种假设使战争，特别是“预防性战争”变得更容易发生：①当国家对战争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②当首先进行动员或攻击的一方能获利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③当国家的相对力量发生剧烈变化时，也就是说，当机会与弱点的窗口都比较大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④当资源是可累积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控制资源能使一个国家去保护或获得其他资源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⑤当征服变得容易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¹其中，假设③特别符合关于霸权周期理论中由权力转移和变动所导致的全球战争爆发的论述。埃弗拉进而提出“窗口”理论，认为那些为战争创造诱因，也为处于衰落的国家推行好斗性的战争冒险政策创造诱因的原因，即“窗口”，能说明预防性战争的发生。特别是窗口使处于衰落的国家倾向于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早日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避免以后在更恶劣的环境下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避免以后由于处于弱势而被迫谈判。因此，预防的原理——“我们必须在我们衰弱之前进行战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战争动机。²

今天美国的“预防性战争”理论已经有所发展和衍变，其同“干涉”理论已经有了相交

¹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² 同上书，第90页。

义和趋同的发展。此外，美国现在的“预防性战争”概念已经由于其过多干涉而变了味儿，实际上掺杂了“先发制人”的理念。在这里我们必须辨别“预防性战争”和“先发制人打击”这两个看上去十分近似但却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这两者都强调要在对方行动之前就采取行动。然而，两者在动机、战争风险评判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概念辨析上，先发制人主要是指为了抵抗或打败迫在眉睫的挑衅或侵略，或为了在尚未发生(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战争中获得一种战略优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先发制人旨在获得先发优势，因而是在敌人防卫力量最小的时候伤害它。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先发制人可以是合法的。¹预防性战争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宣布在预防性自卫的条件下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打击)。国家进行预防性战争的理由往往是，别国未来会发动袭击，因此要努力阻止这样的袭击发生。预防性战争一说无异于承认威胁是遥远的，并且发动战争本身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通常情况下，预防性战争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不具备正义战争所要求的条件。²就此笔者总结出，“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差异：1、国家所受到的威胁是否明确；2、动机和目的，是确保不受威胁，还是机会主义的扩张主义（Opportunistic Expansionism）？3、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笔者认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辨别国家行为根源的重要依据。总之，辨别清楚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这点十分重要。

笔者在此认为，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将之纳入到预防性战争的范畴中考虑的话，其对美国霸权的维持的作用将不如以前美国所进行的战争。实际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显示出战争对于美利坚霸权的拖累性。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战争起家的国家，在历史上，它在每次战争中都越打越强，最终打出个世界霸主。但是，从阿富汗战争开始，战争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一种手段，已经愈发显现出其对霸权的“透支作用”。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那种过渡金融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美国所进行的战争却依然在为这种发展模式的延续服务，而由于这种模式作为目的本身已经陷入困境，所以作为维持这种目的的手段战争也就越打越错，最终导致了笔者所说的“透支作用”。

三、前景展望与相关预测

虽然笔者一再强调我并不是要预测美国是否会对伊朗动武，而是基于“美国已经对伊朗动武”这样一种假设来分析其动武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假设的前景，即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笔者想仍有必要讨论（预测）一下。

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它会采用何种方式来进行呢？最近的一件事情或许有助于我们就此作出合理的设想。这就是美国国防部在1月6日公布了最新的军事战略报告。这份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的报告建议放弃长期遵循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改而要求美军只需具备在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中作战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突发的冲

¹ 刘阿明、王联合：“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辨析——以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为例”，《学术探索》，2004年第11期，第68—73页。

² 同上文。

突中发挥“干扰破坏”潜在敌人的作用。这被称为“1+”战略。

这让笔者联想起五角大楼在2009年底设计出的一套新型战术——海空一体战（Air Sea Battle）。这种战术概念意指“通过海军与空军的协调作战，在战场内的各个领域消减对美军自由行动的挑战”¹。虽然有分析人士指出，海空一体战是针对中国军力崛起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新型战术设计，但是这种概念的产生必将会对美军以后的军事行动的战术安排产生影响。

结合新军事战略报告中提出的“1+”战略和“海空一体战”的新概念，笔者认为如果美国对伊动武，其形式将不太可能像伊拉克战争那样，以彻底推翻其政权并重建一种政治制度为根本目的，而是以摧毁伊朗核能力、迫使其放弃拥核和迫使其在石油等能源供应方面听从美国及西方的安排为目的。也就是说，就战争目的而言，美国将不寻求彻底颠覆现有伊朗政治体制（虽然它可能会逼迫内贾德下台），而仅仅寻求新领导者在伊朗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做出亲美和亲西方的政策选择；就行动方式而言，美国将不太可能采取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那种地面部队大规模进攻的方式，而是贯彻海空一体战的战术理念，采取类似于1998年“沙漠之狐”行动和1999年轰炸南联盟时那种海空配合、以大规模空袭为主的方式²（实际上，利比亚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海空一体战的实践）；在战争烈度和规模上，它将不太可能是一场规模太大的战争，而很可能是历时较短、破坏性较小的中等规模战争，同时美国将不太可能寻求像在伊拉克一样长期驻军，而是会像利比亚战争那样，在军事行动达成目标后迅速收手，以防陷入新的更大的泥潭，维护美国的行动自由和力量。³

一些我们可以想见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推出上述结论：

1、新军事战略和海空一体战要求美国必须改换战争方式，用一场高效率、低成本、低烈度、中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来达到其目标。同时，这也体现了之前所谈到的，美国推崇的现代战争理念，即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占领别国，而是为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提供武力支撑。

2、伊朗不是伊拉克，不能将解决伊拉克的办法在伊朗身上复制一遍。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远胜于伊拉克，如果像在伊拉克那样将伊朗的政权连根拔起，很有可能会使美国陷入另一个更恐怖的泥潭。美国刚刚从伊拉克完成撤军，不可能再在伊朗身上重蹈覆辙。如果要像在伊拉克那样的话，那么就必然要求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介入和直接的军事占领，在

¹ “how air and naval forces will integrate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operational domains—air, sea, land, space, and cyberspace—to counter growing challenges to U.S. freedom of action.” Abraham M. Denmark.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pp.165-182——作者注

²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海空一体战不是简单的采取大规模空袭和海上干扰的战术，它同时要求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与美国协同作战，对敌国的海上和空中军事力量进行精确打击，也就是说，海空一体战特别强调对于盟友的海空军事能力的信任和作用的发挥。这在海湾战争、轰炸南联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所没有或鲜有的（在上述几场战争中，美国并没有让盟友的海空军事能力发挥太大作用，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美军完成的，而利比亚战争则体现了英法作为美国盟友的军事价值）。同时，海空一体战强调打击敌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致命作战能力，比如致盲和打击敌国的太空和作战网络信息系统，防御和打击敌国的导弹系统，打击敌国潜艇等，让这些敌国的杀手锏无法发挥威力（因为同美国作战的国家基本都是中小国家，这些国家整体军事实力不如美国，但往往会发挥出一些“不对称”的作战能力，能美国及其盟国造成很大麻烦，让他们很头疼，海空一体战正是要对症下药，打残这些“不对称”的军事能力。

³ 实际上，战争目的、行动方式和战争规模这三者之间，是存在内在逻辑联系性的，基本上可以表示为“目的→过程→结果”的模式，即由于目的的简单性（即只寻求废除伊朗的拥核能力），导致行动的简单性（即不需要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介入，只需海空军将重点目标和设施炸毁），再导致规模的有限性（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的介入，也不需要在此长期驻军）。

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军完毕的情况下，让美国又重复一次历史的错误，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美国人自身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长处和短处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他们呼吁自己的军队要扬长避短，更好地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的作者）就在自己的文章中论述了美军的优点和缺点：“……美军非常善于制止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入侵，或者是在这种入侵开始之后扭转形势……相反，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善于用来统治他国，尤其是在那些文化上与我们完全不同质，在该国历史上对外来势力的干涉充满敌意，以及有着深刻的种族隔阂且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美国的军事力量更不易于用来统治他们……”¹有鉴于此，美国不能再重蹈在伊拉克的覆辙，因此如果美国对伊朗动武，会采取有别于对伊拉克的方式。

3、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不允许美国这么做。笔者依然坚持我之前的观点，即2012年是大选年，奥巴马正在全力寻求连任，选民当前最关心的不是在外打了多少胜仗，而是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因此经济问题将成为选战的核心议题，对于像奥巴马这样的领导人而言，在一届任期内发动两场战争无异于政治自杀。如果奥巴马仍然坚持在同一届任期内发动第二场战争，那么他也必须考虑到国内选情的变动，再像在伊拉克那样搞的话，必然连任无望。如果他是在赢得连任后，或者新总统上台后，发动的战争，那么依旧不大可能再像在伊拉克那样搞，从而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4、高昂的军费将严重影响经济复苏，造成美国国债的新一轮膨胀。美国人的确需要战争，但是他们要的是一场有限的、速战速决的战争，而不是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血腥厮杀。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一场战争来化解国债危机，因此他要求这场战争的规模只需要达到能够用来化解危机、为国债找到出路的规模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大的无边无际，像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那样将美国拖入深渊的“无底洞战争”，否则高昂的军费开支将彻底拖垮目前复苏有限的美国经济，同样将引发政治和社会更大的危机，扰乱美国国本。这不是美国人想要的。此外，美国调整军事战略，提出所谓“1+战略”，就是在削减国防开支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再因为一场天价战争搞出大量国防开支，美国将得不偿失。

5、伊朗背后隐隐的中俄两个巨人的身影将让美国投鼠忌器，不会让美国动作过大。之前已经论述过伊朗同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当然没有美国所担心的那种与伊朗、俄罗斯结为所谓“欧亚反美大联盟”的意图，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任由美国挤占我们的地缘战略空间。我们没有称霸欧亚大陆的野心，也不寻求反美和排美，但是伊朗的确是我们欧亚大陆上制衡美国霸权势力的重要砝码。美国人十分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之前论及的他们可能对伊动武的体系性原因之一，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中俄的存在，以及中俄可能的反制措施，美国也不会希望将战争搞得太大太久²。

6、盟友态度很重要。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欧盟否认已就对伊朗石油制裁达成一致。

¹ “……American forces are very good at preventing major conventional aggression, or reversing it when it happens. ……By contrast, the U.S. military is not good at running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cultures that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where history has left them acutely hostile to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when there are deep ethnic divisions and few democratic traditions”, 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Dec 2011, pp.134-150——作者注

² 前段时间盖特纳到访中国，寻求中国对于制裁伊朗的支持，但遭到中国反对，盖特纳此行毫无成果，空手而归；近日俄罗斯也对单方面制裁伊朗和对伊军事打击表示强烈反对。中俄两国态度如此明显，美国不会置之不理。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的发言人迈克尔·曼恩说：“我们仍在就进一步制裁伊朗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希望在将于本月底召开的欧盟外长会上就此达成一致。”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主任约瑟夫·詹宁也认为，即使欧盟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对于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实质效果，反而会推高油价，对希腊等重债国应对债务危机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这表明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还没开打呢，美国的盟友们就争论不休，如果真的打起来，伊朗的石油流不到欧洲，那欧洲岂不是更要闹腾起来？顶多坚持一个来月，受不了没油的欧洲人就会要求美国结束战事¹。

综上，笔者认为，除非发生某种影响极坏的突发性事件，否则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不会对伊朗采取规模太大的军事打击力度。

四、结语

结尾处，笔者依旧强调，我在本文中不是在预测美国会不会打伊朗，而是假设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会是什么原因，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同时我还想强调，我们应该尽快制定我们的外交大战略，少一些“应对”，多一些“预判”和“前瞻”，用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去迎接挑战，而非临时抱佛脚。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如果美国对伊动武，会是什么原因，即人的因素，国家因素和国际因素。其中笔者认为，国家/国内政治因素将会是导致美国对伊动武的最根本原因，但国际因素亦不可忽视。

此外，如果美国对伊动武，将从战争的方式、规模、性质上都与美国近十年来进行的几场战争都不一样，这是由其战争目的、战术战法等因素决定的。

最后，如果美国对伊动武，那么伊朗将是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的实力最雄厚、地区影响力最强大、背景最复杂、后果最严重的军事对手，美国必然慎之又慎，而伊朗也将把握一切机会与美国周旋到底。在这场纷争中，中国将不再能够超然世外，因为我们同美国和伊朗都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同这两国都有着巨大但不完全同质（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抵触甚至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利益，而作为有志于在构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大展身手的中国，美伊之争将是我们不得不跨过去的一道坎，是检验我们外交智慧和外交战略的一次大考验，中国外交应当甚至必须在这场博弈中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吴途勇）

¹ 除了欧洲，美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也对美国要求自己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反应冷淡。同时，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盟国（如沙特）对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也显示出异议，表明美国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态势，由不得美国单方面任意而为。

中国“印度洋困境”之印度因素探析

曾信凯*

【内容提要】“中国崛起”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对于中国崛起而言，印度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时，印度洋是世界海上贸易通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和贸易通道也是其他许多国家所仰仗的战略生命线。这就使得中国只有在印度洋上获得战略优势，才能确保自己的海上能源命脉、贸易通道不受制于人，还能在特殊时刻扼住对手的咽喉，能够有效地施加影响于西亚、中东、南亚甚至中亚地区。而另一方面，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并且也一直将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得中国在构建其印度洋战略之时不得不面对印度这一地区性大国的因素。本文着重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在遭逢印度对于印度洋的战略部署时所陷入的困境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 印度洋困境 中印关系

印度洋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枢纽，贯通欧亚非及大洋洲。从西方进入印度洋的两条重要通道分别是苏伊士航线与好望角航线。从东方进出印度洋的重要通道是马六甲海峡地区¹和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巴士海峡。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马六甲海峡，因为“它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海上航线。”²

同时，印度洋是世界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波斯湾石油蕴藏量更占世界的 60%，不仅存量惊人，而且开采成本低，运输便利。

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印度洋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和亚洲航程最短的关键性海上战略通道，素有“海上生命线”之称。印度洋航线集装箱运输量占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石化产品运输的 70%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³这些货物的运输均不可避免的要通过包括亚丁湾，阿曼湾以及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印度洋战略通道。世界贸易的 40%通过马六甲海峡，所有交易原油的 40%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⁴

一、中国的“印度洋困境”

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印度洋邻近石油蕴藏丰富的中东地区，同时印度洋的各航线也是欧美国家与亚太国家间进行石油与其他贸易物资运输的最短路线，因此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战略

*曾信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1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邮箱：zengxinkai1987@sina.com。

¹ 这里的马六甲海峡地区包括：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和望加锡海峡在内的诸多海峡。

² Bhabani Sen Gupta, T. T. Poulouse and Hemlata Bhatia, *The Malacca Straits and the Indian Ocean: A Study of the Strategic and Legal Aspects of a Controversial Sea-lane*, Delhi Macmillan Co. of India, 1974, p. 12.

³ Robert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88, No. 2, 2009, pp.19-20.

⁴ Robert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p.19-20.

地位。这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重要。

首先，印度洋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海运来完成，并且在与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中，临海国家占很大一部分。因此，海上通道的畅通直接关系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40%，进出口石油的 60% 都需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大西洋。中国与欧美、中东、地中海、非洲的贸易也由此经过。由于巴拿马运河的限制，中国同美国东海岸地区的远洋贸易路线已经改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直接到达北美东海岸。

其次，印度洋对于中国能源安全以及实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中国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巨大的石油需求量与单一的石油进口来源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这样看来，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及马六甲海峡就必然成为中国能源的动脉。因此，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也要求崛起的中国经略印度洋。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中国确保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西方关于“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的争论。2005 年初，被曝光的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称：中国正采取一种“珍珠链”战略，在中东到南中国海的海上通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表明了它保护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的防御与进攻态势。¹

但是，中国并不是直接的印度洋国家，由此带来的一个战略上的先天弱点就是承载中国 80% 以上能源运输的海上通道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军事控制之中。比如马六甲海峡，中国对其除了政治和外交影响外，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影响的存在。印度从独立之初就有着“印度湖之梦”，加上近年经济起飞与人口增长的压力，印度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偏高，同时意图在国际事务上施加影响力以展现“大国”的姿态，因此若能在邻近其领土的印度洋掌握主导权无疑对印度的力量有锦上添花的效果；美国也长期关注印度洋事务，以此来寻求其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安全，并藉此保障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日本近年来，为了保证其赖以生存的“西太航线”的战略安全，也开始频频涉足印度洋并且和印度进行多方面的合作。由此看来，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在印度洋的种种战略措施必然会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一定程度上相冲突。除大国因素之外，印度洋沿岸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平静的地带。由于存在着民族、种族、宗教以及语言、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矛盾以及对石油等能源的争夺，地区冲突以及国家内部冲突一直困扰着印度洋沿岸地区，对印度洋国际航道的安全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再加上海盗及海上恐怖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非海岸、索马里海岸、红海、亚丁湾以及马六甲海峡所在的印度洋地区，这就使得中国崛起所经略的印度洋战略还必须面对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因素。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对过度依赖印度洋的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战略安全威胁。一旦发生冲突或者突发事件，中国的崛起将受到重创。因此，中国崛起在战略安全层面上陷入了“印度洋困境”。

¹ “美关注中国海上力量抛出中国海军民族主义论”，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10-09-09/182721072660.shtml>, 2010 年 9 月 9 日。

二、中国“印度洋困境”之印度因素

（一）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纵观印度洋沿岸国家，印度无疑是一个大国。自 1947 年独立起，印度就一直怀揣着一个“印度湖之梦”，将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印度政府在 2004 年出版的《印度海洋学说》表示，“印度最重要的海上利益便是保证国家安全，而这并不只是守护海岸线与岛屿领地，同时还包含广大的海洋。”¹印度海军在 2007 年 5 月发表的《印度海洋军事战略》明确指出印度在印度洋的首要利益区：阿拉伯海以及孟加拉湾、进出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诸多印度洋岛国、波斯湾、印度洋上的国际航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发展自己的海权而进入抑或是筹谋进入印度洋的种种行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对于印度而言历来是戒心重重。使得印度加强自身对印度洋控制的印度洋战略大部分都以中国为假想敌。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前所长、核项目设计者之一桑瑟兰姆就曾针对印中关系提出了“C3I理论”²，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前文中，我们谈到了印度洋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在中国能源安全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得中国很自然地会选择与印度洋沿岸的国家进行一系列的能源合作。但在印度看来，这也是对其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比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就被印度视作中国在阿拉伯海取得的第一个战略据点，中国可以借此建设一条从瓜达尔港到巴基斯坦北部达尔本丁的铁路，以降低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石油的风险，但这使得印度如芒刺在背。³再如，印度也将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及缅甸等国建设港口的举动认为是中国企图建立一条保证能源安全，对抗并且威胁印度的“珍珠链计划”（String of Pearls）。

（二）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部署

在印度看来，若是中国借帮南亚国家修建港口而将势力深入南亚地区，则将挑战印度称霸南亚的梦想，印度势必无法在印度洋事务中予取予求，且其能源以及经济安全事务可能被中国所主导，因此在视中国为其主宰印度洋的假想敌之下，印度的印度洋战略构想自然以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发展为主。为了防止中国势力进入印度洋，印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准备和部署。

1、发展深水海军，强化海上实力

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研究报告显示，印度军队规模位居全球第四位，海军舰艇数量及总吨位目前排名全球第七。在印度洋上已经是仅次于美国海军的海上力量。同时，印度政府深知海军是推行海上战略的基础，要实现自己的“印度洋控制战略”就要有一支

¹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n Maritime Doctrine.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se(Navy), 2004. p.63.

² C3I 理论即：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rontation）、情报（intelligence）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时，印度和中国将积极寻求合作。但两国为了争夺共同的市场，将始终处于竞争状态。如果中印两国一直存在利益纠纷，那么两国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³ Carlyle A. Thayer, Jae Ho Chung and Brahma Chellaney. “Assessing Regional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NBR Analysis, Apr. 2008.

能够胜任此任务的“深水海军”。2007年至2012年间，印度将投入500亿美元实现现代化军队建设。在海军方面，将研发重点放在具有远距离飞行能力的飞机、航空母舰以及核潜艇上。并且计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建立两个航母战斗群，拥有140-145艘国产舰艇和核潜艇。在未来5年，将逐步建设一支以三艘航母为核心、力量均衡、具有威胁力的水上作战力量，确保从南海到波斯湾的任何一点上都有两艘航母存在。并争取建设一支由核潜艇和常规舰艇混编的水下作战力量，真正实现远洋攻击作战的绝对威慑。¹

对于中国崛起并且走向印度洋，特别是随着2009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变得更为敏感。对于中国崛起，印度的主流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竞争性大国的崛起，因此必须要采取制衡加接触的策略。2009年7月，印度第一艘核潜艇“歼敌者号”下水，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拥有陆、海、空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国家。既有制衡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意图，又有对于这一意图的物质力量，印度“东向政策”（Looking East Policy）中的中国因素凸显。²

2、调整海军战略，控制重要区域

印度一直以来都把海上战略要地和交通线视为海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近年来，印度为了有效掌控印度洋上的战略支点，控制印度洋上的重要区域，加紧了军事部署。

2001年10月，印度在孟加拉湾东部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Blaire)港设立了远东海军司令部，“其职能被定位于封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³在平时其可对印度洋的舰队和商船进行监视，“而在与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发生战争时，印度海军能迅速封锁马六甲海峡及其他从东部进入印度洋的通道。”⁴2005年5月，印度在其南部地区的加尔瓦尔地区建造了卡达姆巴超大型海军基地，并且成为目前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卡达姆巴海军基地的战略目的主要是保护阿拉伯海航路，承担印度洋的海上监视任务，这对提高印度控制阿拉伯海进而控制整个印度洋的长远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⁵2007年，印度向毛里求斯提出长期租借阿加莱加群岛。拥有了阿加莱加群岛，印度就能有效地控制莫桑比克海峡。由于超大型油轮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于是非洲好望角航线就成为其唯一的选择。印度若能控制莫桑比克海峡，就拥有了控制这条石油交通线的能力。同时，非洲是中国的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就对中国与非洲的海上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威慑。

通过以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印度就能在东、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加强防御与远洋进攻能力，实施其控制印度洋的战略，达到有效制服印度洋沿岸小国海军、有限遏阻周边大国海军进入印度洋，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印度洋的目的。

3、实施全方位外交，加强军事联系

为了实现印度自身的印度洋战略，有效遏阻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的行动不局限在南亚

¹ Iskander Rehman. “An Ocea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Emerging Maritime Narratives”, IDSA ISSUE BRIEF, July 11, 2011.

² Christopher Jaffrelot,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nd Asianist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India Review, Vol.2, No.2, 2003, pp. 35-68; Rajiv Sikr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16, No.1, 2009, pp.131-145.

³ 斯蒂文·福斯博格：“称霸印度洋之路”，《国际展望》，2007年第17期，第45页。

⁴ 王新龙：“印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论坛》，2004年第1期，第44页。

⁵ 张炜：《国家海上安全》，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次大陆，而是积极地对周边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与邻国的军事演习。

首先，印度通过发起或参加一系列的组织、论坛与周边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加强了战略合作，以牵制中国。尤其在 2008 年 2 月，印度海军邀请 28 个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海军司令（包括法国）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印度洋海军论坛”。¹《印度快报》2009 年 4 月 21 日报道称，中国希望加入“印度洋海军论坛”，但是遭到印度外交部的拒绝。印度外交部认为，没有理由让中国卷入印度洋事宜，因为中国对印度洋的“野心”已足以让印度不安。²其次，印度通过与邻国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来提升自身形象。2002 年，印度海军参谋长访问缅甸，2003 年与 2004 年印度副总统与缅甸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互访，使得印度与缅甸这个中国在东北印度洋的桥头堡改善了关系。同时，印度通过举办“印度·非洲高峰会”来扩大对非洲的战略投入，并且印度政府计划加大对非洲提供贷款。印度总理辛格也同时表示，印度将提供 34 个非洲落后国家商品零关税进入印度市场的优惠措施，同时将建立卫星与光纤网路系统，将非洲国家串联起来。³印度《经济时报》2011 年 5 月 19 日明言，印度投资非洲是为了“抗衡中国对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称印度总理辛格将在峰会上宣布多管齐下的新策略，抗衡中国崛起在非洲的影响力。辛格将给非洲带去“不同于中国的甜头”。⁴最后，印度通过与周边国家以及部分涉及印度洋利益的大国进行频繁的军事联系来塑造自己的印度洋大国形象。比如 2004 年与斯里兰卡在孟加拉国湾举行了首次军事演习，并在 2011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斯里兰卡东海岸再度举行军事演习；并且与东盟国家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维持秩序、打击海盗、走私以及其他的海洋通道安全；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卡塔尔和阿曼等国加强海军力量之际，作为他们的国防服务提供商，借机进入阿拉伯沿海、印度洋、南中国海等诸多港口。⁵频繁的军事演习一方面增强其对周边国家的威慑力和控制力，一方面也有助于印度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

（三）印度的“联美策略”

自印度独立以来，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就一直萦绕在印度领导阶层的心中。可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印度一直都将中国视为自己走向复兴的一个最主要障碍。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冲突和历史恩怨的纠缠，印度一直都对中存戒心。一直以来，印度都希望能够制约崛起的中国，以防为自己带来不安和威胁。但印度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单凭自身实力无法完成这一目标，而正好美国也希望将印度拉入其战略轨道，利用印度在南亚的战略地位来保持亚洲的力量平衡，实现其自身的地缘战略构想，同时也能借助印度的力量来制衡俄罗斯与中国。因此，拉拢美国自然成为印度印度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¹ 钱帆：“目标印度洋：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与印度的‘铁幕’政策”，《现代军事》，2010 年第 5 期，第 79 页。

² “印度洋海军论坛” 印度洋海军论坛由印度主办，截止到 2009 年，共有 33 个会员国，主旨是通过合作建立印度洋安保机制。2008 年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一届会议，出席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埃及、法国、斯里兰卡、南非等。<http://gb.cri.cn/27824/2009/04/22/2685s2491130.html>。

³ 《青年日报》（台湾），2008 年 6 月 15 日，第 7 版。

⁴ 《印媒称非洲进入“印度时间”》，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5/1704976.html>，2011 年 5 月 20 日。

⁵ Pranab Dhal Samanta, “Start Getting Used to DSP: Defence Services Provider”, Indian Express, January 1 2008.

印美两国为了制约中国而采取的战略合作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主要变现形式为三类：军事演习、军事合作与联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印度与美国从 1992 年开始就在印度洋上联合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联合军事演习。在 2007 年的军事演习中，美国甚至同意印度进入其卫星系统。印度与美国在 2005 年 6 月签署了《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NFDR)，并于 2009 年 7 月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包括民用核子协议。除此之外，2001 年 4 月开始，印度海军就开始与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为过往船只联合护航，打击海上恐怖主义。

对于美国来说，为了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亚洲力量的平衡，会将继续支持印度的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包括与其战略武器发展相关的尖端技术的支持。比如 2011 年 1 月，美国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India's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等 9 家与航天和国防工业相关的印度公司从出口限制对象“实体名单”中除名，以扩大对印度的高端技术出口。另外，美国还将考虑在反潜战斗训练以及海洋监视能力方面给印度提供帮助。¹

三、印度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

虽然，印度为了实现自身的大国梦想，同时也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印度洋地区进行频繁的战略部署，但是，印度的种种抱负与雄心却面临着诸多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可以大体上分为国内因素以及国际因素。

从国内方面来看，限制印度自身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沉重的人口负担以及部分人口的贫困问题。印度人口总数仅次于中国，并且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过快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使印度实力的发展打了折扣。并且根据官方统计，印度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除非印度政府能够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无论是印度的军事实力还是其作为核国家的荣耀，均不能给予其世界领导地位。²其次是国内严重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印度前陆军参谋长 V·N·夏尔玛曾指出印度最大的弱点不是经济，而是内部不和。印度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边界上的敌人，而更可能来自内部的民族、种姓和宗教之间的暴力活动和与日俱增的政治斗争。然后是国防开支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随着印度大国梦的发展，印度军费的增长近几年都保持在一个高位水平。比如据 MarketWatch 网站 4 月 18 日报导，2010 年，印度军费支出 413 亿美元，占 GDP 的 2.7%。但是印度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 10% 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³而印度 2010 到 2011 财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 5.1%。⁴同时，印度财政部 3 月 3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印度外债总额为 2975 亿美元，仍保持连年增长态势。⁵印度的雄心与经

¹ Lisa Curtis and Dean Che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Strategic Vision for U.S.-India Relation", Background, NO.2583, July 18, 2011, pp.12.

² Sumit Ganguly, "India's Foreign Policy Grows Up",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ume XX, No.4, Winter 2003/04.

³ 缪鹏年：“印度崛起：五大难题待解”，《世界知识》，2005 年第 10 期，第 30—31 页。

⁴ “印度 2011 年财政赤字预计占 GDP 4.6%”，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yzjj/20110301/09499449453.shtml>，2011 年 3 月 11 日。

⁵ “印度 2010 年底外债总额增至 2975 亿美元”，北方网，<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11/04/01/0>

济现实之间的落差需要印度好好的审视。再次，非暴力思想和尼赫鲁主义的影响。印度的领导人受到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在战略上大多实行“自我克制”。并且印度官方继续坚持不结盟的尼赫鲁主义政策，仍然希望组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联盟，以此来平衡传统的以及新兴的世界势力。但是国际秩序的迅速并且深刻的变化已经使得印度失去了实行这类政策的客观环境。最后，印度军方和文官政府的关系尚未理顺。在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属于政府事务，仅限于总理和几位部长，甚至国防部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都一直不大，这就导致了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长期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这就使得印度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步履蹒跚。¹

从国际因素方面来看，印度战略实施的国际制约因素首先体现在南亚地区的地区安全结构上。在南亚地区，印度与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共同组成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不管是从人口、历史、文明等因素来探视印度，其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区性大国。但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却尚未被其他国家所普遍而明确地接受”。²在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眼里，印度仍然是一个霸权国。所以，如何树立一个良好的“崛起形象”，创造一个良好的“崛起周边环境”以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是印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是印巴安全的困境的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从1947年起就因为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冲突不断。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加上“克什米尔”这个“结”，对于印度来说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没有在克什米尔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的迹象。如果印巴之间的冲突不能解决，印度的影响力将仍然局限在南亚以及周边地区。然后，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同样面对海权和陆权的矛盾。虽然印度一直有一个“印度湖”之梦，但是其北部陆地的边界问题和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同样突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印度对印度洋的关注。最后，印度同样面临着“马六甲困境”。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等物资以及从东亚进口的其他物资，都需经过日本海、南中国海及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本国。印度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保证其在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安全。

此外，印度与美国之间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真能成为印度自身印度洋战略的一个战略构成。虽然美印之间有短期的战略相互契合，但是两国的最终海洋战略目标是矛盾的。而对于美国而言，联合印度主要是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的，既能牵制中国又能以较低的战略投入达到战略目的。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加强，美国也必然会对印度多加留心。美国国内也有人对美国联合印度持消极态度。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认为印度是一个对包括美国、西欧和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有威胁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联印战略”必然是短期的、易变的，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并且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联印战略”的动因是多重的，不仅仅只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还包括印度军火市场的巨大缺口对美国的吸引、印度对俄罗斯军事装备性能熟悉、两国共同的海上利益需求以及两国在战略上的短期目标契合等。

06294118.shtml, 2011年4月1日。

¹ “扶不起的阿三：印度军事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中国军事网，<http://www.chnmilitary.com/html/2011-02/61522-3.html>, 2011年2月24日。

² 陈东晓：《大格局——2020年的亚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同时，美国与印度对印度洋的雄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联印战略”的发展。尽管美国和印度在印度洋的合作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可是美印之间的合作却也同样存在致命的矛盾。美国是印度洋战略是想取得印度洋制海权。其联合印度的初衷是为了把印度纳入自身的全球战略轨道，使印度成为其平衡亚洲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棋子。而印度同样把印度洋看作是自身发展的关键，意图将其变为印度的内湖。美印之间在印度洋的合作，目前主要是针对中国崛起，防止中国进入印度洋。但是两国之间长远的海洋战略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四、中印战略合作的关键突破口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同为亚洲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必不可少的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摩擦。可是，对于中印之间来说，却完全可以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当下，寻找到战略合作的突破口，从而削弱两国相互间战略制定的敌意和误解。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维护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大局出发，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又能够与全球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印度洋战略，努力探寻新的外交途径，通过多种外交方式在国际事务中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印之间并不缺少战略上的合作。两国间通过建设战略对话机制、有效管控边界问题、在经贸及能源合作方面探寻新的路径等方式加强战略互信，建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印也在亚洲及国际事务中开展多种方式的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抓住“金砖峰会”这一中印合作的新平台，解决两国间贸易不平衡问题，加强经济外交及公共外交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用经济带动政治、民间促进官方。

再次，中印两国同属于东方文明国家。中印两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复兴或者是崛起。基于此，两国之间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掌握主动权，切实地践行和弘扬东方价值和东方文明。

最后，中印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结构性共同点，这就为中印关系在主线条上表现出稳定和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民生。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环境改善之间怎样去寻求平衡，使大多数人能够在发展与改革中受益是两国领导人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看到这些关键突破点，在外交中注重求同存异，就能切实地削弱两国间的战略不信任，从而在战略策划及实施过程中能有避免将对方视作是假想敌，促进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与全球协调。

五、结语

中国在“十二五”计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保障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维护海上利益。现实已经将海权的问题摆在了崛起的中国面前，那么中国要想维

护自身的能源及贸易安全，就应该制定明确的印度洋计划，并积极的开展外交，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印度方面一直将中国在东南亚、南亚等印度临近地区的外交活动视为对印度的直接威胁，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视为对印度的间接威胁。在印度看来，中国在印度洋上同一些国家的合作项目都对印度形成巨大的压力。比如，中国同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被印度看作是中国在阿拉伯海取得的第一个战略据点，中国可以借此建设一条从瓜达尔港到巴基斯坦北部达尔本丁的铁路，以降低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石油的风险，并且认为中国和缅甸合作建设的由伊洛瓦底走廊通往云南的铁路可以使中国的势力直接延伸到孟加拉湾等等。¹所以，印度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都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将中国视为其崛起路上的最大障碍与最不稳定的因素。印度的印度洋政策即是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关系仍然将是复杂而多变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对于印度而言，和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的，但是为了弥补两国的差距，遏制中国势力进入印度洋造成对印度的威胁，中印之间要想真正消除敌意，还尚待时日。这就成为了中国印度洋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极不稳定因素。

展望未来，中印两国目前都以经济发展和国内局势稳定为重，都将建设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和平的周边环境看作是当务之急，因此尽管暗中角力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似乎却不可能演变为正式的公开对立。不过，崛起的中国走向印度洋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实战略问题，所以怎么样走好印度洋战略之“路”，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而其中处理好同印度的关系又是重点和难点。中国崛起的印度洋战略之“路”是有的，可是却需要很好的把握。表面看来，印度洋万里晴空，实则暗流涌动。在海权的发展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时，印度洋注定不再平静。

（责任编辑：孙超、吴途勇）

¹ Carlyle A. Thayer, Jae Ho Chung and Brahma Chellaney, Assessing Regional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NBR Analysis, Apr. 2008.

从柏拉图的“洞穴”到希区柯克的“后窗”

姜边*

一

在偶然之中，我读完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寓言”，紧接着重温了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不自觉地将“后窗”与“洞穴”联系起来。起初连我自己都质疑这种联想是否自然、是否有逻辑，觉得这种联想似乎只是由时间安排的先后顺序下的巧合。因为柏拉图是在《理想国》第七章讨论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差别时作出“洞穴”之喻的，而对希区柯克“后窗困境”的主流解读是偷窥的道德问题，似乎二者探讨的主要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培根曾说过，“我深知，寓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你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一丁点技巧和诡辩就可以轻易地把不属于它的意思强加到它头上，但看起来合情合理。”于是我决定不妨相信直觉，跟随它尝试着开辟一条从柏拉图“洞穴”到希区柯克“后窗”的“合情合理”的小径。

二

柏拉图开启的洞穴世界与希区柯克推开的后窗世界都关乎“影像”，这是二者直观的相似之处，可以作为这条路的起点。

洞穴假说是《理想国》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一群囚犯从小生活在洞穴底部，脖子被锁住，始终不能回头，只能看前面的洞壁。身后上方有一堆火在燃烧，还有一条横向的小路穿在他们与火之间。火与路之间又有一堵不高的墙，一些人举着桌椅之类的人造物沿墙而走。火光把这些人造物高于墙的那部分的影子映射在囚徒面前的洞壁上。由于这些囚徒的脖子被锁住，从未回过头看过人造物本身，于是就一直把看到的影子当作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后来，一个囚徒偶然挣脱枷锁得以回过头看，这才明白：原来是火使他看到那些影子，火才是光明的来源，那些影子仅仅是桌椅等具体事物的影像罢了。如果，他被往上拉出这个洞穴来到外面世界，他会在阳光下看到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最后，当直面太阳，他才真正了悟光明的终极来源。虽然，每一步的上升、每一次转向光、每一次更接近光源，他都会眼睛刺痛，恨不得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一旦他习惯了 this 崭新的明亮世界，就会为自己挣脱以前的黑暗愚昧状态而深感庆幸，并悲悯仍在洞穴里继续生活的同伴。

洞穴是一个世界。柏拉图明示，洞穴中这些囚徒其实就是我们这类普通人——旧习难改、陶醉于影像世界的芸芸众生。如今看来，这洞壁可以是我们每天接触的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也可以是我们固定的生活轨迹，抑或是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关于真善美的标准、社会习俗、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通过不停向我们呈现“真”的影像，它们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该怎样使生活继续；而洞穴就是由这些并非真实本身而仅由真实的影像组合搭建

* 姜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的现实世界——每一个人都处在洞穴之中，却很少有人有这种自我意识；能超越置身其中的观念洞穴进行反思的人就更少，人们迄今为止的许多认识往往是我们自身难以意识到的对本已失真的影像的再次折射。

既然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挣脱枷锁走出洞穴，走出洞穴的人便有一个使命：下行返回洞穴之中，启蒙洞穴中人，“解救”他们，让人们转过头去接受灵魂的转向。转了向的灵魂看到了火，得到了光明。然而，习惯就是生活与常规这架马车飞速奔跑时产生的巨大惯性，使任何企图改变方向的念头被瞬间抹灭，加之驯顺至少能在错觉上释缓命运枷锁带来的重压，这些注定使普通人的灵魂转向变得无比艰难。真正被启蒙的得救之人因而也少之又少。这就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揭示着人们的囚徒本质，质疑着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昭示着人们反思和抵达本真。

三

透过希区柯克的“后窗”，也能看见两个“洞穴”世界：窗外的市民生活图景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窗内男主角杰弗瑞的世界是一个“窥探者”的世界，或者为避开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不妨先称之为“旁观者”世界。

时值纽约盛夏，主人公杰弗瑞和他周围邻居们家里的窗户都日夜大大敞开。摄影记者杰弗瑞以前经常周游世界到处摄影，而现在由于一条腿摔断被打上了石膏。就这样，这个曾经生龙活虎、如今却被固定住的可怜人儿的生活仿佛顿时冻结和凝固了，他只得接受命运的“封锁”，在这个狭小空间中一架轮椅上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于是他家大大敞开的后窗成为其关注外界的唯一镜头。出于职业习惯，他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邻居们。一幅幅生活图景构成了第一个“洞穴”世界：一位美丽性感的舞蹈演员每天忙忙碌碌做家务和约会，生命在她轻盈的舞步中仿佛生生不息；一位单身作曲家终日坐在钢琴前努力创作，而一楼那孤独的“寂寞芳心”小姐日日渴望着她迟来的爱情，生命的活力与这两个互不相干却同样寂寞的人儿漫不经心地擦肩而过；在三楼阳台，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白天用竹篮把小狗放下院子去玩耍，每晚又睡在阳台上消暑过夜；二楼上，推销商和他久病卧床的妻子在争吵中继续磨损着他们本已脆弱的情感纽带；而一对刚搬进公寓的新婚夫妇借着绵绵的亲热，仿佛加固着被永远放下的窗帘挡住的婚姻的城墙……在这个“洞穴”里，杰弗瑞透过窗看到的邻居们就像一个个洞穴囚徒，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都被命运枷锁牵制着走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不曾回头，不曾转向。其实杰弗瑞也是这个洞穴中的人，不同的是由于身体无法自由行动，才被迫“锁”在这里。杰弗瑞厌倦了乏味的生活，希望尽快卸掉石膏、挣脱“枷锁”，逃离洞穴，回到他那充满刺激和快感的自由世界（这在影片开始杰弗瑞打的一个电话中就有体现）。作为对画面具有敏感素养的摄影记者，他似乎是这个洞穴中唯一被教育和启蒙的人。我们通过影片对杰弗瑞安坐轮椅上注视窗外时各种微妙的表情变化（抬头，眯眼，皱眉，微笑）的特写镜头发现，与忙忙碌碌、毫无觉察的邻居们相比，他显得那么高高在上，颇带玩味似地捕捉着市井生活的画面细节，但又宛如上帝般洞察一切、感知一切、了悟一切。比如，眼前构成的婚姻生活图组——从新婚夫妇的所谓甜蜜到无子女夫妇的单调生活再到推销商夫妇婚姻的裂

痕乃至最终的仇杀——重塑或加重了他消极的婚姻观念，这很可能是杰弗瑞拒绝与女友莉萨的婚姻的重要原因。再如，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日日夜夜的守望，他较肯定地推测出二楼推销商可能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而周围其他邻居却对此毫无感知，继续着每日的生活。

这就是后窗中的第一个“洞穴”世界。在希区柯克的安排下，我们通过杰弗瑞的视角和他手中的镜头看到了日常生活一如既往的平淡，婚姻被岁月消磨和埋葬，以及人性的残忍和弱点等等。这是杰弗瑞和我们将灵魂转向“后窗”得到的“光明”。

四

然而，“后窗”的微妙之极在于：它也是一个向内敞开的世界——杰弗瑞这个“窥探者”的世界。在发现窗外的“洞穴”世界时，主人公同时不可避免地打开了自己的“洞穴”世界。在第二个“洞穴”中，杰弗瑞成为了囚徒。

首先从其特殊的职业身份——摄影记者——开始。1826年世界上第一台相机诞生，随后照片的库存开始于1839年，因而这一年被称为摄影技术的诞生之年，此后，几乎任何事物都被拍摄过。二十世纪以来，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对“摄影”行为本身进行了严肃反思，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来自苏珊·桑塔格1977年出版的文集《论摄影》。她冷静地向人们论述摄影的捕食性、偷窥性和侵略性本质，像柏拉图那样引导人们质疑由摄影影像构成的世界的真实性。透过《后窗》我们发现，希区柯克在五十年代已敏锐洞察到摄影的偷窥、侵略本质及其发人深省的道德困境。由此看来，“摄影记者”这一身份的选取具有深刻寓意。摄影师习惯于窥探、捕捉和记录现实生活中的画面。出于职业要求，为获取一张好照片，他们不知不觉地越过“此”与“彼”之界，久而久之改变并扩大了人对于“什么才值得看”和“有权利去看什么”的观念。同样是出于职业习惯，摄影记者杰弗瑞透过后窗这个“大镜头”并借助望远镜和相机清楚地偷窥别人的生活。的确，在一次举着望远镜时，杰弗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处于道德困境之中并产生了纠结情绪，但后来仍然敌不过好奇与窥探的人类本性，或者说挣脱不了职业惯性套在他头上的枷锁，偷窥行为继续着——高高站在第一个“洞穴”世界之外杰弗瑞其实是另一个“洞穴”世界的囚徒。

由于一条腿断了必须坐轮椅，杰弗瑞只得通过一扇后窗、一台相机与一场疑似凶杀案建立紧张的关系。因为暂时不能活动，他无法对看见的事情采取身体行动，如此一来拍照就变得更为重要。现在摆在杰弗瑞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场凶杀，这自然而然使我们对其偷窥行为的道德谴责平息不少，我们甚至鼓励他继续窥探以挖掘出事件真相。情节发展至此，我并未继续纠结于自己作为观众道德立场的转变，反而猜想希区柯克为什么提供给我们一个被“固定住”的拍摄者、一个相机镜头（有时窗也可以作为相机镜头）和一场残忍的罪恶？或许，增强戏剧效果的情节与缘由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观众将其统统剥去后迎面呈现的赤裸裸。这有可能是导演对拍摄行为本身的一种特殊解释手法：如果将影片中一些附加缘由去掉——如去掉杰弗瑞断腿这一原因，仅仅假设他就是一动不动站在镜头背后；又如砍去他察觉这是凶杀后向警方求助却无果的剧情交代，仅仅假设他不进行任何求助而是继续鼓励事态的发展以便将镜头对准进行记录——那么拍摄这一行为立即简约和降级为：拍摄者举着相机将镜头

一直对准继续发生的罪恶。这一不小心滑落到苏珊·桑塔格在后来七十年代提出的一场严肃批判之中。

“任何事件，一旦在进行之中，无论它有什么道德特征，都不应加以干预，而应任其自行发展和完成”¹——苏珊·桑塔格认为，这一规则被悄无声息地设置成摄影师为世界增添一张好照片的默认前提。摄影的意义在于：当镜头面对的事件结束后，照片中的影像将继续存在，赋予事件在别的情况下无法享受到的某种不朽性或重要性。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解读：当真实的人在那里相互残杀，当罪恶在肆无忌惮地疯狂席卷，摄影师留在镜头背后，努力创造着一个不朽的影像世界。这种行为实际是一场宣誓，宣告自己与眼前场景的果断决裂。再次回到希区柯克的影片开头：鉴于杰弗瑞的偷窥行为，健康护理员斯特拉半拉着脸地将他戏称作“window shopper”。如果细细品味，这个英文短语极有寓意：“窗口购物者”，只是浏览商品而不购买商品——拍摄者就像这种“shopper”，有着置身其中和现场参与（即“shopping”和“possessing”）的欲望，却极力克制以便置身事外。类似的“置身事外”还体现在影片后面：为寻找杀人证据，轮椅上的杰弗瑞企图用计把推销商引出公寓，他对两个搭档说，“我们已经吓唬他一次了，或许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哦，可能用‘我们’一词不大合适——一要看‘你们’的啦。”这是对“我”和“你”进行清晰界定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台词，但却隐藏着发生在拍摄者身上的悖论：为获取好照片，他们拆除了“此”与“彼”的道德界限；同样为获取好照片，他们构建起“此”与“彼”的身份界限。摄影的职业意识外溢到摄影师的日常生活领域。

“摄影基本上是一个不加干涉的行为。”（苏珊·桑塔格）一些新闻摄影呈现的令人难忘的惊人画面如此恐怖，但是如果回过头去想想，我们意外发现：更加恐怖的是，摄影师有机会在一张照片与一个生命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下，竟然优先选择一张照片。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记录”与“干预”无法同时进行：干预则无法记录，记录则无法干预。²要想得到一张好照片以永远记录此情此景，就只能缄默地站到镜头背后，鼓励正在发生的灾难继续下去。这种不加干预的行为或者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样存在于《后窗》中——当杰弗瑞的女友莉萨为寻找证据潜入推销商房间而后被推销商捉住并折磨时，窗户后面无法移动身体的杰弗瑞揪心地目睹着惨剧持续却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只能畏缩于黑夜的死角，在近乎徒劳的极力克制下发出压抑的惨叫——这是我认为这部影片中最痛苦、最重要的一幕，甚至比希区柯克始终未以场景呈现、仅仅“概念”灌输式地加以构建的所谓“凶杀案”本身更能带来触目惊心的绝望和无以名状的疼痛。拍摄者——杰弗瑞——压抑的不是惨叫，压抑的是人性——正义感，良知，愤怒，爱情，还有尊严。无论出于怎样的客观原因，在这一生死攸关的瞬间，作为判断能力健全的“人”，无力阻止面前的罪恶；作为高大健硕的“男人”（“a reasonably healthy young man”），竟然无力从眼前的罪恶中拯救出“我的女人”；甚至连出于本能反应的一声“怒吼”都被压制了——那么，“我”究竟算作什么……这是极限挑战。当然，也可以这样作出善良解读：出于人性的良知，摄影师面对残酷时虽然藏在镜头背后，但很可能内心经受着痛苦挣扎——人性在不断的感官刺激中被压迫着复苏和释放，

¹ 参见[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² 参见[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即便如此，这样惊醒的情感认知已然被诡异地打上畸形的胎记。

以上这些是面对后窗内的“洞穴”世界作出的思考。在希区柯克的导演下，这些思考更多地向内直指人心本身，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导向一段“下行”的心底旅程。杰弗瑞被囚禁在自己的洞穴中，逃脱不了人类天性的枷锁，也逃脱不了职业与身份的枷锁。

现在将后窗的两个世界联通为一个“洞穴”世界，会构成一副有趣的图景：囚徒杰弗瑞的后窗不再被解读为隔开虚实世界的洞穴之门，反而是柏拉图洞穴里的洞壁，向杰弗瑞放映着生活的影像，而他手拿相机觉得看见了生活的本真，却不曾回望自己真正的生活究竟怎样。

五

这段观影旅程足以令观影者“我”内心失重，恍若一场心灵的自由落体运动，行至此处似乎该将着陆。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到此完结，如若再作思索，“我”会掘出一个尘封已久、埋藏更深的“洞穴”：针对《后窗》这部影片而言，“置身片外”的观影者“我”，其实正深陷希区柯克用诡秘手法设置的“洞穴陷阱”之中。作为20世纪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之一，电影及其影院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描述的“洞穴”情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不仅影院空间如洞穴空间，而且两千年后的影院观众如两千年前的洞穴囚徒对光影幻像倾注着同样的激情与迷恋。不妨猜想，柏拉图以其超脱于时空概念的先知先觉，作出了关于这个随后被久久尘封两千年的“洞穴”空间的古老预言。

电影和影院的相遇不仅塑成了一个奇特的体验空间，而且形成一套无形机制。自影片放映的那刻开始，黑暗的影院机制就自动生成两条并存且平行前进的时空线索——一个观影者所处的时空，一个影像时空。影院观影过程中，观众这一主体在其自身所处的时空里，如上帝般全知全能，经历着无数的悲欢离合，感悟着无尽的爱恨生死，自己却毫发无损。“我”在观影过程中如痴如醉，银幕形象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勾连着“我”潮水般涌动的情感，“我”却从不会、也绝不会试图闯入银幕世界加以介入和参与。在这个时空中双眼投注银幕的“我”，不正如《后窗》里透过窗去满心好奇地观望邻居生活、束手无策地旁观女友受折磨的主角杰弗瑞吗！

同时，另一个时空里，电影和影院又融合为一套无形机制。这个以观影者之在场为其存在的价值前提、并行于观影者所处时空的影像时空，此时此刻却是基于“观影者之缺席”这一关键性假设而运行的，因此这套无形机制实质上创造着一种“窥视机制”¹，“内在地召唤着一种‘窥视’行为”（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或许回溯影片制作过程能助于理解这一秘密：为了制造出影片场景的真实性，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其摄影、表演、录音、场面调度等都必须以此时“缺席的在场”——未来观众的观看——为前提。²为了实现影片本身价值，通俗地说，影片为了使自身被人观看，首先必须要自觉实践“没有人在观看或讲述，是故事在自行涌现、自行讲述、自我呈现”（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这一关键性的假设。这样制造出来的流动画面，如今悬空延展，融入黑暗影院并兀自铺呈而现为自成

¹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²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一体的影像世界。那似以“冷漠”世事之洒脱在时空中孤独流淌的连贯画面，实质上深深依赖着世人关注的眼睛：它以投世人所好之狡黠，诡秘地将观众先在地安放于一个窥视的位置，然后借黑暗抹去所有轮廓，有时一不小心也抹去了人的道德顾虑，只剩黑暗中放映机投射出单一的光源，一场别人的故事在一个长方形的明亮空间银幕上上演。

“我”此种现实处境，其深刻意义在观看一般影片时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展现，然而，恰恰是在观看《后窗》——一部以“窗”为偷窥视角、内涵极为丰富的电影时，这一尴尬困境自发而超然地完成了它的自我构建：在《后窗》中，观众很可能借挖掘凶杀案真相为由转变道德立场，鼓励主角的偷窥行为，然而关键是，希区柯克所谓“凶杀案”本体至始至终都未呈现给观众，它永远是在被话语以及其他的本体以外的客体一步一步进行概念的构建。有谁真正质疑过凶杀案的“真相”？有谁从自身体内那股神秘的冲动中突然惊醒？有谁从这突如其来的多重视觉窗口偶然相遇并瞬间重叠而引发的心灵共振中猛然顿悟？这才是希区柯克对观影者略带戏弄的严厉拷问。一切都那么令人哑口无言，却又那么不言自明：“我”在黑暗中窥视着一个偷窥者的世界，“我”全然无知地置身“洞穴”里凝视着“洞穴”中全然无知的那个荧幕符号——偷窥的冲动是人之本性，希区柯克创造的荧幕形象只是集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于一体的观影者头脑中那个想象的能指。

“我”所凝视的“形象”不过正是那个隐蔽的自我，要明白这一点或许很难；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洞穴”之中，要认清并思考这一点或许更难——然而，只要人的思考永不停滞，那么人的心灵就永不着陆；柏拉图将“洞穴”之门开在悬崖边上，自他推门的历史性刹那，人类思想与心灵就开始了朝向深渊的永恒的自由落体。

六

今天，人们身陷影像泛滥的世界和道德悖论的怪圈中，反思世界的真相变得更加困难却意义重大。柏拉图昭示人们走出洞穴世界接近真相本身；而希区柯克暗示人们，当走出一个洞穴世界时很可能同时走入了另一个洞穴世界，探索真相要付出昂贵代价，真相背后还有真相，这指引我们永无止尽地思考和质疑到底什么才是真相。这条试着被开辟的小径，从柏拉图的“洞穴”通往希区柯克的“后窗”，继续延伸着去窥探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孙超）

激情、自然与神罚

——读柏拉图《理想国》札记

尹亮*

在《理想国》第四卷中，苏格拉底从谈论城邦正义转向个体善，着重探讨了灵魂的三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基于翻译和柏拉图本人语境的模糊性，激情（thumos; spiritedness）成了古今聚讼的焦点所在（暂且用“激情”一词）。

苏格拉底对激情的定义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而愤怒，则“有时作为欲望之外的一个东西和欲望发生冲突”。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在灵魂中，激情“非常宁愿站在理性一边”。激情与理智似乎天然便是盟友。但这种和理性是天然盟友的激情乃是一种高贵者（灵魂）的激情，只有在良好教育下，才能与理性结盟。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一个人（灵魂）越是高贵，才越能激起对不正义的愤怒，从而站在理性一边。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事实上隐含着激情自身的再划分，也就是好（good）的激情与不好的激情的区别。好的激情与理性联盟，这可以断定。然而，不好的激情呢？或者说，不那么好（Not so good）的激情又当如何？

如果我们再对照格劳孔的这段话：

“人们在小孩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差不多一出世就充满了激情，但是有些孩子我们从未看到他们使用理智，而大多数孩子他们能使用理智都是很迟很迟以后的事情。”（页 168）

苏格拉底并未否认这段话，反而有所赞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刚出世的孩子，恰恰远离了城邦教育（无论好坏），处在城邦教化之外。因此，如果按照一般理解（譬如卢梭对原始人类的解释），这种离自然最近的孩子，他们生来便有的激情应当是有好也有坏的（也无好无坏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激情天然与理性便是盟友，那只能是因为在城邦教育中，统治者给这些“天真的灵魂”在灌入理性的同时，带来了好的激情。换句话说，这种好的激情的获得，或许正是人类远离自然并产生“不平等的起源”。

但是请注意，这种几乎是生来就有的激情，却似乎恰恰不包含在柏拉图笔下的自然之中。《理想国》中的“自然”，显然有另外一番与后世理解不同的特质。比如下列论述：

“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页 147）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金银铜铁各司其位，才符合“自然”。如果打开思路的话，亚里士多德的那句，有人天生（by Nature）是奴隶，也和柏拉图在这里的自然观念一致。我们似乎可由此重新品味斯特劳斯学派“古今之争”的特质：重新解读自然。

基本可以断定，在《理想国》中，好的激情方才属于自然。

然而，正是由于《理想国》里的激情不属于理智更不属于欲望，这个灵魂中奇妙的部分似乎将我们引到另一个极端神妙的部分——第 10 卷最后的那个关于灵魂不死，另一个进行

* 尹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神的裁决的世界。我们知道，这种对神的认信，对灵魂不死的认信，不属于灵魂的理智，因为我们无法用理性来断定厄洛斯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用理性来论证是否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不朽世界；更无法用欲望来解释我们对神的渴求。而如果我们承认一定要以灵魂内部的某种东西为基础才能建立这种信念、这种连接，那么在灵魂的三分中，唯一可能的部分便是激情。

如此我们再来看《理想国》的最后一段，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们，我们就能安全地渡过勒塞之河，而不是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告：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页 426）

苏格拉底的口气不是绝对的，而是劝诫的。这种劝诫其实暗中照应灵魂中的激情。这种向上的激情与柏拉图在第四卷中引述的令勒翁提俄斯愤怒的激情异常相似。事实上，学者指出立法诗与抒情诗的政治哲学品格¹，某种程度上都与这个“激情”有关。无论《理想国》最后的这个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正如许多先哲所指示的，“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神的奖罚”一套秩序的建构，正是涵养德性者的必要背景。这或许也是中国先贤们“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缘故，也是古今中外“删诗立法”的先哲们的良苦用心。这种良苦用心，都根植于一种好的激情，而他们把这才认为是“自然”。而近世以来的“抒情诗”的品格，同样是基于一种激情，只是这种激情便是那种人生来就有（无谓好无谓坏）的激情。

然而，或许多余的便是，即便是对于洞穴之喻，我们也无法断定究竟走出洞穴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这种洞穴之喻原本便是一种邪恶的，或说是无知的“梦境”。虽然哲人王以及理想国的建立，对于今人来说，便是建立崇高与等级，然而这种哲人王的态度，是否又是一种最大的虚无？因为或许按照另一种自然，我们现有的善的知识，反而在被哲人王而误导，而被赶走或被改造的诗人反而是一种真正的真实。²

再进一步说，即使是柏拉图有以哲人王而成就的立法胸襟，以神意裁决所成就人的德行提升，这种提升会不会反而背离自然（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当然，这一切可能仍只有以我们自己的“激情”来判断。

后记：文章提交后，邱老师指出，是不是灵魂三分本就不适用于“圣灵降临的叙事”；意指在与神接通之时，可能这种三分法便失效了。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就在院资料室看见一本《上帝没有激情——托马斯·阿奎那论宗教与人生》（刘清平、汤澄莲编译，湖北人民，2001）。在此书第四部分，编者从阿奎那《神学大全》中选了一些相关段落，编为《欲望、激情与意志》。其中有不少值得细细品味。

目前感到此中有两段最为紧要，摘录于下：

上帝既没有激情，也没有感性的欲望。

——《神学大全》，1集，21题，1条。P54

[下转第 38 页]

¹ 参林国华老师：《立法诗与抒情诗》一文，载《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2005年。

² 近来很流行的电影《盗梦空间》中男主角的妻子，因被植入“现实世界不是真实的”的意识，而屡次寻死以找回真正的自我，或许便是一例。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与民众

武亚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修昔底德多次提到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在进行决策或处理危机时，受到大多数民众的质疑与责难，读罢让人感慨，不禁想到基辛格《大外交》所说，“伟大的领袖总是孤单的。他们不同凡响之处来自于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未来的挑战”¹，“每一位伟大的领袖一定都具有慧黠的特质，能够将社会面临的挑战加以简化，有时是简化其目标，有时是简化其艰巨的程度。……他的处境仿佛走钢索，他必须向前移动，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以求越过个人目标与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向社会证明远方的彼岸比近处熟悉的海岬更为安全。”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有两位人物，即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对雅典国家的发展与强大都有重大推动作用；在雅典与对手较量或战况急转直下时，作为政治领袖，他们也都被推到风口浪尖，在承担政治责任的同时，用睿智与辩才说服民众，将国家引上理性的道路。

地米斯托克利在雅典由陆地城邦发展为海洋城邦方面作用重大。在其作为雅典执政官期间，主张发展海军，控制海洋，铸造海上利剑，说服公民大会开采劳里昂银矿扩建海军，建造三层桨战船，建立一支拥有 200 艘战船的舰队。“极力怂恿说如果只凭步兵，雅典甚至敌不过最近的邻邦，可是从战船得到的威力则不但能击退蛮族人，还能在全希腊居于领先地位。”³因此他力主修建比雷埃夫斯港及该港连接雅典的城墙，认为这个地方有三个天然海港，对雅典将来发展海上力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信雅典的未来在海上，曾说，“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比雷埃夫斯港的建立是雅典向外发展的标志，雅典由此为契机开启了打造海洋帝国的征程，在萨拉米海战后迎来属于雅典的海上霸权。可见，地米斯托克利在打造雅典海洋黄金时代的过程中，具有超人胆识与空前远见，因而是改变雅典帝国特性的第一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带领雅典争夺希腊世界支配权的杰出政治家，总是不被普通民众理解。其对手斯巴达正是利用雅典民众心向不定的特性，专门从其领袖下手，刻意树立民众与领袖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雅典一直流行“陶片放逐法”，放逐那些可能对雅典民主制产生威胁的人，十年内不许他们回来，但不会对放逐者加以迫害。这种方法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在雅典权威过大，进而成为僭主。萨拉米海战后地米斯托克利个人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雅典人害怕他成为军事独裁者，将他放逐。他起先住在亚哥斯，后来斯巴达派代表团到雅典，控告他私通波斯，于是雅典政府在整个希腊通缉他，他只好逃往波斯帝国，老死他乡。

正如修昔底德所言，“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表现得有显著天才的人；在这方面，他是超凡的，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值得我们钦佩些。对于当场要解决而不容许长期讨论的问题，他用不着事先研究或事后考虑，只用他天赋的智慧，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在估计将来可能产

* 武亚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¹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年，第 326 页。

² 同上，第 337 页。

³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 11 月，第 239 页。

生的结果的时候，他对将来的预测总是比任何其他的人更为可靠些。任何他熟悉的问题，他能够说明得很好；就是对于他本行以外的事情，他也能够提供很好的意见。他有特别惊人的本领，能够看透未来，看出其结果好坏的可能性。总之，可以说，由于天才的力量和行动的迅速，他能够正在恰当的时候做出真正恰当的事情来，远非他人所能及。”¹在我看来，雅典人对其领导人要求过苛，以地米斯托克利的才能和智慧，他之示好波斯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私通敌国，毕竟那时波斯实力强大：相对于希腊文明的黯淡，其文化灿烂辉煌。仿效波斯的建筑风格、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是坏事，而是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一种途径。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海战中提醒波斯人撤退以及没有破坏横过赫勒斯滂的浮桥，以此给波斯王族逃生的退路，这一做法可能有其战略考虑，他宁愿不占领在欧洲的亚洲地区，也要将波斯势力赶出欧洲，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借阿里斯提德暗示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想法，“诚然，我们与之交过锋的蛮族人目前正考虑着他们的安息与享乐。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拥有如此雄厚兵力的人关在希腊，使他承受可怕的压力，这个人决不会再坐在黄金宝伞之下悠闲地观战了。他是敢于干出各种事情来的。并且，因为他处于危急之中，他会纠正以往的疏误，事事躬亲督导，为了应付面临的重大危机，会更缜密地进行商讨。……所以，我们就不必将筑好的桥梁拆掉，……而且，如果可能，我们要在旁边并排再建一座，立刻把这个家伙扔出欧洲去。”²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深思熟虑加速了蛮族撤退的步伐，彻底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战局，雅典也在这一海战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因此，地米斯托克利示好波斯王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长远考虑，可惜这一行为被斯巴达人利用，成为日后鼓动雅典政府将地米斯托克利置之死地的借口。地米斯托克利的结局是悲惨的，假如他当初真的有意背叛雅典、投向波斯，那么在波斯国王要求他履行承诺助其征服希腊时，他就不会选择自尽。

至于伯里克利，在其担任将军期间，民众对他的看法也是根据雅典战局和国内情况起伏不定，伯里克利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也深谙民主体制下民众的心态变化与情绪跌宕，在他针对斯巴达人的最后通牒中，他提到“说服人们参加战争时的热烈情绪到了战争开始行动的时候是不会保持得住的，并且人们的心理状态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³，他清楚地预见到民众在战争状态下的情绪：在战争准备阶段，民众总是怀有十二分热情跃跃欲试；当战争进行到僵持阶段时，厌战情绪却会在社会上大肆蔓延，与这一情绪相应，他们往往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归咎于领导者，完全忘记自己也曾是主战派。当阿基达马斯率领军队驻扎在阿卡奈时，面对伯里克利坚持不战的理智决策，“雅典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他们迁怒于伯里克利，对于过去他所给予他们的忠告，他们完全不满意；他们反而辱骂他，说他身为将军，而不领导他们去作战，把他们自己所受痛苦的责任完全加在他的身上。”⁴当瘟疫在雅典蔓延时，在战争与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民众情绪较以前有了180度转变，“他们的土地两次遭到蹂躏，他们必须同时跟战争和瘟疫作斗争。现在他们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说他不当

¹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109页。

²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252页。

³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111页。

⁴ 同上，第138页。

劝他们作战，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负责；他们渴望和斯巴达讲和，事实上他们也派遣了大使们到那里去，但是这些大使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完全失望，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愤怒情感转移到伯里克利身上了。”¹面对这些责难与怨恨，伯里克利只能用道德感化他们、用战争胜利后的果实诱惑他们，鼓励民众重拾信心。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政治领袖引导民众的责任与义务在于，“当他看见他们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危险；当他们没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们的自信心。”²

同时，伯里克利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觉察到民众有对外扩张的狂热，他提醒民众在取得胜利后保持节制，他在演说中富有预见地强调，“只要你们在战争进行中，下定决心，不再扩大你们的帝国，只要你们不自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你们对于最后的胜利是应当有自信心的。”³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在缺失坚强理智的领导者作为民主国家发展保证的情况下，陷入反复无常的对外决策中，直至走上过于对外扩张的道路，终败于斯巴达和波斯的联合力量。这又一次应验了伯里克利对未来雅典的远见，“因为伯里克利曾经说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⁴雅典正是因为没有按照伯里克利预先估计的方向前进，才陷入崩溃的境地。

另外，正如上文提到的陶片放逐法所揭示的，民主政治下的民众总是对其领袖充满着恐惧与不信任，政治领袖的处境往往艰难。斯巴达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与对付地米斯托克利同样的方式来陷害伯里克利，分化民众与伯里克利的关系，希望借雅典人之手除掉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斯巴达曾派代表团到雅典，要求他们“驱逐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即伯里克利，“希望他在雅典不得人心，因为雅典人会以为战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缘故”。⁵当阿基达马斯率领军队向亚狄迦进攻时，伯里克利为打消民众因阿基达马斯是他朋友而产生的嫌疑和恶感，发言说“虽然阿基达马斯是他的朋友，这一事实无损于雅典人的利益。假如他的地产和房屋不被敌人毁灭，如同别人的地产和房屋一样的话，他愿意将自己未遭毁灭的财产捐献给公家，以免大众因此对他怀疑。”⁶可见，在民主政治下，领导者不仅要与海外敌手展开较量，还要在国内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调解各方力量，打消民众时不时出现的疑虑，稳定民心。

从以上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睿智、果断、善于把握时局、预测未来的政治领袖，在民主国家中的生活十分不易：既要统揽全局，又要小心翼翼处理与各方民众的关系。在我看来，杰出的领导者，与其说是国家事务的处理者，不如说是民众的灯塔，他们仿佛位于高处的光亮，照亮国家前景，时刻引导民众不要偏离理性航道。他们深知，普通大众总是被一时的狂热与激愤左右，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潜移默化地指引民众，使他们慢慢向自己认为合理的道路迈进。与之相伴的，往往不是强迫与威逼，而更多是对民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哪怕是

¹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163页。

² 同上，第170页。

³ 同上，第116页。

⁴ 同上，第169页。

⁵ 同上，第99页。

⁶ 同上，第130页。

牺牲自己利益也在所不惜。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高度评价体现了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的统治术，“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没有逢迎他们的必要。”¹而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民主社会中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向来十分复杂。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若将民众的经验奉为圭臬，固可换得一时的民心，却不免要遭后世的唾骂，因为他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领导者若太走在时代的前端，则难以获得民意的认可。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桥梁。但他也必须愿意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²虽然这一过程艰辛凶险，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民众的责难与背离中，甚至落入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的悲惨境地，但他们仍然无畏艰险、决绝向前，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做法，并尽量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只有这种不迎合民众的理性做法，才可以支撑国家良性发展。

（责任编辑：陈安龙）

[上接第 34 页]

激情存在于灵魂之中，并且更多地存在于灵魂的欲望部分（而不是认知部分）之中，更多地存在于感性欲望的活动（而不是感性认知的活动）之中。所以，在那些更接近于最高的完美即上帝的事务中，几乎没有多少潜能和激情；而在那些较不接近上帝的事务中，却包含着较多的潜能和激情。

——《神学大全》，2 集，上部，22 题，2 条。P54

（责任编辑：吴途勇）

¹ 同上，第 170 页。

²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年，第 337 页。

“奥古斯丁与死亡哲学”专题

编者按：死亡对于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还是另一种开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所说彼岸世界真是无稽之谈？由于宗教与死亡体验之间有着难以言说的奥妙与魅力，因此宗教经典思想家对死亡的阐释就凸现出来，那么奥古斯丁其对“死”的诠释则举足轻重。本专题以奥古斯丁宗教思想为出发点，几位作者从伦理、宗教、哲学意义上对“死亡”进行一次探析。周生升的《为什么是宗教》，对勘《论语》和《上帝之城》关于“死亡”的阐述，探究孔子关于“死亡”的思想。曾乔圆的《关于死亡》一文运用中、西古典思想，从死亡的原因、谁决定人之死、如何减少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意义、自杀等5方面来考察死亡之于生命的意义。周奕韵的《从奥古斯丁的自杀禁忌说起》一文则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对“自杀”这一现象在西方、中国、日本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分析。

为什么是宗教？

——《论语》与《上帝之城》对“死”的看法初探

周生升*

“死”对人意味着什么？是仅仅意味着一个生命体的消失？亦或是所谓“重堕轮回”？本文将以前《论语》部分章节、《上帝之城》第十三卷为基础，对“死”的问题做一次初探。

一、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那孔子究竟有没有说过“死”？

在孔子思想中，“死”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论语》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或者说具体化的阐述。笔者认为，这句“未知生，焉知死”可说是《论语》中，最体现孔子“生死观”观念的一句话。朱子对本章有精彩注解：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

此解似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生死之道、生死本源亦是“一以贯之”。同时又可看出，“知生”在前，“知死”在后。对此，《里仁》云：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为一日之始，“夕”为一日之终；由始至终，即“闻道”知生，而后知死。但必须注意，朝夕之分乃一日之分，若从更大的角度看，“夕”之后又是“朝”，从而又回归到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既有先后之分，又是浑然一体。

但问题是，为何“不知生”便不能“知死”？钱穆有注云：

“生人之事，人所易知，死后鬼神之事则难知……人所不知，尚可就其所知推以知之……”

*周生升，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

首先，“生死”作为事实是基于人之自然，或曰由“天”定，但“生死”作为观念却须经由“生人”之思考而具象化，质言之，闻道之人必为“生人”，谁都不能说“死人”能闻道。

其次，“人所不知，尚可就其所知推以知之”，还可从《述而》中找到论述：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又，《公冶长》：“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由此可见，既然生死“一以贯之”，人又能够推知（甚至于“闻一知十”），则由知生而知死便成为可能。至于“生死一以贯之”以及“人能推以知之”的理据，本文不多加探讨。

二、“我们要承认，初人就是这样造的：如果他们不犯罪，人类就不会经历死亡”

《上帝之城》卷十三对“死”的论述是：如果初人¹不犯罪，人类就不会经历死亡。奥古斯丁引了《创世纪》故事，阐述上帝造亚当夏娃人类并不会死亡，是由于初人违背上帝的旨意，作为惩罚人才变成会腐朽的身躯：“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类的“死”源于初人背离上帝而遭受的罪，此罪经由初人的繁殖延续到后人。

奥古斯丁进而更具体地阐述了人的两次死亡：

“当上帝抛弃了灵魂，灵魂就死了；同样，当灵魂抛弃了身体，身体就死了……二者都死了，整个人也就死了。”

由此可见，与《论语》所展现的孔子观念的“死”不同，奥古斯丁诠释“死”，定义明确且存在二分，即身体和灵魂，第一次死和第二次死的二分。“第一次死亡包括两种死亡，一个是灵魂的，一个是身体的，而没有上帝没有身体的灵魂，会遭受一段时间的责罚；第二次死亡，灵魂没有上帝，却有身体，会遭受永罚。”第一次死发生之后，人依旧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末日审判，甚至还会复活²（《上帝之城》二十二卷第八章）；当末日审判结束后，要么获得“永生”，即摆脱第二次死，要么获得“永死”，即第二次死。对“永死”，奥古斯丁的描述是：

“在那里，人们不是在死前，也不是在死后，而是永远在死。这样的人即不得生，也没有已死，而是无休止地死着，无死之死是在死之人所能落入的最糟的境地。”

三、辨析

就目前讨论而言，《上帝之城》通过将“死具象化”，比《论语》更容易为人了解。这似乎也是宗教吸引力的根本来源之一，此类手法也见于佛教的“六道轮回”。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可能源于对“死”的未知，就如一个人完全处于黑暗中会不知所措、惶恐至极，如有人事先告诉他如何应对，其人可能就会安心许多。

¹ 亚当和夏娃

² [古罗马]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吴飞译，2008年版，二十二卷第八章。

《论语》与《上帝之城》都认为“死”可知，但笔者认为，《论语》提出“未知生，焉知死”，通过倡导“闻道”，以“知生”来“知死”。《上帝之城》则诠释《圣经》，明确人要经历两次死亡，以此劝诫人们，在第一次死亡到来前，应虔诚信仰上帝，从而摆脱永恒的第二次死亡，这是通过“知死”来“知生”。《论语》强调“知生”，“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说明人的推知能力有差异，故对“死”的认知也必然有高下优劣之分。反观《上帝之城》，基督教将“死”的认知统一化，具象化，能给人以明确观念去面对“死”，应该说更利于传达理念。但奥古斯丁的“生死观”就是否正确？有待商榷。

但笔者认为两者对于“死”的认知又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意味。基督教最高目的是引领人进天堂获永生，这一永生必须经历第一次死亡，顺序为：必朽的一生 ⇨ 第一次死亡 ⇨ 永生，由此可发现类似“生死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只是基督教的永生是一个终点，此后不会再有死亡；而如果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是否可解读成生死“循环”呢？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鬼神之事人难知，所以究竟死后是什么情况，按《论语》所说首先须“知生”，但前文已述，“知生”已非常人所能，何况“知死”？然则死后究竟是循环，还是最后走向一个类似永生的终点，《论语》中没有答案。二，基督教中伴随最终审判的结束，人类迈向的不仅是永生，还可能是永死，这种死“既不得生，也没有已死，而是无休止地死着”，永死的特征和中国人“生不如死”的俗语有相似处，即活着遭受比死更大的痛楚。《论语》中能否解读出类似意味？有待进一步考察。

四、小结

碍于篇幅，笔者准备结束此次初探。本文基于两个问题：一，“死”在宗教中是十分重要的领域，柏拉图笔下都留有苏格拉底讲述勇士厄洛斯死而复生的一段话，《论语》却很少体现。然，是否说明“死”对孔子是禁区呢？《论语》中，确实未见关于“死”的具体描述，但本文已明晰，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其实蕴含了孔子对“死”的看法。这一点可以深究。李零教授在《郭店楚简校注》中就提出：

“孔子的一生有多面性……他更关心现实问题、世俗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哲学问题……但他的思想还是包含了多种发展的可能……以郭店楚简为例，我们碰到的情况好像是，儒家本来关心的就是天道和心性，而且对超越性的问题也饶有兴趣……”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孔子关于“死”的思想尚未被挖掘；二，维基百科的数据显示，当今基督教人数已达20亿。¹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何处？以本学期所读《上帝之城》而言，笔者认为在许多思想上虽然表述不同，但和《论语》的精神内核却有众多契合点。只是最终《圣经》走上宗教道路，《论语》则走上政治关怀的道路。这其中是否仅仅因为《圣经》阐述了上帝这个概念？《论语》有“天”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上帝很可能存在一致性（待考）。因此笔者着眼于两者比较明显的区分点——对“死”的论述，以此切入，对基督教进行剖析同时探究孔子关于“死”的真正看法。

本文的工作只是简单对比《上帝之城》和《论语》，找到了表层的共通点。今后将通过深入这两种文献，进一步考察基督教与孔子的生死观。

（责任编辑：吴途勇）

¹ 其中罗马天主教11亿。

关于死亡

曾乔园*

在真正接触哲学、宗教思想前，死亡这个话题始终令我产生莫名的畏惧，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它。我发现，周围的同龄人中，与我有同感者不乏其人。当我在大思想家的引导下逐渐踏入这片神秘领域时，对死亡的畏惧渐渐消释，也学会用理性眼光看待它。但我自知还未形成成熟想法，暂且在此把我所接触的知识作一个整理，且从五个主要方面加以展现。

死亡的原因

《上帝之城》区分身体之死与灵魂之死，即第一次死亡与第二次死亡。关于前者，第十三卷写道，“说身体是必朽的，是因为它可能失去全部生命，而不能靠自己活着。……当灵魂抛弃了身体，身体就死了。”身体的生命源于灵魂，因初人的堕落，“责罚他们的死就会使得凡是从他们的枝蔓上长出的，都要遭受这种惩罚”。初人的身体来自尘土，后人来自初人夫妇的繁衍，但承载了初人所犯之罪和上帝的惩罚，因而每个人都必朽。

第二次死亡则缘于上帝对灵魂的抛弃，灵魂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命，从而回到肉体并接受永无终结的折磨。并非所有人都经历第二次死亡，“虔敬者的灵魂与身体分离，休息了，在身体复活后享受永生，不敬者的灵魂却要忍受惩罚，身体复活后遭受永死，也就是第二次死亡”¹。

佛教信奉多生论，即“轮回”，认为一个生命的生和死不过是其一连串无限生命中的一环，这个生命以天人、世人、畜牲、饿鬼和狱鬼五种不同的形态变换出生。²死亡，被看做两种生命形态的过渡方式，死亡是为了新的出生。佛教又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生死，对领悟终极真理、摒弃“自我”的人来说，生死便失去意义，“涅槃”就是对无生无死的体认。

上面是从教义上探究死亡原因，世俗意义的死因就更多样：雅典将士们战死，或感染瘟疫而死；苏格拉底被城邦“误会”而判死；古罗马王室成员因勾心斗角而死，不一而足。对大多数人而言，身体死亡，意味着一切成空。一些重要人物的死亡，虽没有因身体消逝而减少对后世的影响，但如能选择，绝大多数人无疑会认为活着更好。

谁决定人之死

出生的权力不在自己手里，死亡也一样，死亡由不得自己选择接受或拒绝。关于死亡的权力，西方多交给全能的上帝。在中国，人们似把它交给“老天”，认为“老天”掌管每个人的命运，多数人抱持“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之念。

格劳修斯认为，任何个人或国家都可以对违背自然法、与全人类为敌的个人或民族实施惩罚，甚至有权剥夺其生命。自然法是人类社会通用的律法，每个自身没有违反这部律法的个人或民族都有对他人的审判权和惩罚权，这也合乎正义³。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⁴所谓天道，天体自然之本体，可神会而不可妄言，故夫子罕言之。孔子亦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⁵天之

*曾乔园，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¹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58 页。

² 沈家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佛教》，第 41 页。

³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book II, Chapter XX, pp.1021-1025.

⁴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79 页。

⁵ 同上，第 65 页。

位尊，无可比也，逆天理乃万恶不赦之罪也。因此，所谓“天机”似需谨慎对待。

如何减少死亡的恐惧

死亡不是自己愿意的，又不可避免，因而给人们莫大恐惧。如何减少这份恐惧，成为不少人努力的方向。

奥古斯丁说，死亡是为承受惩罚的，死者若能虔敬而充满信仰地忍受，就能增加忍耐的品德，减少死亡痛苦。《马太福音》中写道“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箴言》中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诗篇》中说“我亲近神与我有益”……因此，在基督教那里，唯有真心亲近上帝信仰上帝才能坦然面对死亡。

佛法有一个概念叫“大布施”，即舍弃所持有的一切，如权威、容颜、财富。这个大布施发生在每一个人临终时候，死时没有人能带走任何东西，所以大布施通常便成为一种强迫性痛苦之事，减少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在大布施来临之前就习惯于布施。所谓“慈悲为怀”，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待人如待己，助人如助己。易言之，佛陀教人一生以助人为乐，这样就不会因临近死亡而痛苦。

《理想国》第一卷中，大财主克法洛斯则用钱财减轻对另一个世界的畏惧。他说，“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是说对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有了钱财他就用不着存心作假或不得已而骗人。当他要到另一世界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为亏欠了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了。”¹对他来说，有了足够的钱财，就可以不欠神和人的债，死后就不会下地狱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此持否定态度，但谁都不能否认，克法洛斯的言行的确代表了一个群体的认识。

死亡的意义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在顺利通过女神赫拉设置的十二项艰难考验后，仍无法摆脱因亲手杀死妻儿的罪恶感，和赫拉对他日益增加的妒恨，痛不欲生的他最后为自己点了一堆柴火，把自己淹没在火海中。但火葬变成最后的洗礼，火烧尽了他凡人的肉体，灵魂则得以解脱并升入天堂，跻身众神之列。²死亡让赫拉克勒斯得到了最终救赎，达成永恒不朽。

在基督徒那里，身体的死亡（即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仅是整个死亡的一部分，承受这一次死亡，既向上帝表明了虔诚和无畏，又是为了避免整个的死亡。如奥古斯丁所言，“他承受了灵魂与身体的分离，为的是在灵魂和身体分离时，上帝不要与灵魂同样分离，为的是整个人在完成第一次死亡时，不会永远地被摄入第二次死亡……因为第二次死亡是永无休止的”；“虔敬者的灵魂与身体分离，休息了，在身体复活后享受永生”³。

身体的死亡，既是一种承受，更是一种救赎，死亡对当事人的最大意义兴许在此。但死亡对生者亦有意义。不少学派慎言死亡，更多探寻生存之道，是为了让世人活得更好。从实际观点看，关于生的一切问题似乎更切身更重要。

当季路向孔子“问死”时，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⁴死乃人所必有，不可不知，但不先求生之道，就难明死之道。曾子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⁵于己去之人，丧尽

¹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² 纪录片《诸神之战》（第2集：赫拉克勒斯）。

³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58页。

⁴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5页。

⁵ 同上，第50页。

其礼，祭尽其诚，则生者可厚德。“子之所慎：斋、战、疾。”¹战乱，众民生死邦国存亡之所系；疾病，自身存亡之所依，皆不可大意也。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歌颂死者以激励生者，他说：“在我看来，像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们说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他们的行动是这样的，这些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还生存的人们可以希望不会遭遇着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²

以上是死亡对生者的意义，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利用他人之死谋取一己私利的例子俯拾皆是。塔西佗《编年史》记载，克劳狄乌斯的妻子美撒里娜逼死波培娅，只是为了夺取后者豪华瑰丽的花园；波培娅为尼禄所生之女在出生不久夭折后，罗马元老院竟把死去的婴儿宣布为神，为她设神座、建神殿、设祭司，极尽谄媚之能事。

关于自杀

自杀是一种特别的死亡方式，该行为的实施者同时又是行为效果的承受者。没有谁能决定自己的出生，但每个人似乎都能决定自己生命的终结（比如何时，以何种方式）。自己处决自己，既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也没有给他人增加道义或法律责任，但引来不少谴责。

奥古斯丁在谈到圣女遭受奸淫而自杀时，认为只要被辱时保持意志神圣和心灵坚毅，就是无罪的；而事后如果因害怕惩罚和羞辱而自杀，那就有罪了。“别人对她犯了罪，她以死来惩罚自己，完全是不可取的；她当然更不该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前自杀”。³“引起他想自杀的原因越是无辜，他杀害自己所犯的罪就越大。”⁴

在儒家观念中，“孝”是很重要的观念，《论语》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⁵孝，不仅指敬奉师长，还需爱惜自己，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使一寸肤一丝发，都不得有丝毫损坏，何况神圣的生命？曾子所叹，“启予足，启予手，而今往后，吾知免夫！”⁶在这种观念下，自杀可谓“大逆不道”之至。

生命的获得意义非凡，生命的结束也非同小可。死亡是永恒的话题，有重大的道德伦理意义。研究讨论该话题，不是为了评价其是非好坏，而是为体现个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我而言，生命是宝贵的美好的，既然获得了，就该努力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精彩，那样，就真正能“视死如归”。

（责任编辑：崔攀）

¹ 同上，第96页。

²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1—152页。

³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第28页。

⁴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第26页。

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8页。

⁶ 同上，第103页。

从奥古斯丁的自杀禁忌说起

周奕韵*

关于自杀伦理，西方探讨甚多。甚至成为“现代思想中如此核心，却又如此难以处理的问题。”¹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自杀禁忌的最早倡导者之一。²《上帝之城》第一卷称自杀为最重的罪。综合《上帝之城》译者吴飞的解析，我认为奥古斯丁提出自杀禁忌的理由有三：

一是基于地上之城的理由。

奥古斯丁从法律角度，先将自杀看成一种无法惩罚的、违反司法程序的谋杀。他列举卢克莱西亚为贞节自杀的例子。古罗马高贵的女子卢克莱西亚被“塔昆王的儿子用暴力胁迫了她的身体”，“她向自己的丈夫柯拉廷诺斯和他的朋友布鲁图斯两个青年，两个无比显赫而勇敢的男人，揭露了这个纨绔子弟无比卑鄙的罪行，让他们宣誓为自己报仇。随后，因为痛恨和无法承受自己所发生的丑事，她自尽了。”奥古斯丁认为，即使身体被迫就范，只要自己心里不赞成，没放入情欲，那心灵的神圣性仍然不变，身体的神圣性也不会消失。“所以，当一个女子没有自己同意，而遭到暴力的强迫，别人对她犯了罪，她以死来惩罚自己，完全是不可取的。”自杀是凶手以自己为谋杀对象，将被害者与凶手两个角色合二为一。“她不能为了别人侮辱自己，这种不确定的，而且不是她自己的罪，而犯下谋杀这种确定的罪。”³因此自杀与谋杀同罪。

在这起自杀事件中，奥古斯丁将卢克莱西亚一分为二：一个是身体被玷污的受害者；一个则是杀死被害者的凶手。他认为人都无权杀死一个未经审判、未被认定有罪的人，包括自己。“为什么那个没有犯奸淫的，遭到的惩罚反而更重？塔昆只是和他父亲一起被赶出罗马，卢克莱西亚却身被极刑。如果说她的被迫不算不贞，这个贞女遭到惩罚就不公了。我对你们说，罗马的法律和法官，即使真有犯了大罪之后，你们也不愿意让罪犯不经过判罪就被杀死。如果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审判，告诉你们一个不仅没有经过审判，而且还贞洁无辜的女子被杀了，你们不会对那个杀了她的人施加相应的严惩吗？这么做的人正是卢克莱西亚；就是这个备受赞美的卢克莱西亚，她把那个无辜的、贞洁的、遭受了暴力蹂躏的卢克莱西亚杀了。”⁴“只要法律没有宣判某人死刑，哪怕是罪人，任何私人都没有权利杀死他。”⁵由此，在奥古斯丁看来，如果自杀被允许，那就削弱了司法公正，扰乱了社会秩序。这个结果呼应了亚里士多德“自杀是针对城邦的不义”的观点。

最后，自杀在法律上是一个根本无法处罚的大罪。奥古斯丁在文中对罗马的法官们发话：“你们判刑呀。”可是“因为她不现身，你们就不能惩罚”。正是因为自杀所犯下的罪行根本

*周奕韵，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¹ 吴飞：“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 1 月。

² 吴飞：“绝望中的生命自由——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望德’与自杀禁忌”，《第二届中国南北哲学论坛暨“哲学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

³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第一卷第 18 章，第 28 页。

⁴ 同上，第 19 章，第 29 页。

⁵ 同上，第 17 章，第 26 页。

无法追诉，因此在十五、十六世纪，人们将羞辱尸体、游街、不让正常埋葬等作为对自杀者的严厉惩处，虽有点可笑，但人们把自杀最为重罪的理念可窥一斑。

二是基于天上之城的律法。

奥古斯丁认为自杀是真正的不赦之罪，最不可饶恕，因为在他看来上帝是如此宽容伟大。在上帝眼里，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初人的后代理应有罪，因此根本没有无罪之人。但任何其他的罪，无论大小都可通过忏悔得赦免。但自杀彻底断送了忏悔和得救的可能，成为上帝眼中真正的不赦之罪。他举了因叛变而自杀的犹大的例子：“如果犹大的行为确实值得我们憎恨，真理对他的审判是，他在投缳上吊的时候，这个罪过加重了他该诅咒的叛卖，而不是使他获得了赦免。因为他虽然悔恨，却绝望于上帝的悲悯，没有为自己留下空间来作朝向救赎的忏悔。”¹“犯下一个可以通过告解救免的罪，难道不比犯下一个连告解补救的余地都不留下的罪好吗？”²奥古斯丁认为：任何犯罪都应该寻求上帝饶恕，应该对上帝给予足够希望。基督教中最重要的三个德行：信、望、爱，其中的“望”，就是教导人们要对上帝的拯救保持希望。自杀却不相信上帝可以赦免所有的罪，根本放弃被救赎的希望，自绝于上帝的饶恕这条路，不给上帝机会，不求上帝宽恕。犹太背叛上帝可以被宽恕，自杀却不让上帝宽恕，比背叛还要罪恶。

三是基于身体的神圣性。

人的身体既为上帝所造，便是神圣的。没有上帝指示，没有谁有权利伤害神圣的身体。无论每个具体的人做出怎样的坏事，作为上帝之造物的人都是神圣的。这种神圣不等于道德乃至信仰上的善，而是表现为超善恶的神圣性。自杀之所以是罪，根本上是因为，它破坏了这种神圣的“人”。³

虽然中西方在民情和宗教语境方面都大不相同，但奥古斯丁的理论还是让我联想起中国的自杀现象。

中国没有西方至善上帝的现象，因此似乎没有基于上帝律法对自杀行为的善恶的讨论，而仅仅围绕特定的自杀事件展开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探讨。1919年11月14日，湖南有一位赵姓女子因不服父母包办婚姻，不愿嫁于年纪大相貌丑的富商作填房，便用剃刀自杀。这一事件引起诸多议论，仅毛泽东一人便接连在《大公报》上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但不是基于自杀本身的伦理，而是基于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批判。毛说：“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向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并提出了改革婚姻制度的必要。⁴

日本因武士道精神对自杀情有独钟，但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使自杀成为维护名誉的手段，用毁灭自己来压倒一切反对声音。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应该值得人们尊重的。”⁵人们倾向于将暴力转向自己，表达衷心和情义，甚至作为一种无上的道德。中国没有这样主动自杀的传统，往往将自杀作为反抗的

¹ 同上，第16章，第26页。

² 同上，第25章，第36页。

³ 吴飞：“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7页。

⁴ 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⁵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5页。

方式、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抉择。不是主动求死，而是走投无路下的悲剧收场。

在中国，有一种更让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上帝之城》也提到过类似人物，即勒古鲁斯。勒古鲁斯被迦太基人俘虏后，迦太基人想用他换回俘虏，并逼迫勒古鲁斯发誓，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使命，他必须回到迦太基人中间。勒古鲁斯到了罗马，警告元老院不可交换俘虏。虽然他完全可以滞留罗马，但他没有食言，而是回到迦太基，被折磨致死。奥古斯丁认为“他不愿意自杀，并不是因为他吝惜自己的生命。”“他是非常蔑视生命的，宁愿在凶残的敌人任何刑罚下死去，却不愿杀死自己，可见他把自杀当作了多么重大的罪。……他宁愿遭受敌人的折磨也不杀死自己。”勒古鲁斯之辈，在中国当被称为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或“烈士”。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有死在敌人刀枪下的才是真英雄。荆轲刺秦、红岩烈士，都是以宁死不屈、慷慨赴刑的事迹为世人传颂。这种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大量知识分子自杀。这场风暴引起的社会动荡，使自杀如一种情绪一样蔓延。有人为了追求风骨，有人为了保持自尊，有人为了不再忍受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也有人对社会和信仰绝望。这一时代的自杀，要与社会的非常态联系起来。社会的失范导致人们对生命的动摇，产生了自杀危机。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谈到过社会动荡所引起的反常自杀，认为这是自杀增加的重要因素。¹自杀与社会结构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有关，因为它表现了社会情绪。而民族情绪也像个人情绪一样，反映了机体最根本的状态。因此，我们的社会组织必定在这个世纪里深刻的变化，所以才引起自杀率如此升高。²混乱的社会和政治使自杀者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和意义，他们不是不愿意活，而是以拒绝生命和否定厄运来表达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但可悲的是，当时的自杀者即使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或明志、或进行无言抗争，仍没有得到当时社会谅解的机会，反被冠以“畏罪自杀”、“以死向党威胁向党进攻”的名头。可见，在这场疯狂的社会运动中，自杀没有像五四运动时期那样引起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反思，失去了对当时社会的警示；也丝毫没有引起像日本人对自杀者的忠义道德的谅解，反而成为罪恶的证明。如此，自杀成为当事人无勇气的逃避，或信仰崩溃后的绝望之举。借用吴飞的话说：是在无法承担厄运的情况下与命运同归于尽。

（责任编辑：周生升）

¹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3页。

²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50页。

主题法与问题法

弗雷德·埃德林*

【内容提要】学生经常困惑于研究型论文的写作。一些文章、讲座和书籍往往仅有令人兴奋的主题，但内容十分乏味。这些现象普遍存在的弊病在于无意识地集中于主题而非问题的方法论习惯，而这种习惯是以根深蒂固的常识性知识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的观点为依据。这种观点涵盖了对大部分方法论教科书所假定的科学探究的理解。本文批判了“主题法”，并且将它与“问题法”进行了对比。“主题”一词表明将涉及到一定的范围，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涉及这些范围可能是有趣的。有趣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以目前知识所存在的漏洞及相应解释作为研究的起点。问题导向型研究不是以信息搜集、事实或者概念的阐明为起点，而是以目前知识的不一致、前后矛盾或者空白的鉴别为起点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试图通过自由、不受约束的创造力，以及对假说的严厉批判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主题法 问题法 科学研究 理论

某一个学生对我说：“我已经就已选定的主题进行了大量阅读，但还是不知道怎样写论文。”某一个同事跟我谈起一些有关主题的工作，比如反贫穷政策、巴尔干民族主义或者阿以冲突。“主题确定是这样，但是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呢？”我问，“你最好奇的是什么？哪些令人费解的问题需要回答？”

上述案例的弊端在于，不带着具体问题进行探究，我称之为“主题主义”。主题主义不仅是还没有真正把握如何进行研究的学生的通病，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专业学者。主题主义以根深蒂固的常识性知识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的观点为依据。

“主题”一词源于希腊语。“为主题划定范围”表明一个主题会涉及一些内容，就好比待着色的墙壁、待雕琢的空白板岩或者待写的白板。而在学术研究时，一个人尝试去到图书馆去“搜集信息或事实”。这种根深蒂固的有关探究的观点源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提出的“标准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现在依然在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上被讲授。“一个发现者只是勤勉地观察事实，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其他的则取决于孕育万物的大自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自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此无须解释）。”换句话说，科学方法被看做是“让自然直接对我们讲述它自己知识的方法”。理论只不过是不断重演自己的真实世界规律的速记。因此，甚至理论也只是对主题所涉及现象的一种表述形式而已。

我建议将问题法视为一种可能更有效的备选方法。问题法是当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标准模式——至少是在前沿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并不完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主题主义

* 弗雷德·埃德林（Fred Edilin），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的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科学和理论的基本问题、比较思想和修辞学、后共产主义转向（尤其是前苏联、捷克和东德）、大国外交政策等。本文由孙迪、王芳琳、权贤美、任娟、姜忆楠翻译，姜忆楠、邓子立校对。

在社会科学中十分猖獗。

对知识的探索，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不是从准则、观察或者数据和事实的收集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为了了解要观察什么，我们心中要知道那些被观察所左右的问题。”观察从来不会凭空产生，而是被那些受观察影响的问题所主导，或者被那些已经建立、并由于某种原因相关的种类所主导。每一个问题都源于那些与知识不符的现实发现，或者源自知识推论和事实归纳之间的明显矛盾。

从同一视角出发，默里·戴维斯（Murray Davis）认为“只有当新的理论否认了旧的事实（谚语、理论等）时，这个理论才会被注意”。他认为，有趣的理论与无聊的地区的区别在于，有趣的理论会否认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某些部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挑战而是仅仅确认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信仰，其价值通常不被承认。学界会宣称这个理论不需要关注，因为这已经是现有理论的一部分。

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摒弃一切偏见的基础上，即摒弃一切偏见是可能的。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些不偏不倚的理论，包括我们的观察……我们总是去寻找那些已经存在于理论背景中的问题。”背景知识不仅包括以结构化的形式综合各种理论的语言，还包括那些目前还没有被挑战过的理论假设。甚至我们的感官自身也具有受到理论塑造的预期，会无视理论未能推导出现象。因此，只有在与现有或之前存在知识、预期、理论相关的问题的指导下，新的观察才有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点。

“问题”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problema*”，意为“障碍”。根据障碍种类的不同，问题也可分为不同种类，如实证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等。在科学理论中，知识性问题就是障碍。同哈蒂唐斯（J. N. Hattitangdi）的观点相似，我认为问题是有待解决的逻辑上的矛盾。

一、逻辑上的前后矛盾：研究的驱动力

“什么在激励着研究？”哈蒂唐斯说道，“那些为解决问题而不断寻找的理由与问题本身，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或许植根于所持的明确清晰或者缄默的信仰、对观察的理解、考虑正式采纳的假设，或者是以上的结合。信仰不一定有意识地成为问题的组成部分。研究的开始可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即有些事情与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不相符。我们也许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使之成为问题。将逻辑上矛盾的知识信仰全部列举出来是如此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无意识中所持的信仰（例如那些深嵌在语言和方法之中的信仰）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们非常难以认知和清晰表述。正如庞加莱（Jules H. Poincaré）指出的，“无意识所持有的意识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逻辑上的矛盾会促使人们去寻求解答？“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有系统性的影响”，哈蒂唐斯指出，“它摧毁了我们信仰体系的效率，前后逻辑矛盾会从任意一个陈述开始，并迫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解释，而那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则削弱了我们的信仰体系”。

“当预期令人失望，或者理论进入困境时，问题就会出现。它们可能从一种理论或两种理论之间产生。它们也许源于我们的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冲突。理论通常产生于，我们对遇到的问题持有一种试探性的答案。这就是挑战我们学习、试验、观察的问题。只有结合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预想和理论展示了一个问题时，那些观察、事实或数据才会成为疑问的起点。”

二、背景假定和认知兴趣：问题的根源与可能的阻碍

人们所提的问题总是强烈依赖于他们的背景知识和兴趣点。迄今为止，这种差异没有中断科学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不同构架之中得到的发现可能是互补而非相互矛盾的。虽然禽类学家、昆虫学家、园艺学家和真实的土地代理人可能把相同地皮的事实集中起来，然后给出完全不一样的报道，但是也许所有的报道都是符合现实、彼此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经常给出不同、矛盾的现实报道，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背景知识。这些不同报道是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的，也许只是基于相同现实的不同认知。而背景假设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一个人相信自私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有消极的影响，那他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论证的“自私的行为会对公共产生积极作用”将会感到惊讶。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相信斯密“看不见的手”总是促进公共福利，那么他将不得不解释那些明显与之不相符的事例。如果一个人因意识形态而信仰社会主义，并遵循民主规范，然而当罗伯特·米歇尔（Roberto Michel）观察到社会党人倾向于被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领导统治，那他同样会吃惊。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真正问题的特点在于，解释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及其政策结果的差异。一个人会假设政策制定者想要使得政策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当然，没有人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那些在预期不会成功的政策上，然而实际上政策通常都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所有这些例子说明，对于不持相通知识背景假定的人而言，一些问题可能就不再成为问题。

三、自主事实的观念是真理的试金石

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寻找解释这一目的，而这些解释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正如上一部分讨论过的，对于同一个事实也许有非常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都是正确的并且相互之间具有连贯性。兽医、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对同一种动物的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且整体上相互之间保持着连贯性。只要他们对事实的判断是一致的，那就没有问题。当然，在不同理论模式下提出的假设经常是相反的，因为这些假设植根于不同的理论模式。科学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认为，自主事实（autonomous reality）存在于一切理论模式之外，因而它可以成为评判真理或谬误的检验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某个理论或者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论提出的假设，都能在事实面前通过激烈的讨论得到验证。

正是这种理论模式之外的事实假设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看法，才使科学变得完美。这种假设与事实陈述是一致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对事实陈述的诠释，另一方面事实陈述却受到包括运用的理论在内的背景知识影响。当研究者发现事实与理论模式（或者范式）发生冲突时，他们通常会坚持理论模式而挑战经验事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波普尔说过的，“当它们与预期发生冲突时，观察甚至会摧毁模式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对我们的预期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这种意想不到的影响迫使我们重新建构预期……”。

经验事实和人们对事实的看法因人而异。当然，感知、诠释和解释都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这种偏好不可避免地表明证实或证伪都是不确定的。当对每个可能错误事件的观察都有解释时，任何证伪也只是表面上的证伪。不过，我们可以从前沿的自然科学学会重要的一课：知识有时通过创新和对解决问题前的假设的批判（包括检验）取得进步。

四、无意识

科学和尝试中的很多背景假设来自于语言、文化、传统和其它资源。通常在无意识中我

们就能够理解它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我们会有如此多的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与他人谈起过去。背景假设通常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而误会的产生原因通常在于，不同的人认识到不同的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真相。经常只有当我们遇到新的理论或观察与我们无意识的背景知识假设发生冲突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些差异。

任何学科领域的争论经常由时兴的理论、方法和隐喻性观点组成。在自然科学中，很多背景假设都源于范式的、科学的或者隐喻性的研究计划。迈克·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已经注意到了他称之为“了然于心的对初次体验产生意义的知识”的重要性。科学中的很多背景知识是人们熟知于心的，也就是说，通过实践获得但是不能清楚说明。熟知于心的知识是指对哪种观点应该采用、而哪些不应该采用的判断。熟知于心的知识通常是无意识的，也许这正是阻碍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不存在解决问题的现成教条

一些读者可能认可我所提倡的方法，以及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东西。问题导向的研究并非为先进的自然科学所垄断，许多古典的以及当代的社会科学成果也都是问题导向的。一个人只需要想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莫斯卡（Gaetano Mosca）、米切尔斯（Robert Michels）、凯恩斯、尼斯比特（Robert A. Nisbet）、谢林（Thomas Schelling）、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巴伯（James David Barber）、达尔（Robert Dahl）和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等，甚至足以列出一长串人名（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问题导向的）。很多古典和当代的政治思想家的工作无疑也是问题导向的——如柏拉图、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卢梭、康德和罗尔斯，这又能够列出许多代表。

然而，当简要梳理社会科学文献时，我们就会发现主题导向的分析已经肆虐。此外，不仅仅是学生缺乏可以聚焦的问题来引导其研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享有盛誉的学者）也是跟着研究方法走，却不管他们是否了解该方法。不仅是无数的学生论文，还包括无数的学术演讲、书籍和论文，它们都因为缺乏研究问题而显得无趣。

问题导向型研究与非问题导向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描述和解决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前沿，科学事业的实质是描述。描述性研究与理论密切相关，此类研究的相当一部分涉及到解决问题。两者的决定性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描述以问题为中心，不面向主题；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描述研究以主题为导向，不强调问题。

与其让导师帮助自己明确理解一个问题，在论文中挣扎的学生常常更倾向于获取某一模板，利用这一模板，学生可以得到有关写作提纲、研究程序或步骤的范例。这些模板常常能“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题目，却不必提出问题。在社会科学中，甚至一些被冠以“理论”之名的成果也以模式化的形式出现。将数据用一些所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术语述说一遍，如此一来，一项研究议题即使不用提出问题也能成形。

方法导向的研究更可能是“主题中心”或“模板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大多数的方法论教科书，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都会提供给学生模板。教科书提出的研究程序倾向于引导学生进入“主题中心”型研究而非“问题导向”型研究。

在有关方法论的教科书中，缺乏对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与“解释”的关注，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在时下的讨论中，学者们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也很少建立在求知主导型研究的意义上。在很多广泛使用的方法论教科书中，“问题”和“解释”两个词语甚至不会出现在索引中。在其它一些作品中，尽管这两个词（或单个或同时）出现了，但有关它们的讨论通常是仓促的。在求知主导型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词语通常不被使用。有时甚至强调问题重要性的教科书会把问题和主题混淆，或者教科书提供的有关问题的案例确实很重要，但

细究起来涉及的却是经验问题、伦理问题或是政治问题，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些教科书通常并没有帮助学生真正、理性地阐述和考察问题，而是教授他们如何“收集”和“汇总”数据，以及寻找相关关系。

“问题”和“主题”很容易混淆。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在日常语言和学术调查中都容易被混用。问题常常被当做主题使用，而主题也常常被当做问题使用。这种混淆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主题即问题”（problems are questions）。这一主张貌似正确，但无法回答无用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什么区别。

很多社会科学家，甚至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将研究视为汇总数据、寻找对假设的支持和阐明概念的过程，以及对现实进行积累和组织化的过程。正如波普尔所说，“他们试图复制自然科学的方法，却没有把握方法的实质，而是采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或者，像戴维斯写到的，那些“死死遵守现行教科书中有关理论建构的强制教条”的学生，不考虑有关其理论建构的其它标准，最终会发现其研究工作索然无趣。

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就像很多主题论者热衷的那样，但进行事实上的问题导向研究却是另一回事。人类的心灵不适应开放的问题，并且常常试图忽视和压制它们。渴望遵循旧例是可理解的。模板试图将其规定固化到研究之中。“本体论概括和叙述了方法论”，也就是说，源于调查的现实图景被研究使用的方法塑造和染色。

遵循模板并不必然导向主题主义。案例、科学研究程序、形而上学的研究程序和科学理论都是模板，在研究中可以作为粗糙的路线图使用。在前沿的科学研究中，当这些路线图遇到了麻烦，或是指向了违反常理或未知的结果的时候，研究才开始。保持对问题的灵敏度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标志性品格。

系统阐述研究问题是一个难题，这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努力。而且，问题通常会随着研究者发现一些默认的潜在假设过于幼稚或存在其他错误而消失，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这就不是研究了”。对于开放问题的探究需要对于模棱两可状态保持很高程度的忍耐。从来没人能保证一位科学家能够成功的、哪怕只是系统阐述一个真正的问题，遑论寻找解决途径。

问题法没有固定的教条。

（责任编辑：孙超、吴途勇）

本期话题：今天我们如何办研究生教育？

【编者按】这原本是一个值得兴奋的话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快哉？这原本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文理工法商农诸科，究竟是该“大道一以贯之”，还是应当赤橙黄绿花开多样？这原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二十年后师生再相会，道术是否已为天下布？这原本是一个不需多议的话题：古今中西，值得仿效的典范何止一二，择其善者而从之岂不简易？前有清华国学研究院，西有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等等……

这原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场景：师生切磋论道，教学相长。师者肃穆和乐，学者如坐春风。这原本是一个理应存在的局面：独立之精神在此萌生，自由之思想在此张扬，卓越之学识在此涵养，强健之人格在此锻造……

然而环顾四面，天下间却似万马齐喑：自命为大师者多矣，却于思想学术毫无建树；走出国门习得洋人技艺者多矣，却不过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唯知贩卖并无他艺；有学有识者亦多矣，却或隐于市朝不事俗物，或苦于体制无路请缨。

“不可能更糟。”这种看似对当下批评已经到了极致的言辞，其实寄托了否极泰来的期许，实在是一种更大的希望，是期待变化的勇气与智慧。这也就应了狄更斯《双城记》里最著名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听听吧，这些充满血气的年轻人的呐喊；看看吧，这些仍旧真诚的诗人的抒情，这再珍贵不过的青春梦想，这再诚实不过的内心直白。这不正是在打破久远的沉寂吗？这不正是有了新的转机与希望吗？这不正是整装待发？——向着理想的教育，理想的研究生教育！

事情正在起变化。

（尹亮）

寻求一种被击中的感觉——研究生教育断想

陈安龙*

来国关院就学已经一个多学期了，全新的研究生生活加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让我应接不暇、思绪万千。本文也算是对这段时间自己的所思、所学、所想做一个简单梳理。

—

对于学院全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我个人是持支持和赞赏的态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能让我安下心来读点书。这也可能跟我本科时的经历有关，本科期间我真的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书，而来到国关院之后，我便被浓厚的读书氛围所包围，我喜欢这种氛围。记得入学之初邱立波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大家研读《朱子语类》中的“读书法”，引导我们如何读书。而之后整个新课改的课程安排主要是对西方经典文本的精细研读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学习

* 陈安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和理解，再加上复性书院每周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托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这种在日常课程学习中所感知的西方文明、中华文化以及两者间的碰撞让我受益颇多。比如这次期末作业周生升以《四书章句集注》和《上帝之城》为主要参考写的一篇极好的关于孔子和基督教“生死观”的文章也是这种学习方式的反应。当然除了生升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管是林国华老师发到豆瓣上的同学的作业还是邱老师所要求的作业，其中有很多针对这学期所读文本的精彩论述，让人赞赏不已。而对经典文本的研读也让我领略到了人类文明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厚重的文化积淀。

二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第一学期给我留下的整体感觉。第一学期开设了三门课：朱小平老师的古希腊罗马经济史、邱老师的一系列的名著导读和林国华老师的《战争与和平法》。现在想来，对我而言，这三门课是极其成功的，因为这些老师都成功的激发出了我内心的求知欲，带着我领略了知识的魅力之所在，让我乐在其中。

朱老师在我心中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少林寺扫地僧”一般高深莫测。这位年过半百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以他渊博而又精深的学识深深地折服了我。无数之前自己苦思冥想而不得要义的问题，朱老师总能以浅显易懂的三言两语、几个图表便解释地一清二楚。作为经济学家的朱老师不仅在经济学方面造诣精深，而且在对中西历史脉络的掌控上、思想文化的研究上、理论与实践的把握上，都让人难以望其项背。比如朱老师结合经济学、历史学对于整个奴隶制的论述，对于欧债危机的一系列研究和看法，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认识，对于中美关系的分析，对于古代中国与罗马的联动反应等等，高屋建瓴、天马行空、信手拈来，感觉整个世界历史在他那里活了。而能得到这种老师的教诲也是我毕生之荣幸。总之，在朱老师那似乎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真是令人醍醐灌顶。

邱老师和林老师在第一学期主要是领着大家研读经典文本。说实话其中很多文本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特别是因为自己英语能力问题使得自己在读英文原版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时倍感吃力，林老师布置的很多阅读任务没有完成。但我个人觉得我在这两门课上还是真正有所得的。我认为，评价一门课好坏的标准，不仅要看课程文本本身，还要看老师能否激发学生对文本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欲望，以及老师本身能否对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精深的见解。而林老师和邱老师在我看来在这方面做的都是极好的，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品性。比如林老师对“正义的底色是愤怒”的阐述，在谈“海权”时对“统治权”(jurisdiction)与“所有权”(property)的分析，对“政治体死亡”的探讨，对“自然法”、“惩罚权”、“恐惧”、“战争与和平”的论述等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以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在这个课程结束后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一步研读。现在我也正在按照上学期林老师推荐的书目读着有关海洋、海权的内容，目前正在读麦尔维尔的《白鲸》。

邱老师在上学期领着大家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的《编年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且利用每周一晚上三个小时的时间跟一部分同学研读《四书章句集注》。邱老师几乎是跟同学交流最频繁的老师，而且在讲解经典文

本时总能听到邱老师对于诸多问题精辟独到的分析，或褒或贬，每每都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邱老师常常会跟我们交流他最近的所思所想以及最近的读书心得，顺便推荐几本好书。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邱老师对我们期末作业的极其仔细的批改，从文章布局、思想表达遣词造句、标点符号，让人想象不到的细致，并且跟每一个人讨论他（她）的作业，提出修改意见，形成一种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总之，邱老师是一个爱读书、爱学生的老师。还有一点，林老师、邱老师以及李老师跟我们在网上的交流非常频繁，他们总会不时的把自己觉得好的文章、信息通过邮件或豆瓣相互分享。

三

现在已经是我进国关院的第二学期了，也是课程改革全面铺开的第二学期。因为正在进行中，所以无法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总体感觉，到现在为止课堂显得有些沉闷。对我而言，这里我所说的“沉闷”并不是说我想要一个“热闹”的课堂。因为之前我自己也上过很多看似很热闹的课，甚至热闹到娱乐化，最后大家索然无味，不了了之。我这里所说的“沉闷”更多的是，老师在有些时候不能通过自己的讲授激发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求知欲。可能是有的老师觉得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无法精讲，只能泛讲。但是我觉得老师应该在讲自己的课程时，从中挑出某些重要的点来，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讲透，从而激发学生对它的兴趣，学生自然会在课后持续关注这一问题，翻阅相关书籍，并以老师提供的视角为依托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如果讲的太泛，总觉得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也不知如何下手。我自己觉得老师不必过于担心课程进度，研究生学习可能更多的是依靠课后的自学。老师的作用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领路人，这个领路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学识在某些点上激发大家的求知欲，使之有强大的动力和兴趣在课后以老师开辟的路径为依托或入口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老师应该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所思所想、为学经验、读书感悟经常跟学生交流，以启发学生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和理解。

当然，现在所看到的沉闷也可能是一种假象。记得第一学期时刚开始上林老师和洪涛老师的课时也是感觉有些沉闷，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相互适应或调整以后，自己反而从中受益颇多，也激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阅读的热情与兴趣，到现在都没有减色或消退。

不过，我还是特别期盼学院能定期请一些院外的其他真正的有学识的读书人来上一些短期课程，甚至只是突击性的一两次的连续讲座，通过这种方式拓展我们的认识与思维。比如说请华师大历史系沈志华老师、杨奎松老师来讲一次或两次。我觉得这种交流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能形成一种思想的碰撞，使自己反思最近的所思所学，把之前自己所读的死书激活，也会强化自己对某一方面的兴趣和热情。当然我个人也希望能请一两位真正从事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实务的人来给我们讲一下现实的情况，让我们体会一下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这就是我对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想法。限于能力，我很难用具体的要求或标准来描绘我理想中的研究生教育。但是我可以简单地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理想中的研究生教育。我记得在一次读书会上有同学跟邱老师争论过“愤怒”的价值和理念，上学期林老师也曾经就“正义的底色是愤怒”做过精彩的论述。而在平时的阅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愤怒”面前

自古而今的先哲们有的是以一种隐士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出世”的美，有的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置身纷繁复杂的矛盾当中，表现出一种“入世”的力量。这类师生之间的思想交锋让我颇受触动，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对我而言，研究生教育是否成功在于我们能否形成一种持久稳固的读书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师生能否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学习激发出对于某些点的研究兴趣并深入下去，最后举一反三，真正实现我们打造“新世界政治学”的目标。

（责任编辑：许子兰）

对研究生教育的期许

佚名*

人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待久了，习惯了，也不曾会想要改变现状。但是，如果有一天发现屋子里安了扇窗户，他就会想着要跳出这间屋子。我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期许就类似于此。教学改革就是那扇窗户，它让我嗅到了美好的味道，于是乎我会要求更多。但很快便又发现，“新教育”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既然“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期许”这个命题在教改背景下展开，那我已然跳出了封闭小屋。此时的我所期待的是一片纯粹的知识 and 智慧的天地。摆脱了物质的、世俗的牵累和烦扰，只有纯粹的知识、智慧的思想、和澄澈的人心。这是教改所允诺我们的，或者至少是这样暗示的。在当下被功名利禄腐蚀的大学校园里，居然有人试图开辟这样一片纯净的世界，作为渴求智识的我除了赞叹他们的决心和勇敢之外，并没有想到，其实“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它将面临许多重重现实的阻碍。我试着“成全”现在，但也不放弃希望——改革最终会克服困难的，朝着我们对研究生教育所期许的方向迈进。

我期待，研究生的课程是一个优质而完整的体系。虽然现在的“新世界政治学”课程可算作一个体系，但它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体系内现有课程的质量不尽如人意：翻译课上没有传授翻译技巧，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感觉来翻译；世界经济史课程本身是零散的，同时，由于从经济角度来解读世界历史的内在难度，使得学生的反响偏向于消极。另外，国际公法课程的上课效果也不甚理想（但这丝毫不能否定老师的认真、踏实和学术热情）。其次，这个体系并不完整：我们缺乏方法论的训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我希望自己能懂得用哪种方法来表达我的观点，我希望我的论文能算作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

我期待，有老师给予学生更多的指导。我所憧憬的场景是：我有一个导师，他会定期地、经常性地找我谈话，让我谈谈读书心得；同时，我会被要求提交读书报告。老师也跟我讲他的读书心得和最新的教学体会。老师会总结我的学术兴趣，给出一定的指导和提示，并及时地修正我错误的进学思路或方法。但是，目前由于没有导师，没有督促，我没有方向感。我不知道如何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也不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老师曾说过，中国学生成熟太

*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编者按其要求隐去姓名。

晚，不够独立。事实确实如此。正基于此，老师更应该给我们必要的指导和督促。现在的我只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看书，不曾浪费美好的青春时光。但是，我还是感觉自己对于所读的书，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我期待，我们的讲座是自主自愿的。以签到的方式强迫我们听一些并不感兴趣的讲座，浪费时间又毫无进益，真不是一个倡导自由民主的学院应有的做法。现在的讲座，第一，大多趋于时髦，第二，大多与我们所学的知识无关；第三，有些讲座我们并无兴趣。如果是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则，那么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不会叹惜我花费的时间，而且还会有所收获，因为是发自内心喜欢。

我期待，研究生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截止目前，我们参加了院元旦歌舞会，使我们在学习之余有了“游于艺”的机会。此外，就再无其他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或许，话剧表演可以成为一次不错的尝试，如果能成行的话。这类活动，作为读书的有益补充，将会使读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鉴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现实，教改试行研究生分流制度有其内在的需求和合理性：既能实现每年有5—6个高质量的学术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同时，也迎合大多数学生就业的需要。对于个别既想经历学术培养，但又选择就业而非读博的同学来说，他们的想法也是基于某种研究生教育现状的担忧。经历了一年的学术型教育方式的学习之后，又不得不重新适应实践型教育方式的培训；适应了某一类风格的教学方式，而又不得不重新适应与之完全不同的风格的培养方式，这对于他们来说，存在某种忧虑也情有可原。

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教改的正确性和美好前途。因为当我跳出那间封闭小屋的刹那，我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很清新。

（责任编辑：许子兰）

盛行高学历，加剧“考研热”

王慧*

据2012年1月8日中国新闻网报道，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月7日至9日举行，全国165.6万人确认参加，比2011年增加14.5万人，增幅达9.6%，再创历史新高。¹这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考研规模连续第三年以超过10万人的速度增长。今年这165.6万考生中，可能会有50万人成为新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剩下的100多万人要么面临就业，要么等待下一次考研角逐，虽然3:1左右的考研竞争淘汰比例比不上国考、司法考，但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大部分要覆没，竞争之激烈，可谓残酷。

很多人不解的是，为何现在的“天之骄子”大学生纷纷热衷于考研，而不是直接就业？高等教育专业调研机构麦可思（MyCOS）研究院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2012届本科毕业生计划国内读研的首要理由是“就业前景好”。²所谓的前景是大前景还是自己的就业前景呢？这

* 王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2010级硕士研究生。

¹ “2012年165.6万考生考研连续3年增幅超10万”，<http://edu.people.com.cn/GB/16820320.html>。

² “2012届本科毕业生读研意向分析”，<http://xnjyw.5d6d.com/thread-42541-1-1.html>。

个前景就不会变化吗？读研后找工作真的会容易吗？据光明日报 2009 年 10 月 12 日报道，从就业率看，高学历与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已经显现。从 2009 年开始，硕士生的就业率首次出现低于本科生。2009 和 2010 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均不及本科生。特别是在 2010 年，从学历层次上看，在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中，硕士生的就业率是最低的。¹其中，据统计显示，在上海的硕士生就业上，非上海户籍的女性文科研究生就业率是最低的，这从侧面显现出女研究生的就业难，尤其是文科女研究生。但是，往往女性考研人数高于男性。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这其中也许存在社会引导的误区。

总体而言，大学生考研的主要原因有三大方面。一是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大家挤破头”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很多都在有意无意地追求高学历——学历高低与胜任工作有没有必然联系先不说，反正能招到高学历的人，就显得用人单位“级别高”、“上档次”、“倍儿有面子”，所以招聘时设定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本科生则一律免谈，甚至有国考等其他考试要求博士学位的，说不定过两年就要求海归博士或者双博士了呢。二是很多本科生在校期间不喜欢本专业，即使喜欢课程设置也不一定满足就业需要，当然也有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虚度光阴，没有真才实学或一技之长的大学生，因此毕业就面临失业的困扰，所以心里想还不如再上两三年，也许能学到点儿真本领，再就业时就有保障或砝码。三是盲从随大流，别人都在考研，而自己不去考，就会觉得没有志气或不如人，这其中当然还包括家长的鼓动，甚至还有强逼行为。从这些原因上看，大都应是合情合理，但是现象和原因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整体社会包括用人单位、学校、求学者及其家长们都普遍对考研有盲目的崇拜意向。崇拜虽是褒义词，但是盲目的崇拜就会转变成无条件地服从，而非个人你意识的主动。很多人只看到一张白纸上闪耀着无限光芒，却未穿破艳丽的华服看透自己真实的面貌。

何为引导的误区，又怎会形成盲目的崇拜的呢？这个疑问其实引出了研究生考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考试与人才发展的关系。中国其实永远逃不了“考试大国”的称号，也不愧被赋予这个称号。因为在原始社会末期考试的萌芽即已出现，那时许多部落的首领都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魏晋南北朝就有我国科举制度的萌芽，随着隋唐宋清的发展，使得这个制度从兴盛走向了终结。而我们现在用的考试系统就逐渐借鉴国外的学校考试系统。²考试的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建构，也促使开放地对社会优秀的更高更专人才的选拔，尤其是研究生的选拔，它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研究生的选拔从一开始的个人申请、学校推荐再到现在以考试为主推荐为辅的形式进行选拔已经经历了五六十年。在不断地改革中，现行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已较完善。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剧增，促使研究生招生数量不断增加，报考人数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招收 500 名研究生到现在 50 万研究生的数量，这应该是社会开放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复杂和分工精细化的表现，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的发展牵引人才需要的方向，人才需要的方向不是光靠考试能满足的，考试只能是从侧面来反映人的能力，而不能决定个人以后发展的方向。之前说的“前景好”仅仅是社会的需求多，而不能完全确定个人以后发展的前景。这种社会的“假性”引导让很多大学生及其家长和招聘人员有很大的误区，也让

¹ “学历与就业倒挂，读研如何不成为鸡肋”，http://www.gmw.cn/content/2009-10/12/content_993040.htm.

² 黄新宪：“中国考试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色”，《中国教育学刊》，1992 年第 6 期。

更多的人套进这个“必要的罪恶”里。我们珍惜考上研究生的光荣和学习机会的难得，但是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未来职业发展与规划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而不应为随大流而读研，不应为读研而读研，更不能因为逃避社会就业压力而读研。

作为大学生，我们不能盲目崇拜高学历，因为高学历并不代表能更好地就业。有些一流的本科生完全比二流的硕士研究生，更加能胜任很多工作的需要。举例来说，小芳是2009年湖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当时听老师的建议没考研而先就业，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应聘到南方某省会城市重点高中教书。隔年看到招聘启事，她凭借自己的真实才能，成功跳槽到某省级金融机构总部做管理工作。她的领导一再赞扬她比那些同时招聘进去的很多硕士研究生工作做的更好。如此来看，社会不能一味跟风要“华而不实”的硕士而不要“真才实学”的本科，招聘的目的确实不该是攀比高学历，而应是真正招聘到更能胜任工作职位需要的人才，无论其学历高低。并且，不学无术的高学历者招聘进去，招聘单位需要支付更多的工资、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加之很多女硕士研究生毕业即面临紧迫的生育，因此招聘硕士不免会加大用人单位特别是私企的用工代价。

在我看来，大学生之所以愿意前赴后继地蜂拥加入疯狂的考研大军，或者悲催地成为陪考的“炮灰”，或者如愿以偿成功地暂时躲避了就业和社会压力，但最终可能还是会无奈地成为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夹心层”，这无非都是被客观的就业环境所迫下的“从众效应”之举。如果政府和事业单位率先带头，普通岗位的招聘要求不再追求高学历，亦即本科即可，并且招聘的过程中不以学历高低论人而以能力和实习见习表现来论人才的话，那么，很多大学生就不会再非要考研了。我们不排除研究生考试招生数与社会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也肯定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我们也不能对就业避之不谈，更不能夸夸其谈，但是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考研读研也是为了更好的就业自己未来更好的发展，如果大学毕业后2—4年的工作经验能让你找到更满意的工作的话，为何还要给自己在学校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呢？未来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去探索去创造，而不应被动地选择仅显现在眼前的路。如此来看，减少对高学历的盲目崇拜，应该大大有助于给“考研热”退烧。

（责任编辑：王志航）

观念的学与抒情的诗

马号街*

有这样一些大学：每门课 2 学分，考试方式是交论文。本科生 4 年修 140 分毕业。研究生 2 年修 30 分毕业。博士生三年修 20 分毕业。这样，各阶段学生分别得交论文 70 篇、15 篇、10 篇。其培养方式是训练理性思考，其考核方式是体现训练的论文：言之有依据，得有资料、文本、数据；言之有秩序，得有清晰的思路、表达；言之有观点，得有自己的思想、结论。同时，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训练更严格，要求也更高。大学是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集散地，也相应为社会输出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观念人。大家懂得计算和反思，懂得反驳和批判，懂得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之相应的是报纸、杂志、网络开辟批评专栏，以供观念人发表言论、表达思想。没有专栏的，也喜欢在博客中抒发高见。这几乎是一个观念人批评的时代，除去那些娱乐明星的八卦博客，点击量居高的多都是评论博客，财经评论、社会评论、文化评论等等不一而论。“识时务者为俊杰。”搞评论几乎都有一副自己看透时务的面孔，而看评论的则很想自己也看透时务。

当观念的训练深入大学，当观念的影响垄治社会（极具统治性的观念是国家意识形态），抒情的地盘便受到严峻的挑战。作为抒情重镇的诗歌势单力薄已是不争事实。有人说诗歌已死，进而重新的诗也是死的；有人说诗人已死，进而重新的诗人也是死的。那些尚存的诗歌和诗人，仅仅是丧失魂魄的行尸走肉。诗意再也无法借尸还魂。谋杀抒情诗歌和诗人的凶手之一便是观念人。而造就观念人的集中营不是其它什么机构，正是当代大学。虽然从本科到博士的论文数似乎更少，但无疑论文的质量要求更精、更高，因此可以说，**本科是观念的初级集中营，硕士是中级集中营，博士是高级集中营。观念人要么完全无视诗歌，纠结于数据分析、逻辑推理、证据收集，要么将诗歌推上手术台，在各种层面上进行解剖。拿解剖刀的手正是理性。**本科时看海德格尔像庖丁一样把诗歌当牛一样析解时，感觉甚好。待到研究生再看海氏剖析荷尔德林，则觉一股血淋淋的强力。牛解得无话可说，实在要说也不得不说好。海德格尔以强大的中心理论作支撑，以整个体系相互配合支援，你很难反驳，还经不住赞叹：技艺真精湛啊！真乎看到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牛死了。杀死牛的，其本来面目不过是一介屠夫。即使牛并非为庖丁杀死，但当庖丁一动刀时，牛已是死的。观念人完成了他的强力自由，大卸八块的却是诗歌。庖丁与牛，也许成了批评家与诗的隐喻。当批评正要进行时，诗已死了。

这实属正常。屠夫干的，自然是屠宰。但屠夫自己也致力于写诗，致力于写他解析的对象。这就是越来越普遍的批评家与诗人的合一。他读诗、评诗、写诗。由于他常常在理论上行走，常不可避免地在诗中侵入更多观念的元素，从而造就观念诗。当然，观念诗对于整个诗的补充也应肯定。诗作为诗，大概没有本来的面目，也可能没有最终的面目，它也许只是处在一个没有始点和终点的过程，也许只是处在没有边界的领域。由于大学是观念人的聚集地，大学也成了观念诗的摇篮。

* 马号街，现就职于南京理工大学。

但是，现在学院批评家的批评晦涩很常见，观念诗相应地变得晦涩也很常见。很多人表示不读诗的原因是“读不懂诗”。读不懂倒并不一定要作认知上的理解，而是很难感受它的情绪。由于观念诗本不是让人去感受，而是让人去认知，因此去感受诗歌便行不通。如果读不懂作认知上的理解，读不懂也很正常，因为那些观念诗表达的观念太学术化了、太学院化了、太抽象化了、太故作姿态和高深了。观念诗极易导致的情况是，诗歌在圈内循环：观念诗人要么相互观赏、评鉴，形成吹捧之风，要么只是在孤僻中孤芳自赏。

某种程度讲，观念诗体现的不过是哲学与诗歌的古老关系。两者的论争早上千年。刀箭国没有诗的位置，思想国没有诗的位置。这里，诗更多是立足在抒情等核心元素上。这样，大学作为微型思想国，其知识培养和思维培养的模式中，的确没有诗和诗人的位置。它对诗的损害乃至迫害似乎必然。但每一种精神存在于世，就面临着抗争。它必须在抗争中与其它精神并存。诗歌也不例外。它既然不是一种世界以外的什么东西，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世界各种因素的纠缠当中。大学虽然致力于造就观念人，在造就观念诗的同时，却也诡异地成了整个诗歌的摇篮。许多不曾接触诗歌的人，在大学接触了，进而走向热爱的道路：读诗、写诗、办刊、搞诗歌活动。大学诗歌已是诗的重镇，涌现出了北大诗群、北师大诗群、华东师大诗群等一系列诗歌群体，甚至到了有大学处便有诗歌的境地。大学生在接受观念训练的同时，也在抒情王国开疆辟土。这是如何发生的？

固然，求知是人的天性。观念探索是求知的重要方式。但人也是情绪的，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有那么一时陷入或强或淡的体验中。即使那些拿着手术刀解剖诗歌的观念人，他也常常不可避免地陷入感情的漩涡或奇特的体验。世界在第一时间并不是以论述的形式呈现。一句话，诗也是人的天性。

也许，大学的论文教育是远离诗歌而去的教育，但大学不止于论文。大学在强调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大学不止于学术、不止于论文。它有比学术更丰富的内容。它有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让大学生自由地出入。自由比思想自由更宽广，独立比学术独立更丰富。大学首先是造就人，其次才是观念人。也许，也有学生愿意引经据典，写上几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证他与某同学的初恋、对某学长的感激或者对隔着千山万水的父母的思念，但毕竟这是下策。当在表达这些情绪的时候，诗歌也许是最直接、最真切的表现形式。此时，观念要么遁去，要么溶化。

要造就更多诗歌爱好者，其实并不需要复杂的手续。诗歌和诗歌活动本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校方只需尽力为诗歌等艺术提供更多如资金、场所、社团、活动等便利和支持即可，甚至这些也不重要，而只需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就行了。当然，教师和课堂也很重要。其实，很多人接触到诗歌、致力于诗歌，也是从大学才开始的。人们走到诗的海洋，总有种种契机，一种有益的、美好的接触是很重要的。那些更有艺术趣味一点的课堂、那些更有艺术感的教师，极可能将激发学生的艺术情趣。另外，学生自己的交流活动、聚会也很必要。人与人营造一种热爱诗歌的氛围和志趣，对诗艺提高和自觉探索有许多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诗群现象的重要原因。由于拥有环境和氛围，大学天然地成为诗歌的温床，无论是观念诗还是抒情诗，抑或其它艺术。

（责任编辑：尹亮）

本期点评人：李荟、尹亮*

艺海拾贝

“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

主办：刘海粟美术馆、武汉美术馆

展出时间：2012年3月1日—3月15日

展出地点：刘海粟美术馆（近地铁十号线水城路站）



展览简介：在东方视觉艺术语言中，有着一千余年发展的水墨画作为一种传统媒介语言有着极为成熟的审美取向，并阐释着中国的文化艺术立场。然而这种传统的媒介语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不可避免的正在与外来文化理念产生碰撞。这种碰撞延续至今，水墨画家们一方面坚持延续水墨画的笔墨传统，一方面又在不断寻求创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探寻水墨画如何向现代进行嬗变，于是各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新水墨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这些作品试图从水、

墨二者出发，挑战水墨画语言的“能指”最大尺度。在此背景下，对于水墨画这一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开放的名词，厘清水墨画的本体精神何在，究竟立场为何，是找准水墨画以什么基点往外扩散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个“核心”的研讨，就是本次展览的目的所在。¹

【点评】在以西洋画风见长的刘海粟先生命名的美术馆里展出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作品着实是件有趣的事情，但展出的这些水墨画作品每一件都不拘泥于传统。首先，它们结合了中国书画的写意与国外的印象派风格，如周韶华的作品，看似简单的涂抹传递出无穷的意境，它们使我发现，中国的水墨虽不如西洋油彩般厚重，但相比增添不少灵动。又如朱振庚、王孟奇（见左图）等人的作品，从表面上人物多是古人，但件件都散发现代社会气息，传递出作者对传统主题的理解，抑或是作者如岳敏君一样试图表达现代社会的荒诞一面？不管如何理解，这些表达是传统的中国绘画所不能及的。美术馆楼上常年展出刘海粟先生不同时期作品，同样值得一去。

* 李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尹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¹ 简介与图片均摘自刘海粟美术馆官网，网址：http://www.lhs-arts.org/zhanlan_view.asp?id=1236，最后登录日期：2012年3月11日。

“俄罗斯制造”——俄罗斯当代艺术群展

展出时间：2012年3月4日—4月15日

展出地点：其他画廊|上海空间（M50艺术区）

展览简介：本次展览的标题可以看作是给众所周知的“中国制造”标签加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注脚。如今，许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却几乎找不到什么产品是俄罗斯制造。“俄罗斯制造”艺术展展出了九位俄罗斯艺术家的精选作品，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俄罗斯展出，也曾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其中有一些艺术家常年在俄罗斯，有一些在国外工作。幸运的是，大批俄罗斯艺术家散居国外的状况目前并没有影响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艺术中心的艺术氛围，许多艺术家依然在这些艺术中心碰面，艺术市场也非常活跃。其他画廊引入的数位俄罗斯年轻艺术家将有助于中国观众接触当下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画廊中常见的一些艺术手法和观点。¹

【点评】 俄苏文学我们不会感到陌生，俄苏绘画我们同样有所耳闻，但苏联末期和当代俄罗斯的艺术的发展情况大多数人或许会感到茫然。这场融合绘画、摄影及影像作品的展览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几位画家都不同程度地避开涉及意识形态、雄伟的自然风光等创作角度，以许多短小的作品展示当代俄罗斯的生活百态。如电气列车上的人物、在英雄雕塑下的少先队员等等。特别是一组以俄国街道为背景的油画作品，看似色彩斑斓，但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小城市阴雨中有些许积水的暗淡的街道，进而让人感到这就是俄罗斯。展览参观下来，不禁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¹ 简介与图片均摘自其他画廊官网，网址：http://www.othergallery.com.cn/new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5&Itemid=58&lang=zh，最后登录日期：2012年3月11日。

新闻话题

谁的乡村，谁的学校，谁的孩子

——10周年的“撤点并校”¹

200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第十三条指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一决定在民间被称为“撤点并校”。虽然调整学校布局的初衷是为了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而且事实上也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撤点并校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学生们背井离乡，有的家长们甚至被迫陪读，产生了一些心理的、文化的、亲情的等问题。特别是随着2011年末的几次重大校车事故，加剧了人们对“撤点并校”的质疑。

正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做的调查，“城乡学校的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发动，并在十年后即将冲向终点。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一份县人大调研报告将乡村教育的现状归结为：‘城挤、乡弱、村空’”。

然而，一些拯救乡村学校的公益尝试正在展开。民间公益组织正在扎根中国乡村，也在一点一滴地做着贡献。

【点评】知识改变命运。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却发现，通过念书改变命运越来越艰难。城乡二元化所导致的城乡差距，正通过教育遗传给下一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究竟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势所必然，还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政策太过武断？不知道。

幸运的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从媒体到公益组织再到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积极谋划着改变。或许，我们不能期待短期内农村教育的问题得以全面解决，但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日积跬步，就终能成功。

用政治伦理破解政治难题²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始终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顺利地进行权力交接。从权力交接的制度与执行看，政府的产生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此，从逻辑上，是先有政府，再使其负有政治责任去回应关系人民切身权益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先有现实问题，再自下而上地产生政府，使其负有政治义务去解决它。

这么做保持了整个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各种政策的接续。但也有负面效应。每

¹ 摘自“‘撤点并校’10年考”，《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3月5日。

² 摘自“与‘特殊利益集团’作战的机会”，《南风窗》，2012年2月29日。

一届政府在继承上一届政府的遗产时，也一并把上一届政府在任内本应解决，但因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并没有解决的头痛问题给承担了，而它同样也可以按照这一逻辑如法炮制。

每一届政府，在其任内，都负有政治义务去做好它应该和必须做好的事情，不使问题积累恶化，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善”。人民在把权力授予每一届政府时，无论以何种形式，本身就有一个约定：承担其政治义务和兑现其政治承诺。一届政府的完美谢幕，正在于它让人民满意和留恋。

【点评】人所共知，中国已经到了改革“深水区”，而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正如上文所述，已经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而且愈加固化。如何改善被“特殊利益集团”裹挟的政府与民众的生存状况，需要政府、媒体与民众携手前行。特别是政府，需要排除万难，进行改革。正如《人民日报》所刊发的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这是改革最好的机会，或许会带领国人顺利走出“历史的三峡”。

[上接第 79 页]

自 40 年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来，两国间的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由当初的联合应对苏联威胁的半同盟关系，演变到如今存在深刻结构性矛盾的竞争合作关系，如何妥善处理这种复杂关系就成了两国外交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美国的战略转移，高调重返亚太，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博弈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常常被提及的话语成了中国对美国一厢情愿的期许，中国如何作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12 年既是美国的选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换届年，这样的政治敏感年能否确保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考验着两国政治家的智慧。

——朱永福

（责任编辑：李秋悦、马新伟、章航翔、张元、朱永福）

先生之风

“予岂好辩哉？”

——纪念朱维铮先生¹

这是一个没有哀乐的遗体告别仪式。

3月14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回响在大厅里的，是无数个深夜和凌晨陪伴过朱维铮先生读史撰书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他常说，一名历史学家若能在一个领域留下三句话让后人永远记住，那就很了不起。他总结自己在经学史领域最重要的三句话是：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别有创见，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也为后来者指引了门径。

跟历史“较真”

对待历史研究，朱维铮总是强调“用历史去说明历史，先考虑是什么，再去问为什么”。就在他呼吸无法自主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依然提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真理是从争论中间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正是因为对历史的较真，朱维铮常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别人做历史研究时的错误。“有人说我喜欢骂人，但什么是骂人？我实事求是地说事实，怎么叫骂人？”朱维铮总是这样回应别人的指责，事实是他做历史研究的唯一信条。在他的学生看来，老师的直率源于学术的自信，批评固然激烈，但绝非无源之水。“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老师深感必须说出来的压力，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学生这样说。

爱学生的老师

“现在看来，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只要是学生邀请朱维铮去讲课，他从来不拒绝，反倒是一些高价聘请他去演讲的商业活动，先生常常婉拒。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姜鹏说，“先生曾说，学生请他去，是真心向学。学生们的价值观多半是这个环境和社会造成的，但孩子的观念是可以纠正的。所以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到图书馆和中学去讲课，给孩子们一种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思路。”

对于学生的文章，朱维铮也十分重视。李天纲说，在给博士生指导毕业论文时，朱先生往往是跟着博士生一起将相关的史料和研究精读一遍，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有价值的修改建议。

从50多年前至今，几乎每一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先生的课，都会提到他传奇的考试方式“口试”：学期初就给出100个史学问题，要求学生任选其一，交千字以内的文章，期末

¹ 摘自“学者朱维铮”，《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3日，第3版。

考试时结合文章进行5分钟面试，就此定下期末成绩。“我读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说，“他还提倡学生和他辩论。有的学生就挑偏门的题目挑战朱先生，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实在让人心服口服。”

有意思的学者

事实上，朱维铮从来就不是一个只懂得做学问的“老学究”。在朱维铮念大学时，曾是复旦剧社的台柱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演了话剧《秋瑾》的男主角，年轻的时候朱维铮很英俊的。”55级历史学系、和朱维铮同班的潘玲娣说。不仅戏演得好，朱维铮年轻时短跑也很快。据李天纲回忆，“我在1981年查了系运动会田径纪录，100米纪录保持者是朱维铮，这个纪录保持了至少20年”

【点评】朱先生逝世后，复旦史地所的姚大力教授写了这么一副挽联来总结先生一生的关怀：“盘点诸子，别裁清学，都只为音调未定亟待求索真文明；痴心忧国，炬目识鬼，哪堪录维新旧梦漫说走出中世纪。”或许拉长历史，朱先生可能只是某种学术史传统中的一员，或许只能进《儒林传》，或许亦不能。然而，这求真忧国的读书人，爱知识爱学生的好老师，又岂能以历史衡量？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桃李不言，泽润万千，今之国朝，几人能之？

附：朱维铮小传

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担任陈守实先生助教。

1962年，协助周予同先生编辑《中国历史文选》。

1981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

1983年，编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96年又有增订本）。

1985年，出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1987年，出版《走出中世纪》。

1995年，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

1996年，出版《马相伯集》、《求索真文明》、《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

1998年，由钱锺书先生任名誉主编、朱维铮先生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刊》出版。

2000年，出版《维新旧梦录》（与龙应台合编，台湾版名《未完成的革命》）。

2002年，出版《中国经学史十讲》。

2006年，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先生荣誉博士称号。

2008年，始为复旦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2010年，出版《重读近代史》。

2012年，修订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这是先生生前校订的最后一部著作。

（责任编辑：尹亮）

聆听苦难

程艳阳*

趁着周末的闲暇读完了余秋雨的《欧洲之旅》和《非亚之旅》。两本书的差别很大，一本描绘了美好与祥和，而另一本则记录苦难与战争。我想我有必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景致与美感，也有必要聆听某些民族的苦痛与呻吟。透过这一层的美丽与伤痕，透视生命与历史。

(一)

看见一幅摄于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照片，我忽然有点纳闷：阿拉伯的白色平顶房怎么变成了灰暗的颜色？房顶上还压着一块刻着文字的大石头？再定睛一看，难道……

“难道”是真相，我看见的是坟墓。一排排，一列列密密麻麻的坟墓。间隙很小，转眼间连成一片，紧贴着大地，俯瞰下去宛若一个庞大的城池。坟墓里埋葬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埋葬了历史所有的华丽与变迁，埋葬了两个民族的呜咽与挣扎，埋葬了虔诚的信仰和朝圣，埋葬了和平与理想，埋葬了善良，亦埋葬了邪恶……

渐渐的，那些炮火与厮杀的轰鸣远去了，人们的哭声与恐惧的叫声也远去了。我开始听见一个声音，并且愈来愈真切。是死神的抽泣。

是的，连死神都抽泣了！

(二) 巴勒斯坦—以色列

当所有的顶礼膜拜和信仰朝圣交集在一起，虔诚却变成了轰轰烈烈的互不相容，抹杀了宗教原本拥有的善良与宽恕。

三大宗教有着不同的朝圣道路和朝圣方式，却将终点汇集于此。疯狂的信徒捍卫自己的信仰和领土，开始长久而盲目的争斗，并渐渐走出了宗教的范畴。

无数次的修补与重建，耶路撒冷被迫容纳了尖刻而繁复的矛盾，千疮百孔地立着，在风中颤抖。她开始习惯了持续不断的枪响与爆炸，也渐渐开始厌烦这无休止的厮杀。而历史却注定她无法置身事外，人类也不愿成全。因此她只有选择承受。她用残留的断垣维护着已死寂的心，逐渐走向沉默。呵，圣城？大概是前世的事了吧。

她沉默着目睹所有的战争，只是在习惯中忘记了流泪。

也许，血流的太多了，泪水也就失去了流淌的力气、资本和方式。

犹太人长久没有自己的国土，几千年来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只是对平息与安逸的追求并未被长久的放逐消磨。终于，他们在地中海沿岸获得了自己的乐土，却也开始了同阿拉伯民族持续不断的争夺。两个民族在战争背后的创伤虽被硝烟所覆盖，可却从未消逝。以色列精细盘算，严密地守卫。巴勒斯坦也不愿放弃一分一毫的领土。两个民族在苦痛中辗转反侧，他们无处倾诉。干脆，犹太人在城里立起了一面哭墙，无处吐露的悲恸与绝望，吐露给这面墙；无人注意的抽泣与眼泪，表达给这面墙；甚至无处去吟诵的祈祷、赞美诗和忏悔，也吟

* 程艳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诵给这面墙。当耶路撒冷失去“圣城”的名号、被迫成为战场之时，这面墙默然担起了聆听子民心声的责任。它凝聚了太多的恩仇与悲喜，因而屹立不倒。

如果某一天它遭遇崩塌，不知会有多少感受灰飞烟灭。

现今，战争的孰是孰非已无法再说清，一切只能交由历史。甚至，也许历史也无法辨清。

只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那些在炮火轰鸣中轻呼和平的人们。同时，愿他们没有白白付出和牺牲，愿世界在不久的将来永安！

（三）伊拉克

几千年前，有人在此用楔形文字写下了世界；几千年前，神秘的女祭司在神庙中占卜未知；几千年前，《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传述于巷道……几千年后，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仍然缓缓流淌，包围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然而传承下来的历史与文明却瘫痪在废墟瓦砾之中，支离破碎，失去坚挺的身躯与力量。

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现今却拥有无数失学儿童。他们早早远离了课本，步履摇摆地走上市井，开始维持生计的奔波。他们渐渐遗忘了绘着女神伊南娜的斑驳壁画，遗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创造了如此丰富的文化。该遗忘的被铭记，该铭记于心的却被不动声色地遗忘。夕阳西下，文明的倒影苍老地躺在地上，没有轮廓与血液，却收集了无尽的孤独与荒凉。

直到某个清晨，美国的狂轰滥炸打破了寂静的天幕。

被压抑着的汹涌澎湃的暗潮终于迸发而出，刹那间沾染了整片土地。成火，成光，成血。

无数无辜的美国士兵被送上战场，无数无辜的伊拉克人民开始守卫国土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生命的脆弱消逝，甚至一次又一次近距离地经历死亡的真相。他们厌倦战争又不得不战争，那已成为了他们的义务。生命无法推却，也无法承受，于是就这样被迫等待着。

现在，战场恢复了平静，危险却一步也未曾远离。只是，我们都真切地看到，无数伊拉克人民仍守卫在自己的家乡，未曾离开。他们无法预计某个时刻危险与死亡的突然侵袭，无法预计生命是否在下一秒就会化为灰尘，可他们都选择了坚守，只为着这片他们深深依恋的土地，为着不愧对自己一颗坚贞的心。但或许就是这种简单的坚守，将会带来民族的重振，带来文明的继续传承发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带来和平的眷顾。

（四）

我们总是看见战争无可避免的发生，在两个民族不舍的目光对视中发生，却无能为力。其实，我们始终都有拒绝战争的能力与勇气，只是我们都忘了伸手说“不”的方式。因此和平才迟迟未曾降临，只能躲在战争的硝烟里哭泣。

伸出手来，才能拒绝战争，同时迎接和平。

愿不久以后，世界永安！

后记：也许我对和平的期待过于简单乐观，但是这种期待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并且是那么的强烈。我始终感谢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的童话，它们让我相信爱始终有一天会压倒所有残忍、自私、暴力和仇恨，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期待和平，源于对爱的信赖！

（责任编辑：李荟）

诗人

刘长勋*

诗人，总是把快乐碾碎了
让它散落在阴郁的文字里
诗人，总觉得人生是那么的沉重
往往凝在化不开的哲学里
诗人，总会那样的心思细腻
连微风都可以吹走活着的意义
于是，诗人走了
留下了太悲壮的话题
活着仿佛也成了负累
从顾城到海子
从普拉斯到克莱
诗人成了死亡的别称
脆弱的象征
诗人走了
总在人生的韶年却刹那间凋零
也许是太怯懦
不敢面对梦与现实的落差
但梦真的好美
诗人决然割舍了生命
诗人，总是用笔头编织着矛盾
抒写着人生的悲怆
诗人，总是在细腻中放大了悲怆
表达着内心的彷徨
诗人，总是在生与死的煎熬中
彷徨让生命在逝去中变成永恒

(责任编辑：崔攀)

* 刘长勋，郑州天星教育图书策划有限公司。

时事焦点·中美关系四十年

【编者按】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虽时有起落，但总体上是在快速进步的。四十年风云流转，中美两国从当初的冷战期间的对抗到后来的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坎坎坷坷、波澜起伏，但每到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历史总会被改写。下面是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

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次年访华谱写了序曲。

1972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并于1972年2月28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1972—1978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两国各方面交流不断。

1972年4月13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美国底特律，开始对美国进行“乒乓外交使者”的访问，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1972年5月，中美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两国间的直接联系开始建立。

1973年11月10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基辛格此次访华期间，双方重申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表示将“谋求加速正常化”，双方同意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

1975年12月1日至4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中国进行访问。

1976年2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1978年5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表示，美国政府认为美中关系在其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美国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美双方于7月初在北京开始举行关系正常化谈判。经过半年6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

1979年4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

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华。他是在中美两国就美售台武器

进行的正式会谈、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来访的。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与布什副总统会见时指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今天来说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布什访华两个月后，美驻华大使恒安石向中方提交了美方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草案。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八·一七公报”。至此，由《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组成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制度保障。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公报”中，美国方面始终对台湾问题留了一截尾巴。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台湾问题关系法》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都没有解除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台湾的承诺。这就成为中美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潜在冲突的根源。不管怎么看，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远的发展。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华。中国领导人在与里根会见时说，中美关系近来是好的，中美关系的前景也是好的，但还有障碍。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三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应切实执行三个联合公报，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里根表示：美国将履行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所承担的义务，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98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美国。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指责中国以惨无人道的虐待学生和无人权为由，断绝与中国的一切政治往来，中国外经外贸行业急剧下滑，中美关系发展出现波折。

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1994年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前，江泽民与克林顿进行正式会晤。江泽民主席表示：我们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并提出了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等五项原则。

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公然向台湾领导人发放签证，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提出的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毅然断绝同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往来，中美

关系紧张。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1996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元首在1997至1998年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7年11月2日，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作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他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妥善解决分歧，不断朝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标前进。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

1998年4月12日，吴仪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1998年4月29日至5月1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

1999年4月6日至14日，朱基总理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朱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不幸成为美国在对科索沃的轰炸行动中的受害者。一架美国B-2轰炸机使用五枚精确制导炸弹（JDAM）轰炸了中国使馆，20多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不幸壮烈牺牲。此事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怒，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0年7月12日，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科恩。

2001年3月19日，中国政府派钱其琛副总理访美，旨在沟通信息，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美方放弃了“战略竞争对手”这样咄咄逼人的提法，布什总统同时还表示“特别渴望到中国访问”。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缓解。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EP-3军用电子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违反飞行规则，将中国军用飞机撞毁。撞机后，肇事美机未经中国方面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4月1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中美撞击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致歉信。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当即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9月12日，江泽民主席就美受到严重袭击应约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江泽民表示，

我们愿意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举行会晤。

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法案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项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2002年4月27日至5月3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在美国掀起了“中国旋风”。访问期间，胡锦涛同布什等美政界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并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胡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访问达到了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求同存异、促进合作的目的。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访美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布什的私人牧场同他举行了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

2003年6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

2003年10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05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看法。两国元首表示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5年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申将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新成果。

2005年12月7日，第二轮中美战略对话在美举行。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6年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胡锦涛主席在越南首都河内会见美国总统布什。

2006年12月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双方通过对话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共识，加强了互信。

2007年6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胡锦涛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5点意见。

2007年9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悉尼会见前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美总统布什。

2008年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008年8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前来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美国总统布什。

2008年11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利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上任之后首次中国行。

2009年7月27日至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话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09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人大最高领导人20年来首次访美。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2月13日至2月1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引发广泛关注。

四十年风雨兼程，纵然常有分歧、难免龃龉，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四十年过去，国际环境及两国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未来才能怎样发展，同学们各抒己见，不知有没有可能成功预见另一段历史？

就中国而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物质性力量以远超外部世界预期的速度迅速

增长。中国 GDP 在 2010 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触动了外部世界神经。一时之间，“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满天飞，中国像个暴发户一样，让里里外外的人感觉这头曾经的“东方睡狮”似乎要霸气外露了。但中国却没有像外界期待的那么“给力”，实在是之前支撑其高速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已日渐枯竭而新的动力因素又没有很好地衍生出来，同时国内的各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难以向前推进，体制性、制度性调整空间越来越小。反观美国，不仅之前，人们还在大谈美国“一场危机，两场战争”的残局，对“美国衰落论”津津乐道，似乎这个世界霸主终于要交权了，但转眼之间风云逆转，像云计算、页岩气开采等创新技术喷涌而出，美国制造业复兴在望，美国再一次用事实证明它依然是世界发展的火车头。而现实也告诉我们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依然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最佳选择。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不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优先的政策选项。总之，作为人类历史上既极端重要又高度敏感、既高度竞争又深度依赖、既棋逢对手又伙伴天成的最复杂双边关系，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其内在的兴衰规律而不仅是应景的议论，而作为中国自身更应该透过美国的成功反思自己当下的改革困局。

——陈安龙

个人觉得中美关系内在还是很稳定的，因为两国的矛盾大多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办法解决的，其他的摩擦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疏解的。浅显的以为中国还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上向更好的方向改变，那么不管与任何国家的关系都会更容易处理，一些相关的敏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何文婕

中国崛起之际，美国“重返”亚洲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华盛顿和北京都声称，双方寻求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双边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深。诚然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而只要双方能互相尊重差异，尽可能以协商方式来消解分歧，就能防止局部冲突的外溢效应，使双方在正和博弈中共同获益。

——姜边

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关系。曾经有人形容两国关系如同一对男女之间“谈恋爱”，关系愈加亲密但也是磕磕绊绊不断。其实，两国都需要在交往过程中不断深入地了解对方，知道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该明白这一点，它的所谓“理想主义”外交在中国运用是根本行不通的。不断地用所谓“民主”、“人权”等问题以教师爷的身份质问中国不仅不会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反而将令中国政府和人民平添几分对美国的怀疑乃至愤怒。

——李荟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走过的四十年是跌宕起伏的

四十年，也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现实解释力正确性的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历史，就是用实际事例诠释现实主义理论正确性的历史。

——李沛

近两三年中美关系总的态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结构性矛盾事实存在，却并非零和矛盾。美国虽高调重返亚太，但对我两面下注，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根据是：一、金正日去世，希拉里虽然穿了件红衣服却一反很多专家的预计，宣布维持稳定是美第一优先级的政策。二、蔡英文并未胜选，美国并未捣乱。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稳定，以冷战的方式对老二中国实行全面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搭车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作为老大的利益。

“重返东亚”更接近于一种政治话语而非一个明晰的对外战略。美国自 2009 年以来主要利用亚太地区的偶发性事件加强了原有同盟，进而拓展了外交关系。多数情况下美国是依据其他国家制造的事态进行动作而非美国有计划的行为。事实上从 2011 年下半年开始，强调接触和政治互信的拜登和多尼隆取代了高调重返东亚的希拉里和督促人民币升值的盖特纳成为了实际掌控美对华政策的新掌门。

这次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恰恰表明美国实力的局限性，反映的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暂时来讲美国实质性重返不多，其在财政上、军力分配上还存有事实上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重返东亚”政策和中国的反应可能借由中国国内政治和美国大选对国际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中美战略互信可能受到一定的削弱。所以中美双方都要避免做出过度反应，需要有效地管理冲突。

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东边不亮西边亮”的策略，不在东亚和美国争一城一池的得失；避其锋芒，攻其不备，不和美国起正面冲突，反其道而行，全球范围内所有美国撤出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入。

——李洋

2012 年 2 月初开始，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大变局。在这场事件中，美国人可以说是最隐秘的力量，尽管它没有直接跳出来，但美国的动作与这件事的发展密不可分。具体美国人的行动可以分为四个步骤：言语试探、非官方泄密、“谨慎介入”和直接配合。每一个步骤都对应着这件事情的每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局面。

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介入由来已久，支持那些被认为是相对“亲美”的官员。中国 2012 年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开十八大，最高领导层将会换掉。在立军案发以前，他们认为只有 3 个人（而且仅仅是可能入常的人）会有“反美”倾向，其他的都是亲美的，其中就有薄。2 月底《华盛顿时报》资深记者比尔·戈茨认为，“有美国官员认为，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型反美民族主义的突出代表……”

习访美其实是此案的重要转机。美国人起到了一个推手作用，而且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公布的，而是由戈茨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出来的。尽管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出面，但让习知道这条劲爆消息的目的，美国人已经成功地达到。鉴于习的身份，这件事不仅没有影响中美

关系，而且或许还会对未来 10 年的中美关系有促进作用。美国之音评论，命名为美国的“谨慎介入”。

美国国务院 17 日表示，按国会要求，将报告此案的经历。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拖延此事，想等待尘埃落定。包道格同意奥巴马政府对立军案采取“全面灭音”的安静处理方式，他强调“中国正面临关键的领导层过渡期，况且中美关系今年的开端已经比预期好，因此绝对需要让中方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此案，避免将美国或中美关系卷入其中。”但后来形势的发展使美国认为有利可图。

但随着美国对事情重要性的认识，逐渐认为有必要配合中国领导层。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在第一时间回应 15 号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对中国领导层表示最明确的支持。美国政府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材料，随时向中国领导层提供支持，避免出现反美领导人上台。

——孟维瞻

习近平此次访美突出个人风格，以亲民形象为中美关系加分。我注意到这次习近平访美与之前中国领导人访美略有不同。比如他本人要去 NBA 观看球赛，同时还重访艾奥瓦州 20 多年他曾访问的一户普通家庭，加深他与美国普通民众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通过具有亲和力、人情味的公共外交促进中美双边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王心志

中美关系四十年是国际关系显著发生变化的四十年，也是美国亚太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关系往往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紧张和缓和程度。四十年的经验证明，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甚至是世界局势的稳定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保证。只有美国坚定不移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关系才会安定有序地发展。

——王志航

中美关系挺好的。今年是大选年，或许有新的变化。但两国友好稳定的基本立场不会发生改变。

——维一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 40 周年，两国从几乎无任何直接关系到如今的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这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需要太平洋两岸都对思维和行为方式做出调整。中美要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相互收益的平衡，必须建立起一个信任框架，富于建设性的解决问题。崛起的中国并非一定会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倒是这种担心增加了双方对抗的风险。

——吴途勇

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因此，无论美国与中国在何种场合、何种议题上高调做秀，二者都不可能成为朋友。在美国眼中，中国

一直都是神秘、异类的“非正常”国家，是美国需要遏制的敌人与潜在对手。因此，认为美国与中国将以 G2 方式共同主导世界，恐怕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与自信了。

——武亚宁

乒乓球过去又回来，一晃已是四十个年头。也许在这场比赛里，现在还看不到谁是大满贯，不过中国在数个回合中逐渐成长。也期望双方能够更多的沟通和相互了解。

——杨茗

四十而不惑。利益的相互依赖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由此有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四十年来，中国在不断地批判美国的过程中日益加深对美的依赖。中国不能没有美国，而美国可以没有中国。在利益的天平明显失衡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为对美关系的发展另辟蹊径。

——叶小娇

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短期内不会解决，而绝对实力对比的继续维持与相对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也注定了两国关系在保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分歧与冲突会更广泛的出现在各个领域，传统的争端不会消失，而新的问题会继续涌现，使得中美关系将长期保持一种“总体友好但麻烦事不断”的局面中。

——章航翔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主席握住尼克松总统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时，他表现出的勇气和魄力是令人惊叹的。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北方的苏维埃政权发出了这个人口大国自主独立的声音。外交自主也是一个强国的标志，无论任何时代，在对外关系中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赢得别国的尊重。

——曾乔圆

今年是中国政府换届之年，又正值尼克松访华 40 周年，年初，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政策，加强与韩日、东南亚国家合作，对于喜欢“周年庆”的中国人来说，彼国这些动作似乎很不给面子。但也许美国正是想在尼克松访华 40 周年之际，推翻“尼克松主义”。站在这“新”的起点上，经历了 40 年风雨的中美关系将会呈现出怎样一种面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周生升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外交关系上经历了多次波折，从人权问题、贸易封锁、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到反恐合作、经济合作乃至所谓“G2”的诞生，中美两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大国，相互依赖、友好竞争是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朱承璋

[下转第 65 页]

国务院 2012 年 2—3 月大事记

我院召开“2012 年总统选举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学术研讨会



3月6日,由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2012年总统选举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新阶段、新议程、新挑战”学术研讨会在理科大楼A508报告厅顺利召开。

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2012年总统选举结果”、“俄罗斯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议程”、“俄罗斯对外关系走向”以及“中俄关系的走向”等四个方面的议题开展了热烈而坦率的讨论。我校副校长范军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刘中民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汪宁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教授等20余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

冯绍雷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实用主义”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则,在目前的俄罗斯政坛,只有普京可以为俄罗斯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未来发展目标,反对党则在政治准备和知识积累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俄罗斯展示出不同的愿景,因此很难真正与普京抗衡。

关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冯教授认为它很难遇到实质性的外部威胁,欧洲、美国和亚洲国家都不会成为威胁俄罗斯的力量,他指出这一点已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界取得了共识,但俄罗斯能否在社会进步与秩序稳定、和谐中保持平衡,决定着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

普京的当选也并不意味着中俄关系的发展会一帆风顺。虽然,普京强调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首要地位,也非常重视中俄关系,但中俄两国在未来还将面对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变化和挑战,中俄关系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俄罗斯大选对俄罗斯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张文江先生座谈会

3月14日下午2点，在我院邱立波老师的邀请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77级校友张文江先生携其新作《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来到我院。张先生的到来还吸引了十来位校外人士前来聆听讲座。

张先生首先回忆了他与潘雨廷先生相识的过程，以及《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出炉的始末。由于2003年的一场大病，张先生决定尽快将已用了12年整理的潘先生谈话录向公众出版，并认为出版潘先生的著作比其自己出书更重要。随后，张先生细致地说明了该书的读书方法，共有九种之多，顺便提及了解潘先生思想和著作的五种入门方式。在谈话中，他不断强调潘先生的学问之高深，认为潘的学问是“绝学”。



张先生还指出宋明理学在中国学问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理解中古学问要从王阳明开始，宋明理学是做人的要纲，其最高点在朱熹；中国最后的大师是明末的大师。

但是，张先生不主张在座的人学《易》，认为我们都是有局限的人，学习《易经》很有可能“未读其利先受其害”，认为我们只要好好读《论语》就行了，后者是一本“妙极的书”，其中就充满了“易”的道理，且读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不同的感受。最后，张先生说，“读书人应当在望着一平米房价的基础上再望星空”。

朱小平老师漫谈

3月17日，独立经济学家、我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古代西方经济史”课程的授课教师朱小平老师再次出现在404报告厅，与我院部分师生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



刚从北京参加完“两会”的朱老师首先与我们分享了他参会的感受和所见所闻，并对新近关于重庆市高级领导的变动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简要地解读了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深意。

随后，朱老师对所谓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用直观简洁的图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从而引出了“权力斗争”与“非权力斗争”两概念。后来又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接着又提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介绍了“消费饱和”概念。

针对学生提出的希腊债务危机问题，朱老师提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三年转换以及《财政稳定公约》的相关规定。他认为，未来三年欧洲将有大变动，这次欧债事件有可能是一次危机也有可能是契机。最后，又谈到了暴力与政治的关系，并以美国华盛顿总统的历史为例说明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这次漫谈一共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现场气氛很融洽，在座师生都受益匪浅。

日本上智大学安达佑子教授讲座

3月20日上午10点，日本上智大学俄罗斯研究系，安达佑子副教授来我院做了一场以“非正式企业重组与俄罗斯大公司的崛起”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我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与部分博士生、博士后到场聆听了报告，我院王海燕老师主持讲座。

在报告中，安达佑子教授首先指出，搞清政府的非正式指示在企业管治中所起的作用，是了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企业发展的关键。她提出此次报告主要是基于阅读《建立俄罗斯大企业——非正式企业管治的冲击》一书所作的。

她首先阐释了所谓“非正式企业管治”的含义和相关实践，并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地呈现了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该实践时所出现的问题，然后指出把后苏联企业转变为公司制经济实体的实施策略，如股权稀释、价格转移、资产剥离、限制股东投票权等。然后，以Yukos, Siverian铝业公司和Norilsk镍业公司为具体案例，分别分析比较了其转变前后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所取得的效果。



余南平教授关于中国经济的漫谈

3月21日下午2点在A404报告厅，我院余南平教授首次与2011级全体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

在“两会”刚刚结束这一背景下，余教授简要提及关于“中国模式”的左右派之争，也提到“比较政治体研究”这一术语。随后，他提出“三代人权构建”的概念，分别是言论出版权、政治投票权以及公共福利权益，并指出我国目前处于第三代人权的构建上。



余教授此次座谈的主体内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已充分利用的两类共六种红利，即内部的人口、土地和市场三种红利，与外部的的外来直接投资、加入WTO和全球反恐三种红利，并分别分析了每一种红利的使用情况和前景，也指出了每

种红利所带来的问题。余教授还基于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三种尚未利用但价值不小的红利，首先是人力资源的红利，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受教育人群的结构即有望充分挖掘我国的高校毕业生优势；其次是继续改革的红利，认为我国的制度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最后是海外红利。最后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余教授教导我们在阅读经典时要学会跨时代思考。

“一个苹果，两种思想”——国关院“爆米花沙龙”火热展开

为丰富课余时间、加强交流、拓展视野，国关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开展了每周日 6 点钟开始的“爆米花沙龙”活动。每期由一人主持，讨论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对政治、读书、



生活、爱情乃至人生的体会与心得，如目前讨论过的话题有：“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分析，文革透视”、“网络政治——维基解密来龙去脉”、“罗马和中世纪军事史”、“欧洲音乐”、“对林国华老师访谈的经历和感想”、“结合简·奥斯汀的小说《劝导》来谈爱情观”、“反思我们的教育——以纽约大学上海中心的课程设置及教育方法为对比”、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沙龙氛围自由而热烈，并有美味零食、水果供大家品尝。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爆米花沙龙已成功开展了 9 期，并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知识分享、思想交流与碰撞的良好平台。

（新闻整理：曾乔圆、许子兰）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征稿启事

亲爱的同学们!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世界风云总是变化多端！赶快拿起笔来，用你独特的视角解读当今时事、评说热点话题吧！

读一本书，也许会有百般感触；看一部电影，也许会有久久回味；听一首音乐，也许会有无限共鸣。还等什么呢？写出你的感受，让我们心得齐分享！

如果你爱生活，爱写作，爱记录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里将是你书写自我的天地！诗歌、散文、小说、游记……尽情挥洒你的文采吧！

因为，我们不仅欢迎同学们把学术论文贡献出来，一同品味；而且也欢迎同学们把你们点滴的感受，拿手的特长一起拿出来共同分享！

这是一个多元的舞台，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是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青春年华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起撞击思想的火花！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们自己就是主办方！

投稿请发送至：g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2012年4月

非 道
道 不
也 遠
。 人
人 遠
人

姜洪
二〇一二年六月

编辑部成员





S A I A S

